史无前例的拷问政治

《韩国通讯》

史无前例的拷问政治

《韩 国 通 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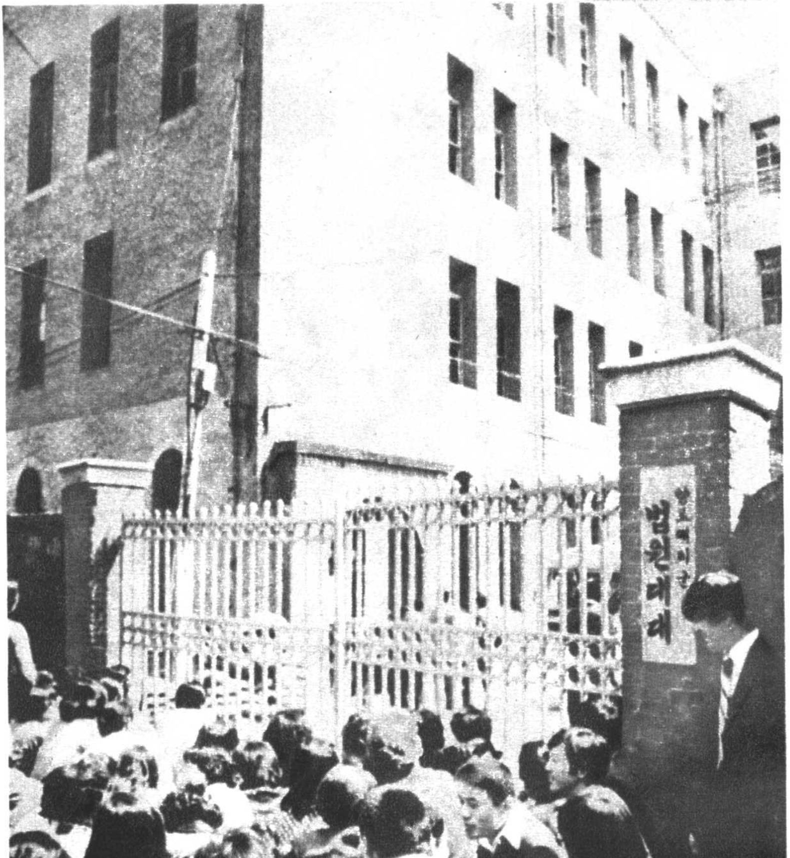
T·K

朝鲜·外国文出版社·平壤

1978

编者按·

本书辑录了原载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自一九七六年第九期至一九七七年第七期）上的《韩国通讯》。



斗争将持续到粉碎苛政时为止。

挪威人民和朝侨举行示威，高呼“打倒韩国的军事政权”。

日本的各界人士举行反朴正熙示威，要求释放被监禁的南朝鲜民主人士。

美国人高呼：“释放南朝鲜的民主人士和政治犯！”“停止拷问和处刑！”“美军撤出南朝鲜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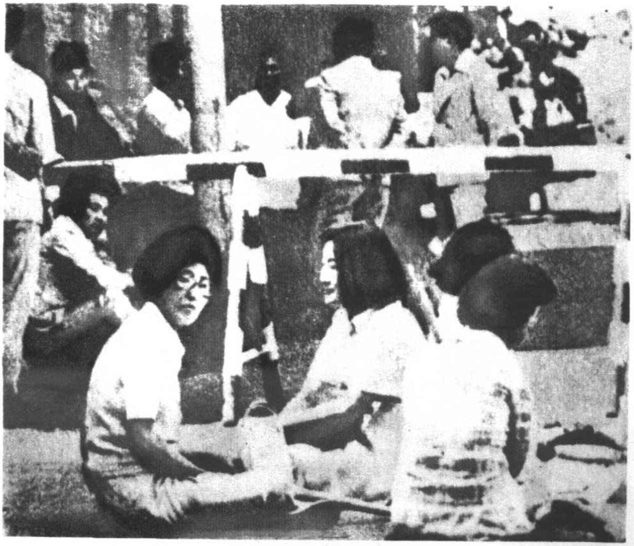
旅美朝侨举着“废除维新宪法”和要求统一祖国的标语牌举行反朴正熙示威。

旅西德朝侨举行示威，高呼“打倒朴正熙独裁政权”。

旅日朝侨青年们举行示威，
要求"朴政权立即滚下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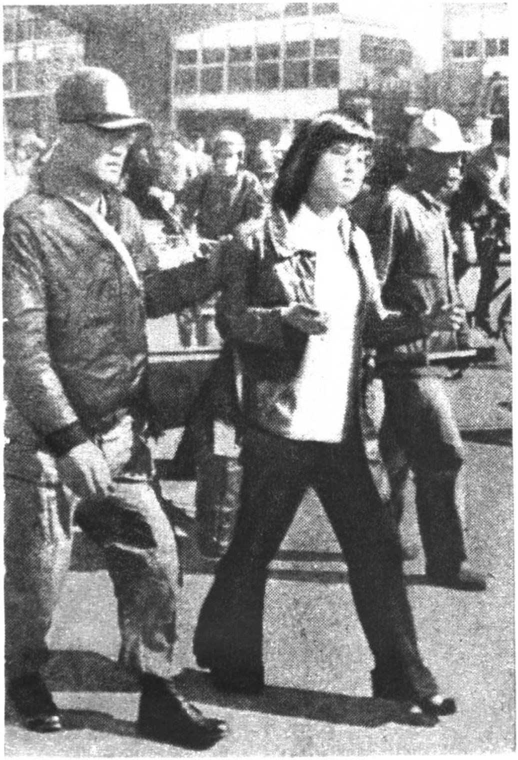
傀儡警察逮走发表《时局宣言》的人。

被监禁者家属们进行静坐斗争，要求释放被监禁的民主人士和青年学生。



汉城大学文理学院学生同非法闖入学校的傀儡警察进行搏斗。

当局把奋起展开反法西斯争取民主的斗争的学生拉到法庭去。



朴正熙法西斯集团恣意逮捕要求“废除维新宪法”和保障学校自由的女学生。

包围延世大学的南朝鲜傀儡军和怒视他们的过路的儿童们。

目　　录

真实已匿迹……………………………………………（1）
金大中的证言………………………………………（1）
片刻不停的拷问……………………………………（12）
《皇帝的新装》………………………………………（20）
持续不断的抵抗……………………………………（29）
令人作呕的审判……………………………………（29）
求刑的结果…………………………………………（36）
第二民主救国宣言·　　　　　　　　　　　……（46）
一丝的自豪感……………　　　　　　　　　……（52）
第一审结束后……　　　　　　　　　　　　……（52）
无止境的黑暗……　　　　　　　　　　　　……（57）
国民毫无表情的国ﾞ　　　　　　　　　　　……（61）
劳动战线……………………………………………（65）
无法无天 ……………………………………………（71）
底层的沉郁空气……………………………………（71）
充满矛盾的感情……………………………………（75）

愚昧的时代 ………………………………………………… (81)
海难事件…………………………………………… (81)
重新开始的审判…………………………………… (86)
冷酷的冬日 ………………………………………………… (95)
三个人的证言……………………………………… (95)
国会上的问答……………………………………… (102)
汉城大学的民主救国宣言………………………… (110)
无可逾越的界限…………………………………… (116)
"三·一法庭"的语录 ……………………………………… (121)
充满象征的日子…………………………………… (121)
律师的辩论………………………………………… (127)
不稳定的政治……………………………………………… (142)
疯　狗……………………………………………… (142)
事件神学…………………………………………… (148)
即兴政治…………………………………………… (154)
前　夜 ……………………………………………………… (162)
战斗的人们………………………………………… (162)
贫穷的人们………………………………………… (170)
四月宣言 …………………………………………………… (180)
黎　明……………………………………………… (180)

民主救国宣言…………………………………… (185)
对良心犯的报复…………………………………… (191)
流言满天飞的日子 …………………………………… (200)
绝食斗争…………………………………… (200)
春日琐记…………………………………… (204)
附　录 …………………………………… (214)
“三·一法庭”的语录 …………………………………… (215)
执政者在杀害有良心的年轻人
尹潽善…………………………… (215)
在“韩国”的现实中，所谓事实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郑一亨…………………………… (217)
眞的要继续推行这种暴政吗？
李兌荣…………………………… (218)
我是从军事政变当时起就反对这个“政权”的
咸锡宪…………………………… (221)
难道“维新宪法”也属于法律范畴吗？
徐南同…………………………… (224)
中央情报部是鎭压人权的工具
咸世雄…………………………… (226)
我怨自己托生为“韩国”的女人
李愚贞…………………………… (227)
掌权者逼人把太阳叫做月亮
申铉奉…………………………… (229)

这就是这个国家执政者们干的勾当
文正铉…………………………（233）
朴正熙和他的一伙是长不了的
尹攀熊…………………………（235）
“维新体制”是为朴正熙一人永久执政的
金大中…………………………（237）

真 实 已 匿 迹

金大中的证言

一位熟悉我国情况的外国朋友在我国进行访问后离开时对我说的一些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

"和从前相比， 最明显的变化是那开朗的国民不爱说话了。 因为人们闭口不谈， 弄得人们不能表示友好的情谊。 一位传教士去旁听在地方进行的对一个牧师的 审 判后，告诉我说：去旁听的牧师们分乘两辆汽车走了三个多小时，可是他们一路上几乎不说话。因为他们要说话，就要谈到政治问题上去，不是进行批判掌权者的说教，就是谈那天受审的牧师的事。况且汽车上说不定还有偷听装置呢。弄得韩国国民这样不敢说话，不会憋出病来吗？！"

这两辆汽车载着这些到地方城市去旁听审判的人们到达目的地时，审判已经结束，那位所谓被告——牧师被判了七年六个月徒刑。 审判是比预定时间提前半个小时 进 行的。据说，当局威胁那两个汽车司机故意开慢车子，还把一些外落塞到他们兜里。就是人权遭到了蹂躏，也没有可以交换意见的人，更没有可以控诉的地方。你一旦被卷进

政治问题，不管你遭到的是死难还是监禁，或者是拷问，都不能让人知晓。因为如果把这些事传出去，你就会遭到迫害。

帮助那些受苦的人也同样会遭到迫害。想帮助那些被放逐的同事也不行。如果那样做，下回就有可能自已被放逐。人们在本能的恐惧中，只为保全自已而活着。的确是堕落的社会。曾坐过牢的学生过着悲惨的生活。据我的朋友好不容易对一百多人的情况进行的调查资料，他们半数以上由于极度的贫困和营养失调而受折磨。其中，有的年轻人因此得了肝炎，生命垂危。他们都按照“社会安全法”受监视。恐怕有十万到三十万人在受这条法令的约束。因为凡事都在秘密地进行，所以不能全部掌握谁在什么地方遭受什么样的折磨。据说,至少有几百个人根据这条法令，毫无根据地被逮捕，至今还不知下落。根本听不到这些无名的人们遭受拷问发出的呻吟声。如果犯了这条法令，包括象天主教池学淳主教那样的人在内都要受到镇压。如：

一、保护监察处分：不但时常受监视，还要三个月一次到警察当局报告他在这个期间的行动、他见面谈话的人和他去过的地方。

二、限制居住区处分：居住和旅行都不能超出警察当局指定的范围。

三、保安监护处分：收容到集中营里。现在当局借口集中营还没有竣工，把人们关进监狱里。据说他们正在扩建牢房，建设集中营。那些“大有犯罪可能的人”，不带拘票也可以收容。期限原定为二年，但可以随时延长。这就

等于“对没有具体的犯罪行为的人不经审判就执行无期徒刑”。

以“法”为招牌搞的这种恐怖，是从一九七五年七月开始实行的。对著名人士则不用这种“法”收容。我认为，当局现在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装出进行“公正审判”的样子无非是要以此掩盖他们那无数的恶毒行径。有一位先辈为这种“法”很是忧虑，他对我说：

“当权者的这种明目张胆的恐怖行为，是从实行紧急措施第九号开始的。也就是从由于印度支那局势而大为恐慌的朴正熙同金泳三进行会谈之后开始的。在野党对此只喊了一声反对，显得无能为力。去年十一月，汉城大学学生发表声明说，这种恶法是要把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变为希特勒统治下的犹太人的。池学淳主教为了迫使当局废除这条法，要求在野党新民党进行共同斗争，但没有得到同意。有没有办法引起对这个问题的世界舆论呢。国际大赦令委员会能不能对此做一番调查，把它作为问题提出来呢。”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打破沉默而向国外发出呼吁，还能说是事大主义吗？法西斯分子们是有国际联系的，但不允许抗拒它的微弱势力那样做。法西斯分子不让这个国家的国民结成国际联系，力图任意摆布他们。

凡事都是如此。独裁者说，准备复考大学入学考试的人太多了，这实在叫人讨厌。于是，文教部发表所谓“再修生规制试案”，规定如果第三次应考，就要扣分； 第四

次就不允许应考。在这个国家，只要独裁者一出面就常有这种现象发生。

独裁者为了继续把持权力，在全国造成了反共政治空气。试举东亚日报，近来也许是因为不能登有关国内政治的文章，就登了三篇连载作品。有一个反共的检察官曾为解放初期的血腥历史出了一把力，如今又暗地里为中央情报部效劳，正写以《当年的那件事》为题的连载作品。据说现今他成了律师，常受委托为“旅日韩国人间谍团事件”等案件做辩护。这可能是因为他和中央情报部有联系，期望得到他的帮助。然而事与愿违，结果总是免不了浪费资金和失败的。另一篇连载作品的题目是《创伤至今还未……》，这是以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的日子——译者注）前后的事件为题材的。接着是题为《红色的阴谋》的文章。这是为揭露韩国战乱前夜的所谓“伪装的和平战术”而写的。据说登完了这第三篇连载文章，就要登题为《板门店》的有关停战后来自北方的攻势的东西。这种报纸，不该叫报纸，而应该叫反共宣传品。他们干出这种勾当，还恬不知耻地向北方呼吁什么“和平共处”。这个国家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断绝联系，这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来看都是不应该的，再说怎能这样忍受下去呢！要让这种公然相持为敌的局面持续到什么时候呢？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朴政权认为不这样做，就不能维持政权。我曾经在一次通讯里说有一个名为《韩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的怪诞的小册子在传播。那本书满篇是欺骗和捏造，说什么国际共产主义对世界教会、日本教会以及韩国教会进行渗

透。那本书至今仍在引起物议。

因为那本书的内容尽是些捏造出来的弥天大谎，基督教方面提出要停止分发那本书。据说，那本书是所谓韩国宗教问题研究所这个幽灵团体发行的。人们提出抗议说，在实行紧急措施的情况下，那种团体怎能存在并出版那种书，而且由政府方面分发呢？这显然是策划分裂韩国教会的。政府受到这样的抗议，不得不答应停止分发那本书。但他们仍然在暗地里把它分发到全国各地去了。政府还把它用作进行新村教育的教材。这回又为证实国际共产主义对韩国教会进行渗透，逮捕了曾在贫民村传教的朴炯圭牧师等十一人。

基督教广播电台用打游击的方法报道说，自称基督教徒的现统一院长官任总指挥谋划和干下了这件事。据说，那个长官同记者会见时说，因为那本书内容好，所以把它用来进行保安教育，并分发到全国各地去。他们就这样以“共产主义”为口实，一步一步地实现他们完全镇压教会方面的抵抗的计划。他们连教会的牧师也弄成“共产主义组织的运动者”的情况下，把访问祖国的旅日韩国人弄成共产主义者是再容易不过的了。

现在，韩国教会对当权者的这种阴谋采取强硬态度。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和主要教派联名发表声明进行抵抗。声明要求公开幽灵般出现的《韩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这本小册子的出处，揭发与它有关的人。声明还对于当局分发这本书后，逮捕贫民村的传教士，并企图给他们扣上与共产主义有关联的帽子一事提出了如下的抗议：

“那些牵连者是为了同不幸的人们一起共患难，建设更光明的社会而进行传教活动的。但是当局却要把他们说成是共产主义者，这显然是出自错误的判断的作为。因此，当局必须慎重处理这个问题，以免今后政府和教会之间发生不必要的磨擦。”

这个问题，今后可能成为相当重要的问题。从五月二十五日起被捕的十一名传教士如今在狱中。说他们由于贴在西大门附近的赞扬北方的传单受了嫌疑，但这只不过是一个借口。看来，当局认为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等事件的背后也有这些贫民村的传教士参预。因此，当局考虑世界舆论，对三·一宣言事件装出搞公开审判的样子，甚至摆出一些东西作证据，但在幕后残酷地镇压那些不大出名的人们。

奇怪的是，国内的报道，甚至对金芝河的审判也只字不提，而对三·一宣言事件的审判报道了几行。这一切分明是出于一定的计策的。

下面谈谈近来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情况。

审判的方面依然限制发旁听证，不进行公开审判，连律师也不能同所谓“被告”自由地见面，家属们对这些情况提出抗议并进行着斗争。在这里我要凭我的记忆报告在六月十九日进行公审时金大中对律师的反讯问所作的答辩。金大中连一个数字也没说错，根据实实在在的事实，作了逻辑严整的答辩。

律师： 在检察官审问时，可能有未能答复的问题吧。

金大中： 我不承认这个起诉。这个起诉是根据维新宪法和紧急措施的。这些东西民主国家是不承认的。一九七二年搞的宪法修改，是和希特勒曾在奥地利干下的勾当一样的东西。在戒严令下是不会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正是投票率高这一事实说明这一点。说什么维新宪法是为了统一和保安的，那么靠以前的宪法就做不到这一点吗？这倒是很奇怪的。 搞维新的理由不在这里。 实行以前的宪法时，我们还是自由的，信仰也得到了尊重。我们在韩国是为了争取自由的。世界的人们为了自由，同希特勒进行了斗争。但这个国家的政府却说“为了自由”，要忍受独裁。另一方面，少数人掌握经济力量，搜刮大量的钱财，任意挥霍。在这种情况下，国民的处境会怎样呢。

律师： 对国民团结有什么意见？

金大中： 有自由才能维护国家。使国家强盛的途径，可以拿家庭作比喻。作父亲的不应该用强制的办法，而应该用说服的办法带领家庭。 政府不应该只企望有百分之百的支持，而应该倾听反对的呼声。从这种角度来说，我不能支持现行的体制。

律师： 起诉书上说，你是极端地反对政府的。

金大中： 我是政治家。为了掌握权力而积极活动是应该的。我和在座的牧师或神父不同。我当然对政府采取积极反对的立场。那是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的现状深感忧虑。我决不认为民主是无能为力的和没有效力的。现在我们这里只有腐败和独裁。这样下去，只能向共产主义屈服。和

越南和柬埔寨的情况一样，独裁和腐败是必然招致那样的后果的。

律师： 据说，你为推翻政府进行了有组织的活动。

金大中： 声明的内容甚至在韩国的报纸上也没有登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说什么颠复政府啦什么啦，这显然是政府在无中生有地捏造事件。

律师： 据说，你策划了类似四·一九的民众起义。

金大中： 我们只谈了我们认为重要的问题。朴正熙曾说，应该尊重宪法，还说他将不参加第三次总统竞选。可是他自食其言，完全背弃一切诺言，无视民主秩序，建立了维新体制。我们根本没有想搞出四·一九当时那样的事态，而且认为那是办不到的。我们很想同民众说话，也想同政府谈话。可是政府以保安为借口拒绝对话。我作为批判性政治家，要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同现当权者进行竞争。但政府不允许我这样做。看来政府不喜欢人们站在正当的立场上求得变化和发展。政府很怕挑战。即使维新算是必要的东西，也该用正当的手段来维持。政府不应该做国民的敌人。

律师： 这么说，你未曾希望发生四·一九那样的事态？

金大中： 三·一独立运动曾是和平地有秩序地进行的。我们希望的是那样的和平和秩序。四·一九当时，因为政府对国民的抗议表示了过分的反应，所以发生了那样的事态。我们当然要继承三·一和四·一九的精神。如果把这看作是扇动，那可太遗憾了。我认为，政府对这次的

宣言表现了过度的紧张。我们因为不能谈论民主，曾经深感颓唐。我们很想凭良心为民主的发展说几句。我们想向韩国国民传达我们的这种心情， 要求政府同我们进 行 对话。除此而外，我们还能有别的途径吗？怎么能毫无准备地举行大规模的起义呢？

律师： 声明里写道：“这个国家的国民被束缚于独裁的锁链”，起诉书指责这是歪曲了现实的。

金大中： 从前的宪法和维新宪法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自由。维新宪法抛弃了对工人的保护，使国会的职能形式化，把权力都集中在总统手里了。从前，要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就要得到国会的同意。但是现在，即使没有发生全国性危机，总统也可以在所有领域，甚至在外交问题上采取紧急措施。国会只能向总统提出意见。司法也由于维新和紧急措施而失去了独立自主。无限制的独裁已经成了体制。总统随时可以命令解散国会。总统的权限又是不受限制的。这里没有一点点实行民主的可能性。就拿选举总统来说，国民没有投票的机会。竞选时向国民提出保证是惯例。可是这个国家就没有这一套。在野党根本没有掌握权力的机会。甚至不能以总统候选人出马。总统任命三分之一的国会议员。所以，在野党也就不可能占据多数席位。就算国民的三分之二为在野党投赞成票，在野党在国会也只能占三分之一的席位。加上，总统可以随时解散这个国会。审判机关也不经国会同意，全部由总统任命组成。正象在紧急措施第四号之下那样，审判只要认为有必要，就能随时秘密地进行。能够维护人权的独立的司法，在这个

国家是不存在的。国民的主权、民主同这个体制是毫无关系的。所以说这是独裁。

律师： 起诉书上说，你主张自由遭到扼杀也是歪曲了现实的。

金大中： 我认为，自由确实遭到扼杀。在这里举信仰自由来讲，我既不是牧师也不是神父，但看了圣经就可以知道，基督教的教义是要求爱戴上帝，爱护邻居。耶稣维护了贫穷的人。我们的教会是关心社会问题的。应该同非正义的东西进行斗争。这不是政治，也不是贪图掌权的作为，而是对可怜的人们的爱护。请回顾一下教会在东亚日报由于当局的压力不能登广告时表示的关心。

律师： 据说对经济问题你曾说"一切都附属于日本"，这是事实吗？

金大中： 问题在于我国的经济在走哪条路。日本把最坏的公害产业搬进我国了。他们以苛刻的条件驱使工人。贸易公司也都是他们的。所以获得利益的不是我们。我认为我们越来越被拖入日本的控制之下。

律师： 据说，宣言里主张，朴政权要担起一切责任下台，这是真的吗？

金大中： 问题不在于话怎么说。为了扭转目前的局面，这个建议不会是错误的。掌权者们应该为自己造成的事态负责任。韩国的经济债台高筑，年年有增无减。究竟要怎么办呢？拿一个公司来说，事情弄糟了，就会要求担起责任，这是理所当然的。难道说这是错的吗？对这样温和的忠告，政府应该表示感谢。

律师： 这次事件是由言论引起的，你谈谈对言论自由的意见。

金大中： 维护言论自由是实行民主的第一步。特别是，宗教徒应该受到保护。不让他们说话是不应该的。正象文益焕牧师在这里谈到的一样， 他们是因为在上帝面 前 负责，才说话和行动的。把这说成叛逆罪的紧急措施，才是罪恶的东西。

今天在我国， 只有这样的法庭才能成为谈真实 的 场所。许多教会和大学早已不谈真实了。只有聚在法庭里的不到二百的旁听者才能听到这一真实，这又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啊！当局为了把真实囚进法庭这个孤岛里，只给被告的家属发旁听证。当局用这种程度的“公正审判”来装装门面，而其余的所有法庭则仍旧笼罩着黑暗。政府对这一审判表现出宽大为怀的样子，希望以此向世界宣传韩国的人权问题似乎逐渐得到改善。

看来，政府正忙于最晚在八月中旬结束这个审判。有的说，到那个时候，暂时形式上废除紧急措施。这是朴政权要为在秋季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福特的胜利做献礼的。但是，就是现在也在干出无数的罪恶勾当。金芝河在非公开的法庭上，以雄辩继续进行法庭斗争。他谈论解放神学，援引圣经，使审判官们不知所措。可是他本人几乎不看旁听席一眼，脸上不露一丝微笑。他可能疲惫不堪了，必是耗尽了肉体的力量以至没有余力那样做。他坚持信念，以精神力作斗争， 但他好象沉陷于无尽的孤独感之中。 近

来，流传着少许乐观的论调，说不会判他死刑，但还是不能叫人放心的。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讯）

片刻不停的拷问

近来，执政党方面提出要制定“议员兼职禁止法”的方针，引起了新的骚动。这是说不许那些被选为议员的律师和医生从事本业。这为的是要对勇敢地为政治犯作辩护的人下“缄口令”。执政党宣布要强行通过这条法令，而在野党新民党则决定反对它。于是执政党议员律师和医生自动决定“停业”；在野党议员八名律师正处于窘境。执政党威胁说，如果不“停业”，国会就把它看做是“营利行为”，将对全国的律师和医生征收营业税。现在，为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作辩护的新民党议员律师们，为对付这种事态而大伤脑筋。

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仍在进行毒刑。汉城郊区一个教会的牧师，因为在说教时批判了政府，就受了拷刑，他的鼓膜给打破，两只脚也不能动弹，指甲也全给拔掉了。事情所以弄到如此地步，是因为他是不属于宗教团体的独立教会的牧师，全体宗教团体对此没有提出抗议。

有关拷刑的消息，几乎传不到外面。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尹攀熊牧师在七月十日的审判中，第

一次对中央情报部拷问他这六十四岁的老人的事实提出了抗议。他说：

“他们把我打得简直要昏过去了。把我打成这个样子，还不许我向外扬。我想牧师不应该说谎，所以我在这里想弄清事实。”

尹牧师虽不是赫赫有名的牧师，但可以说他象征着这个民族遭受的苦难命运。他在日本统治时期，曾因反对参拜神社而被监禁过。而如今又由于曾是日军军官的当权者，即身着制服的暴徒，遭受折磨。这个命运，真叫人啼笑皆非！这一可怕的历史今后还要演变成什么样子呢！

一位贫民村的传教者在教堂里向会员分发了三·一民主救国宣言。因为有警察跟踪，他躲藏起来了。当局把他当做严密搜查的对象，说他是北方的间谍。由于这件事，这个传教者曾寄宿过的一个穷人家的女主人被抓去受了拷问。她被打得浑身青一块紫一块的。他们说她留宿间谍，犯了窝匪罪。这个女人以不去医院治疗为条件，才获释回家，正在卧病。但她不时地深更半夜里被抓去，通宵受折磨。这为的是要逼她招供，说那个传教者是红党。

这个传教者的夫人现在被中央情报部人员拖着到处奔波，搜索她的丈夫。在中央情报部的镇压下的这位夫人，呼吁丈夫出来自首。她说：“只因为怕挨打躲藏起来，怎能称得起是传教者呢？不是教会的人们都在受折磨吗？为了上帝，你要豁出一条命出来自首吧。我也要发疯啦。”告诉我这件事的一位先辈叹息着说：“对基督教传教士来说，现在简直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末期一样黑暗。”

这里再介绍一件最近在教会内当成一个大问题的有关拷问和捏造的事件。从五月中旬开始在西大门附近的墙壁上有人贴出了赞扬北方的传单。其中也有支持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到了五月下旬，当局把它断定为贫民村传教者的作为，逮捕了十一人。这是由警察领头捏造的事件。在民间，纷纷议论说，那些传单是警察当局为捏造事件而贴出的。人们推测到：不久将在韩国教会内捏造出大间谍事件迫使教会保持沉默。

六月五日，朴炯圭牧师等人被捕了。不久其中有一个人在审讯中逃跑，到美国人传教士那里，请求他要把企图捏造间谍事件的事实告知全世界。然后，他到警察当局去自首了。有风闻说，这是警察当局为把外国人传教士也拖进这个事件而策划的阴谋。所以有这种风闻，是因为那个人一自首，警察就立即对别的传教士也开始了审讯。警察当局可能认为，他们用这种伎俩可以制造借口，来把那些同情民主运动的外国人传教士驱逐出境。

还流传着这样的风闻：警察当局断定这个贫民村的传教者们从旅日韩国人那里得到资金。警察当局为造出证据捏造与事件有关者为红党，下很大的工夫，一一去找他们小时的朋友。还到那个传教者工作过的教会，强迫那里的干部写一份证言，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如果不接受他们的要求，就威胁说："今后对你没有好处。"在这些日子里，《韩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这个小册子在全国传播开来。还用《对韩国基督教的理解》这本小册子教育警察。这本小册子说明了国际共产主义怎样对世界教会协进会和日本

教会进行渗透，又怎样深深打进了韩国。根据这个脚本，贫民村传教事件逐步升级地扩大了起来。这是要对韩国教会给予致命打击，分裂教会，隔断教会和民众之间的联系而搞出的勾当。

但是，事与愿违，各教会对此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攻击说，自称基督教徒的、操纵这次活动的中央情报部成员也罢，高级警官也罢，政府要员也罢，都是和叛徒犹太一样的家伙，并且向世界教会致公函发出了呼吁。就这样，利用南越失败后在韩国教会里重新抬头的反共苗头来制造的这一令人疑惑不解的罪恶勾当碰上了暗礁。

七月六日，警察当局终于决定缓期起诉，释放了与事件有关的人们。 当教会领导人和外国记者陆续赶到 监 狱时，警察们就大为惊慌，手忙脚乱地把一部分获释的人从监狱后门放出去， 把另一部分拉上轿车飞快地驶出 了 前门。

在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当局对这些世界教会所关心的人施加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拷问。对牧师等圣职者如此施加迫害，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目前，韩国教会对此提出抗议。有的传教者在出狱时，脸色发青，表情犹如不知悲喜的木偶一般。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被拉到刑房去。他们被关在没有灯光的地下牢房里，晚上只能睡一两个小时，不断地受刑讯。刑讯官把他们绑在椅子上，把方木棒夹在两腘中间，然后狠命地打，一会儿说要马上处死，一会儿说要饶你坐三年牢。有时，把他们架到车上驶到教会或他

们家的附近，又突然转换方向。有时往鼻孔里灌水或吹入辣椒面儿。这样过了大约两个星期，弄得他们简直要发疯了，以至任凭刑讯官摆布，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刑讯官说，只要你招供某个同事或先辈领导人是共产主义者，就赏给你几百万圆。

有的刑讯官把圣经抱在怀里，装出一副虔诚的样子做祷告后，嚷道，象你这样的共产主义者应该以上帝的名义杀掉。然后诘问，你到北方去过几次。据说，那时他们诅咒自己为什么做了传教者。监狱，简直是使人一筹莫展的活地狱。他们被释放时，当局强迫他们发誓：再不去贫民村传教；不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审判政治犯的法庭；决不提受拷刑的事。但是，他们受拷打的痕迹非常明显，今后可能会闹成大问题。告诉我这种惨状的朋友最后说道：

“连刑讯官也都说，基督教徒真是些顽固的家伙，竟能经得住拷问。根据最高的指令捏造的这个事件就这样流产的原因在哪里呢？用拷刑也未能使他们招供是一个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各教会都团结起来了。各教会将向世界教会特别是向美国教会发出呼吁。到那个时候，世界舆论将变得越来越坏，对联合国和美国总统竞选也发生不好的影响。教会对国际政治起到这样的作用恐怕还是第一次咧。恐怕就是为了这一点，美国外交界出面插了一手。”

福特政权和朴政权的关系就是这样的。只要对舆论不发生影响，美国统治阶层是不会过问的。如果卡特当选为总统，朴政权会使出什么样的伎俩来维持残暴的权力呢？

恐怕它早已开始研究对策了。他们不会有什么新的政治本领来应付新的局面，他们只有新的阴谋罢了。下面扼要地报告在六月二十六日的法庭上，律师进行反讯问的情况。

律师： 你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上签名的动机是什么？

文益焕： 三·一节是不能白白地度过的。宣言是要求自由的呐喊。一九六〇年四·一九的呼声、今天我们的呼声，都是要求自由的呐喊。自从祖国获得解放的同时被分裂已经三十年了。但现在不是追究招致分裂的责任在哪里的时候。祖国应该得到统一。在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象今天这样重要的时刻。维新体制是削弱民族的，这等于自杀行为。不应该只管服从，而应该根据民众的意愿，把向往统一的力量团结起来。不能同民众一道朝着这一方向前进的现体制应该换掉。经济方面也是如此。

律师： 你是加列利亚教会的会员吗？

文益焕： 我是。教会是不问那个人赞不赞成政府政策都吸收做会员的。只是要求他们都要按照圣经和祷告看问题。对我们需要的是象纳粹德国时期的忏悔教会那样的教会。所以我们办起了加列利亚教会。可是政府却说我们在策划颠复政府的阴谋。政府把批判看做是反政府、反国家的行为。他们认为国民根本没有要求更换政府的权利。并且把批判看做是叛逆行为。

律师： 据说，你歪曲事实，说在实行独裁。

文益焕： 那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政府说，为了不再重

演南越那样的事态，必须实行独裁。难道南越所以灭亡是因为有民主的缘故吗？南越没有给国民提供选择民主来代替独裁的机会。听说，朴正熙要搞苏加诺式的教导民主，但那不是什么教导民主，而是倒退的民主。故张俊河为攻击李承晚政权的独裁而写的书出版了。现政府正在没收这个书。这不就说明李承晚独裁和现政府是同样的吗？！

律师：据说你歪曲事实，说现在没有言论和宗教自由。

文益焕：无论是言论还是学校，都受着残酷的镇压。甚至禁止我在学校的礼拜堂讲话。教会要发言，那个教会的干部就受到压力。

律师：你对经济发展有什么看法？

文益焕：我们怎么被日本控制到这种程度了呢？日本的影响不是在日益扩大吗？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大加宣扬的那种经济发展，不过是和独裁的崩溃同归于尽的东西。经济领域也应该有民主权利。 究竟要工人们等到什么时候呢？靠贷款维持的经济是和空贝壳一样的东西。

下面谈谈咸锡宪在法庭上的申述。从这天起，咸锡宪身着韩国的丧服——麻衣出庭了。他可能是为的吊祭民主之死。然而他开口说，他这样打扮是为在上帝面前对蹂躏人权表示赎罪， 而且这也是这个法庭的预兆。 讯问一开始，审判官就进行干扰，弄得法庭非常喧嚣。律师问到咸锡宪发行的《种子之声》，审判官就说，这与本案无关，并命令取消这个问题。于是开始了如下的一问一答。

律师：你参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理由是什么？

咸锡宪：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我很想尽可能回避政治。我并不是勇敢的人。我只是想应该说点什么。我不认为我做的事是政治运动。批评是应该虚心接受的。在这一点上， 我总是和中央情报部争执不休。 我想，我有权利说出我想的东西。国民团结也许是必要的，但为此就非有维新体制不可吗？强迫所有国民沉默是对的吗？应该使所有国民尽自己所能为国家做出贡献。不应该用暴力，而应该以精神领导国民。

律师：你要求过更换政府吗？

咸锡宪：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朴正熙。他是连自己的诺言也不履行的人。他说要把腐败现象一扫而净，可是这种现象不是越发严重吗？

由于审判官的干扰，咸锡宪的答辩中断了好几次。检察官也攻击说，这与其说是法庭上的答辩，倒不如说是说教。咸锡宪也大声喊道："判几年徒刑也可以。 只要是为的争取民主，那么点牺牲还是微乎其微的。"看来审判官竭力不叫他说话，想尽快结束审判。坐在律师近处的一个来历不明的汉子专心写字条叫法庭文书传到窗外去。还从窗外传进来写了什么指示的条子递到审判官那里去。很可能是中央情报部的指示。

审判官多次强调，要尊重法律，遵守法庭秩序，并说检察官是国家的代表。这些话，旁听者听起来都感到很奇怪。难道这也算是法律？这也算是合法的法庭？他们一味服从卑鄙的一人独裁，开口就强调法律，而且只为保全自

己的地位和生命，干尽恶毒的勾当。但看来，他们不会承认这一点。我感到他们很象是怯懦胆小的埃希曼。他们才是把暴力说成是法律，犯下维护这个法律之罪的犯人。依我看，被关进监狱里并在这个法庭上申辩的人才是具有伟大精神的人。该进行审判的人却在受审判；该受审判的家伙却进行审判。正因为如此，审判官认为被告的答辩是讨厌的说教。但是旁听者却为之而确信胜利，抱着希望。

《皇帝的新装》

在中央情报部的操纵下闹开了的、自称在野党的新民党内部争斗越来越陷进无底的泥坑。据说，这个党的前领导人金泳三留下分裂了的党，准备去日本旅行。对他们来说，在这闷热的炎夏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进行的令人悲痛的审判是无关紧要的。正象中央情报部所预料，国民完全背向着他们。中央情报部对教会也进行着这种分裂活动，但还没有成功。教会所以能够维持下去，不只是因为出自宗教信仰的力量，而且是因为它和世界教会有着联系。中央情报部对金泳三的工作是从去年五月发表紧急措施第九号以后金泳三和朴正熙进行秘密会谈时候起开始的。据最近听到的消息，朴正熙给前总统尹潽善也提出过同样的建议，表示希望进行单独会谈。但是，尹潽善回答说，如果不是他这一方面推荐的第三者参加的会谈，就不能应承。从此以后再没有联系了。朴政权根本不把团

结、对话放在眼里，他一味企图用阴谋诡计把在野领导人统统埋葬掉。

七月三日的公审一开始，就由律师继续进行了对文东焕牧师的反讯问。文东焕牧师表示支持金芝河的神学观点，并反驳了说金芝河是共产主义者的主张。基督教信上帝，并不是为了升天堂，我们笃信的是对这个社会的所有东西起作用的上帝。由于他用这种神学论继续进行辩论，自然又和审判官发生了冲突。审判官甚至说："你还不知道这是在进行审判吗?"但律师和文牧师都没有示弱。文牧师申明，我们的主张是要朴政权下台。

在文牧师答辩以后，审判长横加干扰，不准一个被告答辩超过一个小时。他说，天气越来越热，要赶紧结束。他的话引得旁听者哄堂大笑。审判长大声说："别笑，这不是笑话。"发言虽然受到了不少的限制，但想在这里介绍的东西却很多。今天，在这里只介绍有代表意义的发言。

李愚贞教授：我体验到教育的自由怎样遭到了扼杀。班级的和教授会的一切情况都有人报到当局。没有可以说话的地方。学生们是不可靠的。现在又建立了学生护国团，一切都是命令。在这样兵营化的学校、卷进互相猜忌的风潮之中的学校里能产生什么呢?

李文永教授：我对朴正熙没有好印象。我怀疑维新体制的建立是否合法。一九七一年竞选时，朴正熙得了百

分之五十稍强的赞成票。但据说，在戒严令下对维新宪法进行投票时竟得了百分之九十的赞成票。这是赞成率最高的一次投票。这可是一个伟大的变化啊。凭良心我不能承认这个数字。

安炳茂教授：在草拟这个宣言时，我们采取了最诚恳的态度，基督教徒不用说现在，将来也比谁都更关心共产主义和保安。比谁都维护穷人和工人的人权，并为夺回人权而继续进行斗争。政府可能不愿负起责任，但最好不要拖得太迟，尽早改正错误。

李海东牧师：大家都过分地袒护我这个牧师。坦率地说，我作为牧师受到基督的爱， 不关心社会问题， 就不能活下去。 不能因为有紧急措施 第九号而昧着良心活 下去。如果我根据你（指审判长）的命令，走出这里，到街上说教的话，我就打算照实说出我的感受，而且还谈社会问题。因为体验了监狱生活，我将更多地谈自由。我在牢里象老鼠和鸽子一样吃和睡觉，但这决不是自由。应该享有生活的自由。我现在清楚地懂得了，如果走到外面应该怎样谈人权和自由。我将主张建设自由的社会。

很抱歉，这个通讯写得太长了。这是因为我想把只有在那仅仅容纳二百名左右的人的法庭上才能听到的这伟大的证言尽可能传给更多的人知晓。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应该传达的消息，可是今天想集中地介绍法庭上的证言。

七月十日在法庭上谈到的内容也都是非常可贵的真实。但是请原谅，今天在这里只想详细地介绍从延世大学撵出来的徐南同教授的政治神学色彩很浓的伟大证言。这个证言，可以说是他在被大学撵出来、失掉学生、家属陷于困境的情况下，给把他的话只当耳旁风听的审判官和检察官上的一堂神学课。说话的人可能希望，即使国内的人们不能听到，也要让它传到远处的朋友们那里去。这次审判也和往常一样，家属们为抗议非公开的审判，在基督教会馆用浅紫色的线刺绣了《祈望恢复民主》字样。

为在一天之内结束律师对五名神父的反讯问，把审判一直搞到下午八点过。简直是一次强行军。尽管这样做，对申铉奉神父的审判还是不得不推到下次进行了。对没有拘留的被告，允许他们下午回家。金大中也因为身体不舒服，难以忍受，离开了法庭。因为开着的窗户被风吹得光当光当直响，就把它关上了一半，法庭里简直象蒸笼一般闷热。徐南同教授的证言是上午做的。

律师：你被韩国神学院撵出来的理由是什么？

徐南同：我被撵出的不是韩国神学院， 而是延世大学。看来起诉书上是那样写的，检察方面就是这样歪曲事实，所以他们是不可信赖的。我被放逐的理由还不清楚。一九七四年，教授和学生因民青学联事件被捕时，我曾同四十名教授一道举行了四次祷告会，可能是这个缘故吧。我作为神学系的教授这样做，不是应该的吗？大学校长要我提出辞呈，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他说这是

文教部的指示，他也无可奈何。校长对教育和干部问题不负责任，那末究竟由谁负责呢？我就是这种不正当行为的牺牲者。

律师： 据说你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上签了名？

徐南同： 我听到那是要求恢复民主的， 就 当 即签了名。出版、宗教和研究工作的自由是比什么都迫切需要的。我被撵出了学校，而且还被禁止发表论文了。也不能到教会去讲话了。有一次我到聚集了二十名学生的教堂去了。可是，竟有一百多名警察涌来包围了教堂。由于对教会施加压力，我在那里也没能讲话。对自由施加的这种压力，对现在的我个人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南越政府所以垮台，是因为那个政府没能扎根于民众之中，没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得不到国民支持的独裁政治就是同北方进行较量也会是无能为力，遭到灭亡的。就是有再多的美国武器也是无济于事的。

律师： 据说，你曾企图篡夺国家的权力。

徐南同： 请问审判官，在民主国家，抱有要掌握政治权力的意图，就是犯罪的吗？国民不是有权要求更换政府吗？有这种意图怎么能构成罪呢？但是，我们过去连抱都没抱过那种意图。因为我们不是政治家。我们想说的是，要把民权还给民众；要为民权重归民众而斗争。我认为，不斗争，政府就不会还给你民权，所以我自己应该起来斗争。

律师： 你同贫民村的人们有什么关系？

徐南同： 他们贫穷，并不是因为他们懒惰，而是因为

政策不好。如不为改变这个政策而斗争，就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但政府却不想改变政策。请问检察官，你认为这是企图颠复政府的吗？我国政府竟修改三四次宪法力图维持政权。因为那样迷恋于政权，所以对一切一向是刚愎自用的。

律师： 你和加列利亚教会有关系吗？

徐南同： 有关系。教会确实很关心韩国的现状。他们在向上帝祈祷：改正这个社会的罪恶。请问审判官，许多国家都有在野党，那些都是反政府团体吗？批判不是反政府。在政府憎恨国民的情况下，由谁来要求民主，又由谁为消除腐败而活动呢？ 这个国家政府的 目的 究竟是什么呢？去年，中央情报部尝试过同教会领导人进行对话。那时，中央情报部说，解放神学是危险的东西。那类话，还是不说的好。那是错误的。如今的世界神学正朝着这个方向走。据我了解，罗马教皇也照着这个方向下指示。他近来，比起拯救个人，更关心社会构造或社会性事件。必须消除社会罪恶，改变社会构造，否则个人就不能得救。这种神学不是要颠复我国政府的，它是渊源于圣经的世界神学的思潮。历史的主体是民众。世界教会协进会或梵蒂冈都想朝着这个方向走。我们所说的解放就意味着拯救。拯救的中心思想是福音。我们所说的解放并不意味着颠复政府。

律师： 据说，你对外国舆论给了不好的影响。

徐南同： 要说对外国舆论的影响那不是我力量所能及的。 我认为正是由于政府没能保持平衡才恶化了海 外 舆

论。

律师：起诉书里有“举起亚洲的火炬”这句话。

徐南同：那不过是修辞学上的提法问题。说什么企图举行民众起义，是不合乎逻辑的。签名的人，除了天主教徒金大中以外，都是新教徒。如果我们多少有举行起义的意图，那就会选择了新教教会的。我们在那里的影响力比在天主教还要大。在天主教堂，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一起作祷告，这在教会历史上是值得注目的事情。我们并没有计划举行民众起义。相反，统治者造成的恐怖气氛会导致民众起义。民众是忍无可忍的时候掀起暴动的。政府应该保持平衡。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对民众起义那么神经过敏呢？

律师：据说，你对经济情况也歪曲了事实。

徐南同：只看政府统计不就可以看出问题吗？农村日趋荒废。政府从日本搬进陈旧的设备和在日本无法继续经营的公害产业。这样做是不能发展技术的。简直令人寒心得很。

律师：对紧急措施和维新宪法的看法呢？

徐南同：紧急措施应该废除。维新宪法应该重新换成民主宪法。

律师：发表宣言的目的是什么？

徐南同：那不过是民众作为民主市民行使了向政府请愿的权利。

律师：今年一月，你参加了在原州举行的天主教集会吗？

徐南同：我是应邀去参加的。我本想讲有关金芝河的

问题。当我听到许多外国神学者有关研究金芝河的问题的讲话，惭愧地感到了自己的无知。我在世界教会协进会会议上受到这种冲动后， 也开始研究了金芝河。 他的作品《蜚语》中的《左轮手枪》，特别使我深受感动。在原州，我很想更多地学习金芝河。在《左轮手枪》谈的不是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搏斗，而是独裁和基督教的搏斗。金芝河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基督教徒。看了他的良心宣言，就知道他是非常诚实的天主教徒。听说，金芝河在牢里连圣经也看不到，所以在原州举行弥撒时发表的声明上签了名。

律师：基督教里有讲维护民权的条款吗？

徐南同：整个旧约圣经和所有预言者都是为受虐待的人、被夺去权利的人呐喊的。据新约全书记载，耶稣也是为他们的权利呐喊和斗争的。我想，别的宗教也有同样的关心。

律师：请你谈谈你总的感想。

徐南同：起诉书甚至歪曲了我的履历。对于加列利亚教会也歪曲了事实，一切都是夸张了的。请问审判长，紧急措施第九号有法律根据吗？我没有学过法律。连六法全书这个书名都没听说过，到了最近在监狱里才研究了这个六法全书。可是，在那里没有找到紧急措施的法律根据。尽管如此，审判官们却把紧急措施当做伟大的基本法律。我倒想起了安徒生的寓言故事。国王穿上了自以为是最漂亮的、实际上是没有的新装。而且说，心眼儿坏的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可是，儿童们看到一丝不挂的国王，就嘲

笑了他。因为儿童的心是天真纯洁的。紧急措施不就是这样的东西吗！

大家都笑了起来。没能笑的只是审判官和检察官。但是，这一笑里满含着泪水。

徐南同牧师谆谆教导似地讲着。他也许陷入了错觉，好象自己不是站在法庭上，而是回到了可爱的神学教室。这个法庭，尽管笼罩着恐怖的气氛，但可以说，它还是唯一能够继续谈论和传出被抹杀的真实的犹如孤岛一样的地方。徐南同牧师讲话时，法庭里的气氛变得很肃静。幸而在韩国还有一丝良心在呼吸，虽然它还很微弱。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讯）

持续不断的抵抗

令人作呕的审判

诗人金芝河曾在法庭上说：

“从历史上来看，当国家处于危机关头的时候， 最先逃跑的从来是那些一味追求自身安乐的腐败透顶的、独断专横的当权者， 而舍身保卫了国家的却是那些无名的民众。”

当国家处于危机关头的时候，领导者应肩负重担，为拯救民族，以身作则，带动民众。但金芝河所看到的历史却是没有那种事例的。因此他道出了这种观点。就拿最近的例子来说，一九五〇年韩国战乱时期也是那样；从直到现在的朴政权的手法来看也一样，没有能够扭转这种历史的可能性。所有的国民都目睹并议论着这些当权阶层的实况。

韩国国民非常蔑视朴政权。今年七月十七日是宪法制定纪念日，也就是制宪节。在纪念制宪节的集会上，朴正熙致“贺词”说：“民主立宪政治”“依靠维新立宪政治才得到切实体现，进入具体的实践阶段”。这就是说， 韩国国民虽然从十九世纪末起展开争取民主的斗争， 但到了现

在，才依靠朴正熙的独裁争取到了民主。也就是说，韩国依靠朴正熙的一人独裁实行了民主。这就与过去的纳粹党徒一模一样，它们曾经拿纳粹主义的确立叫嚷说什么确立了社会主义。如果朴正熙执政的时间更长一点，到那个时候，他就会随和那个时期的时代趋势，说依靠他的独裁，确立了社会主义。他们不准人们谈论民主，而他们却以民主的代表者自居。所以民众对朴政权的蔑视，越来越强烈了。

虽然韩国在朴政权的这种统治之下，师生之间还是互相尊敬，同心同德的。因为有这种风气，一九六〇年四·一九革命当时，学生们展开斗争的时候，老师们也奋起涌向了街头。 一九六五年前后举行韩日会谈 当时也是 那样的。然而这样美好的传统也渐渐被独裁政权扼杀了。老师们作了维新体制的拥护者，他们背叛真理，追求自己一身的延命之策，有时甚至堕落成一味追求富贵荣华的卑鄙无耻的一伙。反映这种状况的事件就在审判金芝河的法庭上发生了。

七月二十日，对金芝河进行审判时，申相楚作为检察方面的证人出庭了。申相楚曾任大学教授和报社的评论委员等。他曾经由于发表批判朴政权的评论文章，做过批判朴政权的讲解和演讲，在年轻人中间一时颇有声望。可是今年春，他摇身一变，成了由总统任命的国会议员——维政会的一个成员。有许多知识分子渴望当上维政会所属国会议员。要当这种议员无须经过某一选区选举，所以没有必要为争取选民而花钱进行工作和费脑筋。再说，他们每月能领到一百万圆以上的最高薪水， 每年还由于国会 休

会， 能休息半年以上。 并且还拥有与国会议员同等的权力， 又有特别外落装私囊。 所以知识分子在争这样的地位。对他们的这种卑鄙无耻的态度慨叹的人士越来越多了。这次传开了有关申相楚的证言的一些话。在这里，不妨简单地谈一谈在那个法庭上发生过的事情：

检察官：你读被告的《木桩》（金芝河为写戏剧作品记下的札记）之后，有何想法？

申相楚：我想，它很象共产主义思想。

金芝河：我曾很感兴趣地读了先生写的传记《列宁》。你在那本书的开头希望读者看完全文之后，做出评价。对自己写的书，先生曾要求人们看完全文之后做出评价，也就是说，要求人们理解：该书并没有赞同共产主义。但如今先生怎么能对别人随时写下感想的、既不是一部作品也不是一本书的札记，做出那样可怕的判断呢？

检察官：你对《五贼》这首诗是怎样想的？

申相楚：我想那是加剧阶级对立，鼓吹革命的东西。

金芝河：先生，我写了那部作品的时候，你不是曾宴请过我的吗？当时，你还作为同样的天主教徒，对我能够写出这样令人兴奋的作品表示过感谢哩。世道变了。我曾读过先生写的书，也曾专神聆听过先生讲的课和先生发表的演讲。我未曾想到今天先生会风貌大变，但我并不想埋怨你，因为先生是维新国会的议员嘛！落到这种地步的韩国的现实本身就是民族的悲剧。

据说，当时申相楚吞吞吐吐，流了一身冷汗。律师同

他的一问一答也充满了冷讽热嘲。律师先问了他的职业。他回答说，他是国会议员。 接着又问他“属于哪个党派？”当他回答说是维政会的时候，律师就讥讽地说：“那我全明白了。不必再问别的问题了。”便停止了一问一答。

就象金芝河所说的那样，难道我们就该只诅咒这个令人作呕的时代吗？背信弃义，成了一个风潮。那些似是而非的知识分子投靠当权阶层一边了。然而，他们在心里惶惶不可终日，深怕如果这个世道变了，自己就没有出路。在这些议会主义者中间， 间或有高呼民族主义的。 这些人甚至叫嚷说：“金大中向国外发出了呼吁。 可见他是个何等反民族的人啊！他应该向韩国国民谢罪。”这确实是个“有勇气的发言”。当权者是通过世界的“反共掮客”同世界的当权者相勾结的，可是他们把力量微弱的有良心的人士向世界的力量微弱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发出呼吁，说成是背叛民族的行动。有一位朋友愤慨地对我说：

“西方世界的民主本来就是非道德的。 过去他们标榜了民主，但本质上他们不是帝国主义吗？现在也是如此。尽管我们现在这样渴求民主，但那些所谓民主国家，为本国的利益，如此践踏我们。可是，他们还装出一副人道主义者的嘴脸， 有时说什么‘那是令人感到非常 遺 憾 的 事情’。那种伪善的态度才是使人憎恨的非道德的行为。”

抵抗的人们虽然有时感到绝望， 但他们仍然进 行 抵抗。在审判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牵连者的法庭上，并没有颓唐的情绪。在这般令人感到痛苦的环境中，只有在

那个法庭上充满着胜利的自豪感。这使我担心这是不是他们由于情绪高昂而陶醉于幻想的胜利。

七月三十一日，韩国第一位女律师李兑荣在法庭上，以女性特有的温柔的口气诘问道：要求撤销紧急措施，怎么能构成罪呢？紧急措施本来就是为急救重患者的紧急治疗。这种紧急治疗的时间长了，反而对人有害。李兑荣用这种论调斥责当局后接着追问道：在目前这种镇压之下的“团结”，果真能说成是国民团结成一体了吗？她又说：在这“团结”的背后，是不是互不信任的现象普遍存在。牧师在贫民村进行工作是为在国民中间防止富者与贫者相互分裂的。现在所说的保安和团结，都不过是维持政权之命的借口。正是拿这些东西做蹂躏人权的幌子。不保障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保安和团结。她最后提出的如下的质问，博得了旁听者的鼓掌。

国家的威力究竟从何而来呢？ 它不是来自法律 和 制度，而主要是来自国民的。然而，如今这个国家的国民都变成了残废。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七月二十四日，金大中在法庭上把朴正熙提为证人。这大大激怒了检察官。金大中诘问检察官，你有权禁止申请证人吗？检察官提出的证人——三个牧师得到承认，但律师方面提出的证人——朴正熙和金芝河当场就被驳回，其余的十二名证人也被保留了。他们提出的证人包括主张宗教信仰、言论和大学自由的人士和有关经济问题、劳动问题、对外政策等多方面的人士。

这一天在法庭上，文益焕牧师一直坚持了自己的主张，没作任何让步。

律师：宣言上写着三·一精神好象被埋没，这句话的用意何在？

文益焕：为了争取独立，我们的救国先辈曾要求牺牲自己。可是现今的政权却反对这一点，而且禁止和压制我们的民众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这就是我写那句话的理由。

律师：据说你在宣言上歪曲事实说，我国在国际上被孤立了。你的看法呢？

文益焕：一九四八年，我国得到了联合国的承认。那时，北方还没有得到联合国的承认。然而，现在的情况，很有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所以朴正熙准备抛弃在联合国讨论韩国问题。据说，美国劝了他，他才没有这样做。这不说明我们在联合国陷于孤立，而且在失掉友邦的支持吗？

律师：据说你歪曲事实，说在实行独裁。你对这一点是怎样想的？

文益焕：不是宪法本身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国会议员的三分之一是由总统任命的。很明显，这些人是只会为总统说话，决不会替国民说话的。

律师：你写道，政府既然在经济政策上犯了错误，就应该下台。你有什么根据这样说？

文益焕：明知做错了，可又不能纠正，就该辞职。那是因为只有新的政权才能实行新的政策。但我们并没有硬

要他下台，只是说，那是解决问题的一个途径，至于是否接受这一忠告，那就由政府决定了。

七月三十一日，只有上午进行审判，而且开庭的时间又很短。检察方面的证人——三个牧师做了很象是辩护方面证人的发言，他们说："教会举行集会的时候，中央情报部派人来参加，这实在令人头疼。"检察官否认了这一事实。于是证人又进行攻击说：这个审判不也是混进三·一节纪念礼拜的那些中央情报部成员告发而招致的吗？

这样一来，宣布了休庭三十分钟。十二点三十分一开庭，审判长就气冲冲地宣布就此结束对证人的质问。看这一景况，旁听者们不难估计到审判长就在这三十分钟的休庭时间里挨了一顿斥责，禁不住对他产生一片同情心，但还是对他提出了抗议。

韩国驻美大使馆的五名官员拒绝回国的消息传到了国内。据说青瓦台针对这种情况，正在讨论今后的对策，决定尽量选派国内有很多财产或留下可做人质的家眷的人到美国或欧洲去。韩国驻美大使被召回本国后，挨了一顿训斥。当时有人问他对美国应采取何种对策，他就提议说，看来应该首先撤销紧急措施。据说就为这件事他大大激怒了朴正熙。与在民间流传的风闻相反，看来朴正熙反而更加逞强起来了。所以，有一个诗人写道：

白云台！
你能俯瞰全世界，

但你那崴峨的山巅上，
却没有一只鸟儿在啼鸣。

爬到山顶的，必定要爬下来。这首诗就是吟咏“下山之道”的。韩国的许多人是会理解这首诗的含意的。到了山顶，可以说那是他自己的天下，但它不是人世间。手无寸铁的无力的诗人望着山顶呼唤：要他回到人世间来。不，这一呼唤，也许是自言自语的叹息。

（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讯）

求刑的结果

可能是由于水灾带来的惨状，今年糊里糊涂地度过了八·一五。在这次的水灾中，死亡和下落不明的有六十六人；受灾的人有三千八百人，财产损失额达三十六亿圆。这简直是雪上加霜，给贫穷的生活又加了一层灾害。

据说朴正熙在内阁会议上指示，特别是在对外关系方面，不要顾前顾后，而要根据他的“信念”大胆应付。意思就是说，不必考虑美国的政治形势和联大的态度，踌躇不前。政府代言人把它作为总统的指示加以公布了。结果闹出了一场风波。根据“信念”去行动，可能意味着只按照在上的一位大人的意图处理一切事。

然而，实在令人感到为难的是在上的一位大人经常动

摇不定。 再说， 如果根据“信念”去行动的结果发生了问题，那就不是在上的一位大人的指示了，而变成要由各自负责的东西。独裁者本来就是这样变幻无常的，所以使人很难捉摸究竟应该怎样执行那强硬的指示。不管怎样，朴政权一时会摆出强硬的姿态。但由于它心里感到不安会注视世界的动向的。这并不是为使历史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而是为摸索政权的延命之策即为摸索维持政权应采用的手段而做的。有的说，强硬政策是针对美国的。如果美国的政治形势发生变化，朴政权就是只为延命也应挂起恢复民主的招牌。秋季联大开会前夕，在八·一五前后，可能会撤销总统紧急措施，也可能采取措施，尽早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做出判决，装出宽大处理的样子，以防止国际舆论的恶化。诸如此类的风闻最近在不断传开。

八月四日，朴正熙在庆尚南道镇海的一所休养地，全面否认了这一点。他说，在今年的八·一五，不想发表什么，不会有什么内阁改组之类的措施， 也“不会有修改选举法之类的事情”。意思就是说， 他要继续推行这种强硬政策。

韩国确实是个怪异的国家。大概是因为完全变成了一人独裁的缘故吧。执政党国会议员当中，经常发生各种舞弊事件。 但是对此司法部不能插手。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最近出现了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总统“亲笔警告书”。就为这件事， 根据维新宪法的规定， 在国会长期休会期间悠闲度日的国会议员中间，引起了一场大风波。这个亲笔书，顾名思义，是朴正熙亲自写的，所以不加公开的。

因此，只传开风闻说，执政党国会议员都受到嫌疑。韩国倒退了，以至倒退到用总统亲笔书行使司法权的那种道地的王朝政治时代了。

这或许是因为监狱里挤满囚犯，迫不得已采取的措施。在近半年期间，被判徒刑的有六千人之多，所以现在监狱里挤满了囚犯。报纸报道说，在这闷热的炎夏，竟把十多人监禁在面积不过一点七五坪的牢房里。虽然大力兴建新的监狱，但总是跟不上需要。有条风闻说，就为这种情况，准备把政治犯解到无人岛去。为"优待"政治犯，要给他们单间牢房住，所以牢房更是感到不够用。鉴于这种情况，拿总统亲笔警告书来处理执政党国会议员的舞弊事件，敷衍塞责，还是必要的。专卖厅在专卖人参一项中也发生了很大的舞弊事件。这个事件同执政党国会议员也有关系。看样子，只用一道亲笔警告书对他们做一番警告，就可以算处理了这件事。

据政府发表，目前在全国二十九个监狱里监禁着六万零六百多人。不知这里是否包括那些被当局以保护监察的名目监视的有政治犯前案者也在内。这也难怪，只根据紧急措施不带拘票加以逮捕和监禁，所以自然会弄成那种结果。报社的社论也推测说，在被拘禁的嫌疑犯中，可能有百分之三十的人将被不拘禁起诉，而有百分之四十的人将被判为无罪获释。

地方有一位教师把穷人家的孩子召集到一个教堂里教书。他突然被扣上违犯了有关私立讲习所的法令的罪名被捕了。本来这是当局认可的，以教堂内的圣经俱乐部的名

义办的学校。可是，因为这里来了些政治上受嫌疑的学生来教课，所以采取了那种措施。教育委员会和检察官也叹息不止地说这是上级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就这样把那样善良的教师送进了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全国的监狱里挤满囚犯是不足为奇的。

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也并不例外。八月三日审判时，在一概不承认辩护方面提出的证人之后，竟宣布了结束对案件的审理。对此有二十七名律师以全员退出法庭表示了抗议。结果在没有律师参加的情况下，对十五名被告提出了求刑。但对年过七十的尹潽善、咸锡宪、郑一亨等三位老人则根据对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在没有律师出庭的情况下不得求刑的有关法令，除外了。这天审判长向律师进行了长时间的说明，说总统任命的法官也可以成为公正的审判官。他还说，尽管被告们污辱了法庭，但他本人却耐心地忍受了。他这样说着又表露了气愤的心情，说：

“到现在为止，我读了审判记录，也听了录音。我的妻子听了录音后问我说，你和他们究竟谁是被告谁是审判官？这个法庭并不是对耶稣判处死刑的彼拉多的法庭，也不是审判爱国者安重根的日本人的法庭。”

审判长似乎确信自己在审判罪犯。当时辩护方面反驳道：“你为什么要急着结束审判？难道不是应以公正的态度弄清真相吗？为了判无罪释放他们加快审判，有情可原，但如果别有用意的话，那就太可怕了。”只承认检察方面的证人，而不承认辩护方面的证人，这种不公道的事是不该有的。律师就审判长所说的所谓污辱了法庭一事回答说：

“我认为检察官不懂得在法庭上应遵守的礼节。 他对前总统和前总统候选人也高声申斥。难道这是某一外国的法庭吗？如果他是东方人，总该知道对前辈和前总统的礼节！检察官说被告歪曲了事实，而被告则否认了这一点。不是应该弄清真相吗？”

检察官利用两个多小时的时间申述了自己的求刑根据。把它概括起来就是这样的：

“被告们污辱了法庭，也没有服从审判长的命令。而且他们不想服从政府的命令，还污辱了总统。虽然他们要求恢复民主，但他们所要求的是西方民主。这种民主在非洲不是也归于失败了吗？为了同北方较量，发展经济，只有维新宪法才是符合我国情况的民主。现在处于紧急状态，所以采取紧急措施是必要的。他们认为只有批评政府，诽谤总统的人才配作一个知识分子。被告们批判了维新宪法和紧急措施第九号，而且还利用纪念三·一节的机会，准备扇动民众起来斗争。在我国，有言论自由。报社在发行报纸，广播电台也在增加。宗教信仰也完全自由。基督教徒也在增加。被告们还说，金芝河本来不是共产主义者，而是由检察官捏造成为共产主义者的。但检察官是不能捏造事实的。那是金芝河本人坦白的。而且目前在狱中的共产主义者——他的朋友也都作证说，他是共产主义者。牧师和神父在过分地干预政治。人们在为反对而反对。向外国报纸谈国内的事情，是一种丢脸的事。你们暴露国论的分裂，给国家丢了脸。净作些违背国家利益的

事。”

就这样求刑三至十年的徒刑和与此同一期限剥夺资格即剥夺公民权。由于被告提出了回避法官的申请，所有二十七名律师都提出了辞呈。最后由国家指定的九名律师担任了三名年老被告的辩护。

八月五日的审判是在法庭内外由中央情报部要员等人布下警戒网的情况下进行的。国家指定的九名律师中，出庭的只有三个。其中的二名律师既没过目审判记录，也没同被告个人接触过，所以他们提出抗议，说他们不能替被告作辩护。尽管如此，检察官还是对前总统尹潽善和咸锡宪先生各求刑十年徒刑和取消资格十年，而对郑一亨国会议员求刑七年徒刑和取消资格七年。被当局叫做被告的这些领导者听到这种求刑，只是现出了苦笑。他们隐忍着由于受到民族叛徒的审判而引起的愤怒，现出了苦笑。

审判长宣称对这一事件的第一审将在九月九日以前结束。金大中虽然准备了最后的申述，但他拒绝作最后的申述，以此对不公平的审判、没有律师出庭的审判表示了抗议。他只是向法庭提出抗议说，要到九月九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为什么那样急着结束审判？其他的人也拒绝作最后的申述。但李兑荣女士作了令人感动的申述。她说：

“我要谈的话还很多。检察官说的，都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歪曲事实的。掌权者这样与国民的见解背道而驰，实为令人寒心的事。就为一张声明书，竟给人判了这样的重刑。我作为郑一亨的妻子，也不过给人送去了那份文件，可是当局竟为这个给我求刑七年徒刑。被告们受到拷刑，

当然要怀恨在心了。但恰恰相反，在这个法庭，你们这些法官倒抱有可怕的憎恨。虽然是丢脸的事，但我不能不提起日本人的法庭。我的丈夫曾蹲过好几次监狱。但日本帝国主义的法官对被告的妻子倒是宽大的。可是为什么这个法庭，甚至对被告的妻子也是那样残忍呢？我作为这个国家的第一个女律师，为争取妇女的人权而鞭策自己，拖着老身东奔西走，可是，你们要把我监禁起来，究竟要干什么？检察官在求刑时，说我们是空喊口号的爱国者。那末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搞独立运动，曾蹲过好几次监狱，难道还能说我们是空喊口号的爱国者吗？我们这些爱国者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蹲监狱的时候，你们在何处呢？现在的掌权者那时在什么地方搞了些什么呢？在满洲，手拿武器拷打这样的爱国者的人不是在你们中间吗？当爱国者组成独立运动战线进行斗争的时候，这些人搞了些什么呢？你们说不应该实行西欧式的民主，难道曾有过实行那种民主的机会吗？一九六〇年四·一九民主革命胜利后，才过了一年，不是有人就出头用刀枪扼杀了这一民主吗？检察官抱有憎恨和偏见。 曾在日本帝国主义法庭， 那些日本帝国主义的审判官和检察官也称我们‘先生’和‘您’。可是你们，甚至对前总统也始终叫他‘被告’！这个法庭的确是残忍的，而且是充满仇恨的。”

当你在任何人都不承认的法庭，根据任何人都不承认的法律受审判的时候，你会感到渗入骨髓的怨恨。曾受过别的民族的统治的国民，是要求统治者具有道德上的纯洁

性的。他们要求至少要排除那些同异民族的统治者勾结起来践踏过本民族的人。人们想他若是一位曾同国民同甘共苦的人就好了。 这可能是大国的统治者所不能接受的逻辑。正因为这样，那些民族叛徒才得以在他们的支援下掌握政权，以君主自居，向国民发号施令。

基督教徒们对这种现象更表示愤慨。他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曾撵我们， 在这南方又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和民主，我们究竟到哪里才能安心过日子呢？那些民族叛徒简直不可一世，践踏和牺牲民族的美好理想，自己享受富贵荣华。所以，基督教的抵抗，尽管是少数，将不断地持续下去。下面再援引一下两三人在法庭作的申述。

李文永教授：我不承认这个法庭。听说，不允许组织新的法庭，那我只好把在这里的发言当做在新的法庭所作的发言。 审问和搜查都脱离了实际。 求刑的根据，也是自相矛盾的。例如，你们说没有蹂躏人权，可又说为了保安需要压制自由。在这里受审的人当中有前总统、得到百分之四十六的国民支持的前总统候选人和连续八次当选为国会议员的人，也有被人们称之为国民良心的代表者的人士。你们也许是忠于总统的，但可以肯定你们并不忠于国民。怎么能对这些人随便发出喝令呢？我看这种作法就是对你们所竭尽忠诚的现任总统也是没有好处的。我并不想说我没有罪，但我主张我是对的。因为我忠于耶稣，所以我就选择了耶稣曾为正义而走过的苦难的道路。我从高丽大学被撵出来了。但愿高丽大学不为撵我的事去丢脸。如果你们也想忠于总统，那末你们不也应该不给他丢脸吗？

金胜勋神父：我想对金芝河的问题只说一句。对他的每次审判我几乎都去旁听过。检察官在求刑时说金芝河是共产主义者。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当检察官把孙某作为自己的证人从监狱里提到法庭上来问他金芝河是否曾对他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时候，孙某当场回答道：不，他没有说，我只是说，依我看来，他象是那种人。我恳切希望检察官不要歪曲事实。

当安炳茂教授被求刑七年徒刑时， 有人对他说“你得了银质奖章”，后来改为求刑五年时，他就开玩笑说， 改成铜质奖章哩。被求刑十年才算是得了金质奖章。虽然时过千秋了，李海东牧师说的话仍留在我的脑际。 他曾说：

“你们可以使我们的存在化为乌有， 但我们是不会投降的。你们可以行使权力剥夺我们的一切，但你们是不能任意摆布我们的。你们可以打死我们，但我们是不会向你们屈服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理想，这个国家就不会有前途。”

他们为什么求刑那种重刑呢？其结果将会怎样呢？对此传开许多风闻和推测。也许朴正熙本人还没拿定主意。朴正熙是个懦夫。他一上火就指示要判重刑，而后就担心这样做会惹出很大的问题，于是他就感到恐惧，打退堂鼓。他在舆论面前，表示屈服后，由于自卑感而苦恼，但下一步又显出强硬的姿态。离八月二十八日的宣判，还有相当长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可能会进行慎重的讨论，努力观察国际舆论。

还有一种流言蜚语说，他们这样拖延判决，是因为有这样的“流言蜚语”： 由于美国的选举和联大， 他们将在八·一五以前结束对这一案件的第一审，很有可能判他们缓期执行。 据说，由于这个风闻， 政府就实行了强硬政策。朴正熙有一种奇怪的见解，认为统治国民就意味着不按国民的意愿行事。他以为统治就意味着独断专行，国民不应过问。这确实是一种幼稚可笑的想法。视国民为敌，在国民所意想不到的地方善于奇袭国民，这是一种出自军人意识的癖好。

对象前总统尹潽善那样的老人求刑十年徒刑，这还象话吗？很多人都苦于推测朴正熙安的是什么心。求刑那样可怕的重刑后，他也可能觉得很棘手。他往往一上火就下命令，而后又犹豫起来。说不定他想虚张一下声势，借此表白自己并没有屈服于舆论特别是国际舆论。一般的人们认为判决时，他们可能宣判比求刑减一半的刑期，而且还宣告缓期执行。使人担心的是，对当局所憎恨的金大中等几个人他们很可能暂时判处徒刑。有一种推测说，如果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举行选举，朴正熙至少会给金大中判处取消资格，捆住他的手脚，使他束手无策，又说，他若知道有这种推测，是会改变自己的行动的。

被监禁者家属于八月三日，发表了《家属关于对三·一事件的最终审讯的声明》。他们在这份声明中表明， 对政治审判的最终审讯不感兴趣，最后又说：

“被告们发出出自爱国良心的呼吁， 并象耶稣那样情愿经受十字架的苦难。我们只是一心为这些被告们所渴求

的恢复民主之日早日到来做祷告。”

八月五日，韩国基督教会协议会也发表“关于三·一事件的谈话”，对不准辩护方面的证人出庭、没有律师出庭、强制进行审判等行径提出了抗议，并表示无法理解为什么求刑重刑。同时对当局把与首都区特殊传教委员会有联系的朴炯圭牧师等人监禁起来施行令人不寒而栗的拷刑企图捏造事件的事宜提出了抗议。谈话又指出政府对基督教采用“既危险又苛酷而又令人怀疑”的手法。看来，现在教会又重新团结起来了。可以说如今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政府采用的手法的本质了。看来朴政权和韩国基督教之间的这场斗争，不会简单地结束。

第二民主救国宣言

我衷心感谢海外人士支援我们的规模不大的斗争。今天也看到了美国长老派妇女五千人于七月中旬举行集会通过的有关对韩国问题给予支援的决议文件。也听到了有一个朋友传给我的一条消息：“基督教联合教会”也在夏威夷举行全会，通过了“关于对韩国兄弟姐妹表示忧虑的决议”，并决定付诸实践。

我要对日本和美国的言论报道也表示深深的谢意。我又听到了，在德国，曾访问韩国大大鼓舞了我们的作家鲁伊捷·林捷女士，在《修皮克》杂志发表文章表示支援，

从而在欧洲唤起了对韩国人权问题的关心。尽管有时不够确切，但我们还是经常通过各种风闻听到些消息。听说林捷女士，为营救金芝河而付出特别大的努力，我对此表示深深的谢意。

另一方面，朴政权为扼杀这种良心的支援而倾注很大的力量。他们挥霍大量的钱财，展开攻势，在海外进行拉拢，大力邀请各种团体和个人。据说尤其为邀请拥有大众宣传手段的实力派而倾注更大的力量。看样子，许多人拒绝了他们的邀请。假如有人接受他们的邀请前来访问，当局一定要在报纸上，报道他们来访的消息。

近来，劳资问题变得更严重了。由于工业化而兴建的工厂越多，这一问题将更加扩大。下面介绍在紫菜加工厂发生的一个事件。有近一千人的女工在这个厂里作工，她们向公司要求解雇恶霸监工。但公司并没有接受她们的要求，于是她们就向公司展开了电话战。一千人连续挂起无数的电话，向公司提出了要求条件。这样一来，公司不得不在第四天撤换监工了。

工人们的态度是：政府不遵守法律，我们又何必遵守法律。忠清北道清州有一个叫新兴制粉公司的大公司。这个公司的工人们拒绝了加班加点。据说，公司想收买工人代表， 给了他二十万圆钱， 但他的妻子把那笔钱退了回去。工人们为反对加班加点进行了历时四十五天的斗争。厂方发出悲鸣说，每天损失了六百万圆。厂方一解雇工人代表，全体工人都提出辞呈表示反对。最后公司方面不得不妥协了。

看来，这种气氛向全国蔓延起来。尤其是女工们在勇敢地进行斗争。政府表示态度，希望公司和工人双方能够妥协，以便防止现在发生的事件再扩大。这是因为他们深怕工人们的不满情绪爆发起来。报纸一概不报道工人的斗争情况。可是事情已发展到了用这种临时对策无法收拾局面的地步。到头来也许会施加残酷的镇压。但那只能使局面更加恶化，不会有好结果。依我看，抵抗的烈火，在这方面也将更加熊熊燃烧起来。

天主教原州教区， 在天主教 月刊杂志 《原州会报》上刊载了以 《神父们在法庭上的发言》 为标题的一条消息。也按了《明洞事件（政府称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为明洞事件）旁听记》（第六——第十回）的小标题。尽管显得很消极，但看来他们分明是为向教徒们公开真相以期取得一致的步调而这样做的。 事实上， 在目前的形势下，这种抵抗也是当局所不允许的。

在全罗南道光州， 终于发生了第二民主 救国宣言 事件。人们认为韩国基督教长老派是一个自由的教会。这一教派的神学校就是韩国神学院。这一教派的牧师们至今经受了许多痛苦。这一教派的神学者目前也为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受审判。这一教派现在也说，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是出自“宗教信仰之良心的呼吁， 是立足于民族的爱国精神”的。全罗南道基督教长老派教区， 于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举行全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一、立即释放被监禁的圣职者。

二、明洞事件是爱国精神的体现，是宗教信仰之良心的告白。

三、废除维新宪法，恢复民主宪法。

四、我们的教区表示坚定的决心，将向活着的上帝做祷告，作为同命运的团体采取同一步调，直到贯彻上述要求为止。

虽然发表了如上的声明，政府却只镇压其部分人员，并没有把它看做是个大问题。但是，只因在八月十日举行的教区临时会议上，再次宣读四月二十二日通过的这一决议，却把事情闹大了。 据说， 由于现在有一个不明所属的五〇五部队进驻此地坐镇指挥，警察也没法宽大处理这个事件了。起头拘禁了九个人，据说现在要在监禁的情况下起诉四名牧师。但是，为此引起了全教会的抵抗。因为这四名牧师是教会的领导人，又受到全教会的支援，所以这一斗争将变得更加激烈。关于“八·十宣言事件”的报告里，有这样一句：

“八·十宣言事件发生后， 全罗南道教区紧急通知全罗南道的各地方教会，将于八月十四日在一光教堂召开教区临时紧急会议。于是，当局也通知各机关，指示他们施展威胁、怀柔、公开制止等手法，阻止牧师、长老和教徒去参加这个会议，结果发生了各种悲惨的事态。在务安邑，于八月十五日夜，通宵举行了祷告会。当局掀起一场骚动，强制解散了这一祷告会。全罗南道康津长川教会的一个牧师，接到教区召开紧急会议的通知后，准备去参加这个会

议，但十四日清晨祷告会刚结束，由于各情报机关的官员来监视，没法走出教堂。于是他穿着长统靴，悄悄溜出后门，穿过水田，换穿他的夫人事先备好的鞋子，步行二十里路，乘公共汽车，到了光州。南昌教会的一个牧师，把清晨来监视他的警察领到饭店吃饭，他就给饭店老板先付清帐，从后门溜出来，到了光州。康津邑教会的六十名教徒，本打算集体行动，全员到光州，但由于各情报机关官员来带走或引诱， 只有四十人到了光州。 后来，到十六日，剩下的二十人也都到了光州。据说有一个当公务员的教徒甚至兜儿里揣着辞呈，开始了行动。他是决心在必要时辞掉自己的职务的。坐公共汽车来的长老和教徒们，在途中被拉下车来，于是他们就徒步走三十里山路和田埂小路，参加教区紧急祷告会。这就是农村的纯洁而充满热情的信仰的表现。”

因为是悲壮的事件，照原文抄录下来了，虽然显得长了一些。那些无名的乡村牧师和教徒是这样展开斗争的。他们不怕蹲七年或十年的监狱， 正进行斗争。 八月十四日，由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而被监禁的人们的十名家属，为了到准备召开教区紧急会议的一光教堂，鼓舞、支持和慰问他们，向光州出发了。当这些女人到光州高速公共汽车终点站下车时，有一百名警察把她们包围起来，架上警察车，送到汉城的自家去了。这样的家属，使被监禁的亲人坚强起来，而那些被监禁的人又使这些家属越发坚强起来了。

不能不说朴政权苟延残喘的路也够艰难的。在朴政权

的镇压之下，民众的抵抗战线，虽然是含蓄的，但正在扩大起来。究竟将在哪里爆发，那是不得而知的。那些不被犬孺主义（对社会现象的观望、嘲癖的态度——译者注）污染的地方人和工人特别是女工中间，新的热情正在高涨起来。朴政权可能又会采取卑鄙而残暴的对策，但民众出自良心的抵抗将仍旧持续下去。

（一九七六年八月十七日讯）

一丝的自豪感

第一审结束后

喜鹊啊，喜鹊，
你飞往哪里，
你一啼叫，
爱人就会回来。
你叫得声嘶力竭，
飞过那座山去，
我的爱人该何时回来。
但愿你留在我身边，
但愿你留在我身边。

这是两三年前一时流行的歌曲。现在它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连唱这支歌的歌手的名字也记不清了。这支歌曾流行在因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捕入狱的人们的家属当中。在晚夏或初秋，我曾恍惚地静听飘荡在夜空的歌声。

这支歌虽然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但这些妇女对它赋予了新的意义。她们对这支道出苦等不能回来的爱人

的衷情的歌词赋予了社会意义。她们唱它，一面苦等坐牢的丈夫， 一面渴望祖国的新晨。 韩国人在苦难中也爱唱歌。现在，这些妇女同遭受同样的痛苦的人们一起唱。她们通过共同的歌曲和情谊互相团结，相互勉励。

如果没有这种情谊，她们可能会耐不住痛苦，一个一个地散去或堕落，斗争热情也不能这样高昂。如果没有这样的情谊，那智慧、 良心和勇气就不会增长。 正因为如此，她们虽然精疲力尽，但每天都聚在一堂。在加列利亚教堂常常传出这样的赞美歌：

快快回来吧，
民主恢复快快回来。
上帝保佑你，
你为民众背起十字架，
心怀爱国的赤胆忠心，
成了民主生力军。
愿你胜利而归，
民主勇士快快归来。

这不是原先的赞美歌，而是把呼救罪人的宗教赞美歌现代化了的。 她们还唱着“宁静的朝日之国召唤生力军，要做上帝的儿子，继承历史的新生命”这样的歌儿。 这是金在俊牧师作词的赞美歌。他过去作为韩国教会的元老进行了活动，如今在加拿大继续进行活动。看来，有良心的基督教徒同这个时代一道发现了新的祈愿、新的歌曲。他

们的思想和行动是坚贞不屈的。虽是少数，但还是抱着希望。

下判决的八月二十八日法庭上挤满了旁听者。审判长宣读了判决书一个小时。不知为什么，他宣读判决书时中间跳过了七、八张。判决书的内容杂乱无章。在迄今的政治审判的判决书中是最糟糕的一个。第二天报纸上简单地报道了它的内容。通过报纸的报道可以清楚地知道判决书是个什么样的东西。报纸报道说：

被告的学历和学识，很是令人感叹，但他们缺乏国民应具备的起码的知识，他们一味自以为是，刚愎自用，结果害了他们自己，也殃及国家。

然而，审判长宣读的判决书里根本找不到这类词句，这是耐人寻味的事。判决书的“本文”后面的“理由和罪证”一节中，冗长地叙述了案件的经过，然后只指出：“作了歪曲事实的宣传，歪曲和诽谤了大韩民国宪法，主张和扇动了宪法的废除，公然诽谤了紧急措施第九号。”最后讲了一大套令人费解的诡辩， 说抵抗权超出“实定法秩序”和“我们宪法”的范围，是不可能存在的。

那末，那个报纸的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呢？可以说，政治审判的判决书和向国民公开的判决书的内 容 各 不 相同。可以看出，中央情报部在那样造作并进行宣传。总之他们对十八名分别判处了八年、五年、 三年、 二年的徒刑。审判长对那些不拘禁起诉的七名，没有下令监禁。这个审判长是曾经对于在贫民窟里工作的汉城大学学生判无

罪的审判官。据说，当时他违背中央情报部要用反共法对他们判有罪的意图，得罪了他们。我们曾希望由于这个审判长的勇气，产生新的局面。然而，我们看到的不过是中央情报部和青瓦台对这次事件采取的强硬态度。有一位不遗余力地支援这些被告的朋友，对我说：

“我们总是有一点安逸的想法。我们还以为当局会考虑国际影响，不会那样把强硬的态度坚持到底。当局这次也违背了常理和一般人的期待。这首先是因为有金大中。金大中的病情现在很严重。我们一直乐观地想他们不会夺去金大中的生命。但人们认为岂能的事，他们都能干得出来呀。金大中的健康情况恶化，也许起因于中央情报部可怕的计划哩。拿一般的常识看朴正熙是不行的。他是死心塌地要干掉金大中的。”

据他的说明，镇压的矛头指向了金大中。最近金大中夫人探监时替金大中剪了指甲。因为他犯神经痛，身体不自如。他的夫人体贴入微的举动，甚至传到青瓦台，惹起了大骚动。那位朋友接着说：

“他们监禁金芝河的原因也在于他们害怕他和金大中合作。曾有风闻说，金芝河要把绑架金大中事件作为题材写一部作品。对东亚日报采取最后措施的原因也是记者们开始把金大中的照片登在报纸的第一版上写文章。”

那位朋友叹息着说，无论如何，保持他的生命是我们唯一的希望，又是首要任务。他说从这一角度来说，不应该让他参预这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他又说：

“但对他本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可避免的。周围的人

应该把他除外才对呀。当然，即使他没有参预这件事，也很难保证他在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能够平安无事。加上，现在中央情报部宣传说，他抱着政治野心，甚至拉拢长老和圣职者。这实在是叫人为难的事。

对这次的审判流传着各种风闻。他们也许有必要向国民显示一下朴政权那对外国的任何压力也不屈服的力量。如果美国施加压力，就释放因这个宣言被捕入狱的人来给美国保持面子就行。如果施加更大的压力，要求他一定举行直接的总统选举，那么他就坚决主张服刑中的金大中决不能当候选人就行。他们估计美国政府不会进行比这更多的干涉。他们订出了逐步让步的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可以让步到举行选举。这是一位当记者的朋友谈的推想。他最后说：

“无论怎样做让步，也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朴正熙决不让出政权。目前在农村开展新村运动，他们掏出钱任一名第二负责人，在农闲期让农民干活儿，发给他们日薪达两千圆的高工资。 他们说只有这样做， 农村才能富裕起来。这就是成捆地散发金钱的政策。这为的是他们要在举行选举时获得占全体国民百分之四十的农民的赞成票。相反， 把沉重的税金强加于城市居民的身上， 抬高物税等税金。这样，他们一步一步策划在美国改变政策的情况下也能够保存下来的阴谋。近来甚至要象台湾那样停止政府发表统计数字的作法。这是因为他们尽一切伎俩编制的统计也漏洞百出，受批评的缘故。这样他们一心为维持政权忙碌，一切都那么杂乱无章。”

无论发生什么事态， 朴正熙掌权的野心是不会改变的。即使是他选的道路使国家灭亡，他也满不在乎。比起判重刑，朴正熙的这种基本姿态更使我们感到抑郁。

被告的夫人们在下判决的公审前后，受了二十四小时的监视。有六至十名的公吏跟踪一个夫人。有一位夫人苦笑着说：“近来，我外出、回家时要坐警察的车子了。”

与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全体人员，向高级法院上诉了。 据说， 如果在第一审时对审判长的回避申请被驳回，那末辞退的二十七名律师将重新出庭。朴政权对这个上诉，不是企图尽快处理，终结案件，就是企图长期放弃不管，使人们忘掉。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他们可能会斟酌国际舆论， 选择后者。 国际舆论对这个判决有何种反应，我们全然不知。

无止境的黑暗

前几天，我有机会看到了载有有关前总统尹潽善今年八·一五同记者会见后发表谈话的印刷品。据说，它已经传到外国，但在国内没有进行报道。谈话的内容是为韩国的和平，建议举行“美、日、韩三国会谈”。其中，第二项吸引了我的注意，题目是《迎接八·一五解放三十一周年的感想》。

确实是错综复杂的。解放应该是民族独立和民主的出

发点。然而我国的现状是国土被分割为两个部分，这块土地上连民主的影子也找不到，人们不知所措。我痛切地感到，对祖国的这一现实我也有一份责任。我希望能够在生前看到真正的民主得到实现。 这就是我的忏悔， 我的遗言，我的希望。能够看到统一了的、幸福的祖国，那更是幸运，但首先我很想亲眼看到我们实现统一与和平即基于民主的国民和平的那一天。我已在法庭上说过，我不是只有绝望的想法。我认为许多青年学生、知识分子和宗教徒出自信念的呼声和意志是不可阻挡不可挫败的。他们的艰苦斗争越带有长期性和艰苦性，这个国度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就会突破难关，更加顽强起来；我们的未来也就会更辉煌灿烂，更确定不移。

过去为独立而斗争的先烈们，曾说能够看到国家独立的那一天，死也没有遗恨。如今在解放后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仍然有同样的呼声发出来。我觉得仿佛这就是在这无止境的黑暗中，为保持斗争的自豪而挣扎的面貌。为了那些看不到未来陷于绝望，只顾当前幸福的市民，领导者必须保持那种信念，号召他们展开斗争。 尹潽善说， 要完成“根除人害人的罪恶”这一人类永恒的使命，就要加强国际联系。他说他将不为对自己的审判结果费心思。他最后说：

我常常有这样的错觉：我们不是在受审判，而是在审判现政权。我确信，历史将审判对这个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没有一个人认为这个审判是公正的……。一

切都由朴正熙的意图决定。所以我也会被送到监狱里去。如果是这样，这将是我和各位的最后一次的见面了。可是我并不害怕。我是于心无愧的。我在痛苦之中也保持着这种自豪感，但不知是因为心软还是为什么，我却总感到悲哀。这也许是由于八月间接连发生的许多事件，使我忧郁不乐的缘故。

我已在上次通讯里写过八月十日，牧师们在全罗南道光州掀起第二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消息。这个事件的余波还在继续蔓延。由于这个事件，八月十八日在木浦举行了祷告会。这个时候，正赶上基督教长老派全国青年联合会在木浦地区召开教育大会。参加大会的六百名青年举行了六公里的示威游行。 他们唱着自由歌， 高呼释放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捕的民主人士。警察把这支队伍包围起来一起行进，但并没有动手。这的确是罕见的事。市民背着警察鼓掌欢迎。这次教育大会到八月十九日发表了题为《民众信仰告白》的十分强烈的声明。声明指出，“民众把爱国家作为至高无上的任务提出来”，并把“保卫民族的大权”交给了政府， 但这个政府却以“民族的名义”剥削民众。这份声明正是他们对政府的这种行径表示的一种愤慨。声明最后说：

我们认为，今年三月一日在明洞发表的牧师和前辈的宣言、八月十日在光州发表的牧师的宣言，是真正的民众的呼声，是要跟随为民众而牺牲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信仰告白。因此，坚决要求释放因这个宣言被捕入狱的牧师和前辈。并宣布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的我们这些人，热

爱自由的我们这些年轻人，将为解放受压迫的民众而斗争到底。 因为这就是跟随耶稣走的为民众传教的道路。 为此，我们基督教长老会六百多名青年教徒，以耶稣的名义宣布，为争取光荣的自由，继续朝着充满希望的未来勇往直前。

年轻人的这种决心和行动是十分动人的。虽然报纸对此只字不提，但是通过人们的嘴不断地传播着。警察和中央情报部对这件事还没有插手。看来，他们企图在暗地里彻底进行调查后来一个各个击破。也可能是要避免在秋季开学当前同年轻人发生正面冲突，特别是警戒刺激基督教长老派教会全体人员采取强硬的态度。这可能是因为这个教派的全国性大会决定在九月末召开。然而，早晚会对此进行残忍的报复。在全罗南道，当局以各种借口继续带走牧师和学生。但看来，朴政权还是采取慎重的态度，他们害怕在这个地区燃起火焰，因为在日本统治时期，这个地区常常成了反日运动的起火点。

在进行下判决的公审的八月二十八日前一天，举行了由韩国基督教会协议会主办的“为受苦受难的兄弟的祷告会”。

在这个集会上也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为劳动问题进行斗争的约三十名年轻女工参加集会，惹起了大问题。带她们到会场的牧师，当场被拉到中央情报部去了。祷告会结束时发生了比这更令人震惊的事件。一个曾被逮捕并给扣上共产主义者帽子的青年，用玻璃瓶破片拉破肚皮流

着鲜血恸哭起来。他呻吟着大声喊："三·一事件无效！""作践穷人的狗杂种们！"

记得是八月三十一日，金芝河的父母大清早赶到监狱，看到金芝河正在被架上囚车，便冒着很大的危险冲过去，推开为这种奇袭愣住的押送员，和金芝河见了面。金芝河的母亲好不容易和儿子见面后，感到很幸福。据说，金芝河的小儿子也给父亲看了。她只听了一句"请放心吧"，就回来了。这可能是再也不会有的会面。有一位前辈把这一事实讲给我听后，叹息着说，许多无名的青年，就这样受折磨，在狱中连和探监的人会面的机会也被剥夺了，这可怎么办才好呢！他们在那样严峻的现实中是否也能够依然抱着一丝的自豪感呢！

（一九七六年九月三日讯）

国民毫无表情的国家

民众保持着可怕的沉默。由于这一沉默，掌权者又感到不安。尽管有具有批判精神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是无能为力的。为了镇压这些人，掌权者调动了一切力量。

看来，要扼杀国内外批判的呼声的阴险活动越来越加剧了。即使韩国中央情报部的所作所为在外国引起非议，他们也不停止这种活动，而且变得更加阴险，更加狡猾。在东京绑架金大中的那类事件，将随时都会发生。而

且其手法将变得更残忍，可能不是绑架人，而是制造假事故来杀害人。 对金大中事件而言， 由于没能在海外把他杀害，把他绑架回来， 所以招致了后遗症， 一直到现在很伤脑筋，对此在中央情报部内部有过严厉的批评。正象已在国内运用，假借事故的杀人事件，大有可能在海外也发生。当局竟平心静气地认为，那种可怕的事件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忘掉，即使被人觉察到，只要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就会互相包庇湮没掉的。朴政权认为不管它是何等地不道德、残忍，拿良心、舆论和民众之类是不能推翻它的，这种冷笑主义就是朴政权的根底，谁也不能推测今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不幸事态。

在国内，朴政权和基督教会之间的对立进一步表面化了。其原因之一，也许是把基督教说成共产主义是件最困难的事。但其理由首先是教会由于有信仰，对罪恶不能视而不见，所以虽是少数，但凭良心说话，并为此而受苦。

最近掌权者执拗地发动攻势，硬说这个基督教有意无意地变成了共产主义温床。警察当局利用信基督教的自己的官员进行破坏教会的活动。近来特别成问题的是，教会方面弄到了用来教育这些警察官员的题为《对基督教的理解》的小册子这个物证。

小册子写道， 在宗教界有人“参与社会活动”，“引诱许多人犯罪”。而且在内部使用“近来流行的神学思想中的所谓解放神学、拯救社会等词句”。 在那本小册子里还可以看到对重视人权问题的教会的叙述：

“看不到与共产主义者的革命战略相似的东西， 是不

行的。”

“第二解放意味着被压迫阶级的解放。应该注意它和共产革命是同义语。”

“虽然在呐喊传教的自由，……但实际上是引诱教会呐喊政治运动或革命运动的自由的。”

“他们经常使用这样的词句：传教的自由、人权、民主主义、非人化、受压迫的穷人、民众共同体、消除贫穷、信奉耶稣的无产者、今日的拯救等等。”

只拿上面援引的几句也可以看出，目前韩国教会的几乎所有的斗争面临被扣上共产主义帽子的危险。这样，当局使警察完全冒充教徒混进教会进行活动，以免受到监视教会的责难。他们还说，基督教徒在工人群众中的活动和基督教学生组织在学校的活动，都是共产主义活动的明显的表现。教会方面对此继续提出抗议。

下面再谈一个有关这种抗议的有趣的例子。因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人们的家属对于当局一连二十四小时监视她们和钉梢一事，向汉城市警察局提出过抗议。警察当局的回答倒是挺有意思的，他们说：

“平素未曾有过钉梢、监视等，来妨碍个人生活的事，今后也不会有那种事。”并且援引“要恨罪行，不要恨人”这句格言说，完全可以理解被监禁者的心情。有一个家属给我看记有上述内容的“公文”，并说：

“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竟能这样泰然自若地说出弥天大谎。他们可能认为这就是政治……。看来，他们的语言、思考方式都和我们不同。看来，他们肆无忌惮地

撒大谎。可以说是非人化吧。他们要把我们当作非人看待，那他们自己得先做非人啊。我们把这个公文给执拗地跟踪我们的警察和中央情报部成员看，问他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看了公文，只好尴尬地苦笑了。”

对学校的控制达到了顶点。今年九月三日是所谓学生护国团成立一周年的日子。这天，一个御用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题为《光辉的历史》的文章。文章写道：

“一年前，学生护国团的成立为我国大学的历史开辟了新的时代。一句话，在过去的历史上，学校是杂乱无章的。热情毫无节制地爆发，没有反省的冲动狂乱奔放，葛藤和悲剧纠缠在一起。然而，这样的过去正在远远地离开我们。我希望如今的我们大学用基于理性的井然秩序，通过对自己的主体的确认和对未来的辉煌蓝图，创造性地对付时代的挑战，认真负责地为我们民族的迫切现实服务。”

这个哲学家到底想说些什么呢？ 这够多么厚颜无耻啊。到学校去看，根本找不到对学生护国团的那种自夸、对“光辉未来”的期待的任何痕迹。学生护国团是在“边学习边保卫国家”的口号下，为建立“井然有序”的组织，把教职员和学生撮合在一起的。学生护国团的头一条任务是“实行关于国家保安的精神教育”。学生们无论在校内还是在校外，都不得加入不经文教部长官承认的团体和不属于学生护国团的任何学生团体。在校内举行的任何集会，都要在四十八小时以前呈报学校当局批准。这样一来，与御用教授所宣扬的恰恰相反，“坟墓的秩序”支配着学校。这里介绍学生们寄给我的报告中的一段：

“校内学生护国团的下面几乎没有学生的学究活动或研究小组活动。在很多情况下，用奖学金的形式不公开地对干部给予经济优待。要展开研究小组活动，就要办复杂的登记手续，还要有指导这些活动的教授。即使办完了登记手续，还要在对目的和内容等的审查和评定标准方面合格才行，手续非常麻烦，所以几乎都不搞了。除了在学校受训以外，一年级的全体学生还要到陆军训练所去受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十天的最猛烈的训练。”

这样，出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年轻人。我不能忘记一位长期旅居海外，刚回国的朋友说的讽刺话，他说：“不知为什么，韩国人比过去更没有表情了，脸象木鸡一样。”那时我发怒说：“别说得那样狂妄。”可是我也那样克制自己，说不定同样会给人留下那种印象，这么一想，心情就忧郁起来。

劳动战线

记得约两个月前报纸登过这样一条消息：公共汽车公司的工会干部参加了监督公共汽车女售票员舞弊行为的工作。对此，汽车司机提出了抗议。拿公共汽车女售票员骗取车费的事，经常争吵不休。有一个工会干部去监督时，诬蔑一个女售票员骗取了车费。于是那个女售票员要服毒自尽，叫人们送到医院去了。可是第二天大清早，她又被迫出院回农村去了。

报上登出这样的劳动问题确是罕见的事。但实际上在全国范围内各种劳动问题是层出不穷的。政府对此很费脑筋，认为这些劳动问题有增无减。在今年九月八日中秋节，政府不得不特意协助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了。这里援引一段工人们对恶劣的劳动条件的控诉：

“这里糖果厂有二千五百名工人。实行着白班十二小时晚班十二小时两班倒，一个星期换一次班。星期天常常做十七至十九小时的工。这对女子软弱的体力来说，实在是难当。工作结束后，利用二三十分钟的时间打扫车间，还要听一大套训辞。厂方不遵守下班时间，可是上班时间倒管得很严。有七八年工龄的人，才领到基本日薪六百四十圆，迟到五分钟，就扣五百圆。午饭时间只有三十分钟。因为采用计件工资制，所以在十二小时工作时间内要包装一万六千八百个口香糖，才能领八百四十圆。星期天也不能休息。一个星期天，不少的女工休工上山野游的时候，厂方人员竟赶来闹事，拍了我们的相。”

“我在块糖班工作。每天平均包装一万五千到两万个糖球。连续紧张的劳动，弄得手指发热，有时还流出了血。手指变了形，象个残废。我们再也忍不住了，于是今年二月八日，终于起来展开斗争，要求厂方不要强迫工人一天干十二小时以上的劳动，还要求他们保障星期天休工。通过艰苦的斗争，三月一日，我们实现了自己的要求。但是厂方说我们是主动分子，解雇了我们。我不得不离开献出青春干了六年活儿的这个工厂。请你们听这一纤弱的呼吁，伸出救援的手吧。”

“在摄氏四十度左右的车间， 工人汗流夹背地来回跑着纺纱，她们的脸和手都长满了痱子，浑身沾满了棉灰。我看着她们的这副样子，不禁流下了眼泪。我患过肺病。干了一两年这种活儿，就长脚气，脚气痒得受不住，就往洋灰地上蹭，眼看蹭得血水流，痛哭流涕，这种事不只是一两次。后来，我参加了工会运动，当了常务执行干部和委员。但是厂方以违背上级命令为借口给了我无期停职处分。许多委员都有同样的遭遇。我十岁时死了母亲，为供小弟弟上学，走上了社会。当时我根本想不到社会上是这样冷酷无情的。遭受这种不幸的不只是我一个。这是关系到无力的全体韩国劳动者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团结力量进行斗争。请支援我们吧。”

在这样的地方，中央情报部和经营者狼狈为奸，制造新的御用工会。韩国的劳动法不允许在一个企业里组织一个以上的工会。这样， 在这里， 御用工会成为正当的工会，而工人自己组织的工会就成为违法的工会。目前，许多有良心的工人为反对御用工会而进行决死斗争，但每次都以惨败告终。司法机关一向是站在掌权者和中央情报部一边的。这样只能隐约听到微细的绝望声。他们不断地向劳动厅厅长提出请愿书。

呼吁书和请愿书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说是他们明知“今后会遇到更多的困难”还是发出呼吁的。呼吁书里还有这样的一句：厂方威胁他们说即使劳动厅的人来调查，也不要出头说话。还有些女工呼吁说，厂方以经营荒为借口不发工资。这里再介绍一个呼吁书：

“我们公司是内衣厂，有二百名工人。 工作时间原是从早晨八点三十分到午后五点三十分。可是工人们一般被迫工作到深夜两点或四点。有时被迫工作二十四小时。工人们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要求厂方让我们休息一两个钟头，而后再催我们去干活儿。 他们怕工人逃跑， 锁上门。真是浴血的劳动。听说从劳动厅来了个监督官，但我们是没法和他见面的，而且也没有一点点的改善。虽说我们是既没有钱，也没读过书的人，怎么好这样对待我们这些年少的人呢？就是牛马也不该这样虐待啊！”

在仁川的一家纺纱厂发生的事件，是最残酷的一个例子。这厂职工有一千三百名，其中五分之四是女工。一九七二年，由于她们的努力，一个妇女成了工会支部长。可是，厂方和权力机关勾结起来，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力图用男人换支部长和工会干部。道知事下行政命令协助了厂方，厂方进行了种种破坏活动。女工们进行悲壮的抵抗，对付暴力。

在这里介绍一个登在《周刊市民》（八月二十三日）的女工们的悲惨景况的片断。 四百名女工对压迫忍无可忍，终于进行绝食斗争，抗拒了厂方。当局为镇压她们出动了警察。这时，不知是谁，心机一动，想出了妙计。那就是如果脱光了衣服，警察也会不敢动手的。然而，警察朝着那些光着身子，手挽着手唱工会歌，坚守工会办公室的七十名工会女干部和女工冲过去。这时，厂方的狗腿子男汉们讥笑着女工，准备趁机拍照冲突的场面。七十二名女工被机动队车载走了。四十多名女工晕过去了。

“我们到底犯了什么罪！”

“要抓去，干脆打死我们吧！”

在这混乱中，女工们爬进了车轮底下。狗腿子们向警察说：“这个娘儿们也是委员，拉走吧！”厂长也大声喊：“把这些娘儿们统统抓走！”女工们是三班倒的，所以几乎全部的女工轮班地参加了这场斗争。她们高呼：“宁肯站着死，决不跪着活。”由于这个事件的冲动，三名女工精神失常了。她们躺在床上也叫喊：“有人在那个角落里。”“要释放我们的支部长！”警察们以侵占别人财产的嫌疑抓走了女支部长。

据说，其中一个人要多少好转，至少需要四五个月。她曾每月给上中学的弟弟寄一万至一万五千圆的学费。她的父亲还没能探望他的女儿。她的父亲叹息着说：

“我的女儿连医院的门前也没有去过。要是真的发了疯，该怎么办呢。女儿住院后，厂方说往后不发工资，真要命啊。”

这可以说是今日韩国社会的缩图，是卑鄙而残忍的时代。我们切身透骨地感到生活在这种政治权力下的耻辱。这些女工在那样的环境中也希望能够保持高度的骄矜，不，她们希望的只是朴素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然而，迫使她们走的是正当年华的时候精神失常的道路！成千上万的人和她们一道，仰望着天空发问：“到底我们该怎样度过这个时代呀？”难道会有人聆听这一呼声吗？

最后介绍一下写完这篇通讯时意外地得知的几件事。民主统一党十二名年轻干部突然被捕了，理由还不得而知。由于木浦基督教青年举行示威，该会会长开的药铺被封闭了。这就是说当局开始了所谓“各个击破”。

金大中的健康状态坏得厉害。他是需要做适当的活动的，但一点也不许他活动。一星期一次和家属会面十分钟的“特别恩典”，就是他能够活动的唯一机会。然而，他连走动都不自如，走到会面室也很吃力。他一个人在铺上起卧都很费力。体重急剧减少了，食欲也不振，还患上了感冒。为了恢复他的健康，也需要有来自海外的支援。

我记得金芝河的公审日期是今天。可是不知为什么，据说在西大门监狱里进行了审判。当局只允许家属旁听和律师出庭。对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第一审已经结束的情况下，是否要在监狱里不公开地秘密进行对金芝河的审判呢？其理由我们还不知道。据说，监狱里的“特设法庭”今后仍会继续进行审判。可能要尽快结束法律程序，下可怕的决断。

据说，今天因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坐牢的咸世雄、文正铉两位神父被拉到法庭上作证。审判竟持续了五个钟头。对于把金芝河捏造成共产主义者的企图，两位神父都进行了抵抗。据说，金芝河对于那成问题的作品，曾经征求过这两位神父的意见。于是，他们反驳说同神父讨论作品的构思的教徒怎能写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内容的作品呢？看来，金芝河又面临了严重的危险。是不是朴政权又要把自己捏造的“滔天”的罪行变成既定事实呢？

我希望世界的良知注视这件事，为拯救他而行动起来。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日讯）

无 法 无 天

底层的沉郁空气

在西大门、水原或光州，
在那令人窒息的牢房里，
有人呼唤着我的名字，
捶着胸，痛心欲绝地啜泣。

这是某一首诗中被删去的一节。书刊还没有问世，就由中央情报部、警察或杂志社、出版社删去这种内容，作者也被埋藏。但是，政府却装作不知道，说什么这不过是他们自己考虑时局谨慎处事的，决不是政府出面干涉的。

在西大门、水原、光州都有大监狱。在那里，有人在恸哭。但是，人们今天也依然面带笑容满街逛游，无动于衷地过日子。难道没有一个人听到从良心涌出的恸哭声吗？难道都被政府提出的什么“我们将过好日子！”这个口号所迷惑了吗？听到这一恸哭声的诗人为这种国民伤心流泪。但他随即陷入郁闷，扪心自问：是不是自己本身也听不到这个恸哭声了呢？是不是自己也夹在那些人群里，无动于衷地度日呢？不就是那些不忍听那恸哭声的人自己选

择那种命运，到监狱里和他们一起呐喊的吗！写了《我也在走旁观者孤独的道路》这一首诗的基督教诗人，如今也在监狱里。他过去听到那个恸哭声，吟咏道：

你，
可能不明白为什么走上了
这条永不能返回的道路，
因为是叫人拉着来的。

为什么都这样折磨我呢？
是把我当成玩物的吗？
到教堂去又能搞出什么名堂呢？

走再也不能返回的路，
这是冤枉之余选择的啊。

这首诗是由于起草三·一民主救国宣言而被捕坐牢的文益焕牧师，在一年半以前即当局于一九七五年四月九日行刑杀害与人民革命党有关的八名被告之后写的。能听懂这首诗道出的恸哭声的人也是不多的。这首诗的题材是：半路上截住偷运死囚尸首的中央情报部的汽车，把它拉到天主教堂的时候死者和他的妻子之间的幻想性对话。诗的收尾写道：

在路边恸哭的女人，

胸膛被撕破，凿成洞，
从伤口喷出青色火光。

连尸骨也变成了灰烬，
我这是怎么回事呢？

死囚死得冤枉，死后依然控诉。活下来的人也还在嚎啕。但是传到很多人的耳膜里的只有响遍全国的掌权者的吆喝声。而且，给人造成错觉，掌权者的胜利和统治仿佛愈益加强。

今年九月中旬，李哲承终于接替金泳三，当上了所谓在野党新民党的领导人。 在一个人掌权， 草菅人命的地方， 哪里还有在野党存在的余地呢？ 几乎全体国民都承认，中央情报部要革除金泳三的计划取得成功。李哲承公开地说，应该放弃无谓的抵抗，事实求是地做批判势力。他们的口号就是“争取胜过斗争的对话的时代！”奸恶时代的征候，在到处表现出来。为金大中绑架事件做替罪羊滚下台的臭名远扬的中央情报部部长李厚洛，重新上任，当上了全国佛教徒会会长。据报纸报道，他在举行就职仪式的大法会上说：

“韩国佛教徒要团结起来，明确立场， 做到拥有韩国国籍的佛教。同时要拥护佛爷的正法，为给佛教增光而奋勇前进。”

李厚洛是想借佛教之题说些什么话呢？这就是日本统治的时代结束后，寺院的监督权完全被政府夺走的韩国佛

教的面貌吗？ 他们企图利用宗教返身复回权力地位， 他们是多么卑鄙无耻的人啊。但愿他们受罪遭殃。在一人独裁之下，掌权者无所不为。因此现在这个国家显得十分平稳。

国会召开了第九十六次定期会议。上次国会是今年三月召开的，只开了一个星期，休会六个月。这次国会是从上次会议后过一百八十一天才召开的。据说，这次国会将通过预算案、预算调整案和税金法修改案等。很明显，他们将按照政府的意图原封不动地通过这些法案。国会甚至事先检查议员的发言稿。

近来，报纸也觉得实在看不过去，终于报道了这样的事实：据新会计年度的预算，靠工资生活者的负担将比今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点七，而法人营业税却减少百分之二十三点八，财产承继税减少百分之五十五点九。这个国家到底为谁服务呢？有人说，因为朴政权满有自信和力量，才能泰然自若地搞出这种勾当来。有的还说，朴政权将不惜使出死气白赖的手法来打开一个新的政治局面。唯不知他们将怎样对待因此而在民众的心底里积下的怨恨。据报道，电话费将一跃增长到四倍。于是，新民党也考虑在野党的体面，诘问道，邮电部已发表说，从今年一月起七个月当中，靠电话业务等获得了五百一十九亿圆的纯利，而你们还要增收电话费，这是什么措施？他们还指出，当局要把在城市搜刮的钱拿到农村，在那里打下永久的地盘。

官僚们搞的事，不论是哪一件都要表示赞成。老百姓不得违抗他们的命令。他们已经成功地造成了这种气氛，

这是事实。但是，这相应地给带有批判态度的这个国家的国民心里积下了巨大的不满。报纸也小心谨慎地报道了政府的缺点。据说，一个公司职员搞副业挣了四万圆，但缴了九千圆税金。但他又接到了十七万九千三百零二圆的追加税单，理由是他在今年二月申报总收入时漏掉了这笔收入。一个大学教授主持一次学术讨论会得了一万圆报酬，过后他接到了勒令缴二十一万五千九百四十四圆的税单，理由是他没有申报这笔收入。这个命令是决不能违抗的。这样，在民众的心底里积下的怨恨就越来越大了。

这个国家简直没有法度。只要总统对着麦克风宣读一份声明，宪法也罢，法律也罢，都会一下子变成废纸。应保证人的生命安全的法律等于没有。 在这里， 官吏的指示，就和在上的一位大人的命令一样，是绝对的。同时，这些命令也和在上的一位大人的声明一样，都是绝顶的无赖。这决不是一般说的那种官僚主义。与其说是官僚万能主义，倒不如说是横暴的地地道道的古代专制主义。国民只能服从它。当局将怎样对待积蓄在国民心里的怨恨呢？

充满矛盾的感情

据说，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第一审时担当辩护的全体二十七名律师，决定在第二审时依旧担任辩护，而他们经常受到威胁。据说，有人不时地挂电话来威胁他们说："你想做第二个张俊河吗？"本来是说，一年前，张俊

河在一次登山中因发生坠落事故而死亡的。但看来，通过这种威胁电话，中央情报部不打自招地承认了他的死因与先前的说法不同的另一真相。有的律师在第一审时被抓去，整整两天一觉也没能睡，受了审讯，理由是他传出了一条流言，说朴正熙到前线进行视察时，险些遭到凶事。那个律师坚决要求听了那种话的人和他对质。结果，不久接到了一则通告，说上头有命令，决定不把这件事当做什么问题来处理。人们都泄了气，他们在沉重的沉默中一心希望海外的舆论和运动对朴政权施加压力。所以华盛顿的美国教会妇女们决定要在十月里每天到韩国大使馆前提出抗议的消息一传开，许多人竟不胜感激地哽咽起来了。据说，到十月末，她们要举行一千多名参加的祷告会，把抗议运动引向顶点。我们在悲哀中听到这种消息，实在禁不住喜悦。自己并不孤单的这种感觉竟会引起人们这么大的感动啊！没有悲哀，就不会有喜悦。据说，狱中的圣职者们现正在琢磨"喜悦的神学"。我听到这个话，不禁想，这简直是充满矛盾的感情。尽管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任何喜悦，而且被关进铁牢里，但还是要从怨恨的神学转向喜悦的神学哩。

这也许是崇高的宗教式的矛盾的感情。但还有与它不同的另一种矛盾的感情。那就是出自本能的求生欲的极其卑鄙的矛盾的感情。在国民中间有一种不该有的对北方的恐惧心理。谁也不相信北方会侵犯南方，但是当局大肆助长这一恐惧心理。掌权者把它当做延命之策，绞尽脑汁，压制国民的意志。如果不助长国民的不安情绪，这个政权就

不能维持下去。但是，越扇动反共情绪，国民就越感到不安，心想这种荒诞的暴力政权焉能守卫南方？在这恐怖统治下，人们都想，首先要注意不该叫人把自己叫做共产主义者。这是出自受害者意识的，如果不强调自己是非共产主义者，就不能平安无事。必须故作姿态，装出对受虐待的人熟视无睹的样子，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装作一点也不知道，不然就会随时被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越是无名的民众中间，这种危险就越大。这是个反共神经过敏症。在法庭上也一样，在说明自己搞没有搞那些事之前，首先要进行斗争，说明自己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使人感到为难的是，如今还没有发明能把自己脑子里的思想掏出来给人看的机器。现在不论是谁，都随时会被朴政权的中央情报部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这个国家的国民有意无意地都抱有这种恐惧心理和神经过敏症。

朴正熙也许是这样一种人：直到国民脑子里想的东西都要由他来支配才敢放心。在这一切都是反常的国家里，上下都处于反常的心理状态。十月一日是“国军之日”。从今年起，把这个国军建军日规定为公休日即节日。在军部万能的体制下，不会有人对此提出意见。

每年迎接国军纪念日， 在汝矣岛的所谓“五·一六广场”上举行阅兵典礼，显示“铁壁的伟容”。但是今年，早在这国军之日以前就在民众中间传开了奇妙的风闻：朴正熙将不出席这个阅兵典礼，所以这个典礼将会停止举行。一位做记者的朋友悄声说：

“朴正熙很怕发生军事政变。目前，政府貌似最强大，

民众好象返回到和平的沉默里。可是最熟悉这个假和平的真相的，恐怕还是他本人。不管怎样，他老是心神不安。听说，和往年不同，邀请驻韩国的外国外交官参加的，不是阅兵典礼，而是士官学校体育大会。人们都嘲笑说，这是愚蠢的勾当。”

风闻一点不假，“五·一六广场”上没有举行阅兵典礼，朴正熙也没有露面。结果又传开了种种“流言蜚语”。原陆军将领、所谓革命主体势力的一员、监察院院长李周一也被带走了。一九六一年军事政变当时印刷革命公约后，一跃变成了大印刷公司的光明印刷所经理也给扣起来了。近来受嫌疑的大部分是北方咸镜南北道本籍的军人，他们已经开始遭镇压和肃清等等。

背后还有这种传闻。现任国会议长是历任陆军大将、驻美大使、国务总理等职的人。朴正熙虽在利用他的亲美主义，但又为这点感到很不安。最近这个议长到美国旅行的时候，一个美国国会议员提出了“假如韩国总统发生意外的事故，你们打算怎么办？”这样的问题，他回答时大大失了言。他竟轻率地答道：“由国会议长继任。”由于这件事，他回国时，在金浦机场受到了带有侮辱性的、故意刁难的严密检查。看来，朴政权对美国政局大犯神经。

据传闻，朴正熙犯了神经过敏症，不断发作。现体制内部的钩心斗角也变得激烈了。要拿朴某这类人来引导政局，将越来越困难了。一切都是暂时的弥缝策，几乎没有长期打算，不考虑明天，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总之，朴正熙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除了这种出自人们希望

的观测之外，还流传着在军队里有许多咸镜南北道出身军人和同他们有关系的校级军官被逮捕的风闻。据说，有一些企业家和财阀也在受审讯。人们说，这一系列的事实和“国军之日”的活动都有关系。

在韩国，一般地把咸镜道地区叫做阿拉斯加。因此把这次事件叫做“阿拉斯加讨伐”。据说， 一九六一年的军事政变是由北方的咸镜道出身军人和南方的庆尚道出身军人合谋发动的。 但是，这个军事政变刚过， 就以他们企图发动“反革命”军事政变为理由，对他们进行过 “阿拉斯加讨伐”。 这次可算是对它的残存部队采取了坚决的措施。将领出身的一个维新国会议员也因贿赂事件被捕了。说他受贿是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他同上述事件有关系。国会议长也是这个集团的一员。做记者的朋友对这个事件也悄声告诉我说：

“掌权者受那点贿赂是常见的事。 看来他们把他推进了陷阱。他是当陆军中将时退伍的，也是阿拉斯加出身。再说，在李承晚统治时期，他是李承晚的嫡系。当时，由于他背后操纵了暗杀陆军中的实力派情报系统将领事件而被逮捕并判处过徒刑。要说是贿赂事件，确实不同一般，现在不让任何人接近他。甚至禁止家属探监。比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搞得还要厉害哩。但我不相信他们搞了些什么不法活动。这不过是神经过敏。”

抵抗的人和年轻人现在都保持沉默。但他们的士气是很高的。他们可以随时豁出生命挺身而出，但他们现在考

虑它的效果如何。在镇压下，他们更具体地组织斗争，加强了同志式的团结。一个年轻人说，在他们中间没有派系和意见对立。

在这年轻人的谈话中有一件事我很想告诉海外的诸人。有名的人和与基督教有关的人是受海外舆论的保护的。对他们的审判还公开进行，家属也可以和他们会面，拷刑也不那么残忍。但是，无名的人士和年轻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要经受令人毛骨悚然的苦难。他们同家属会面也几乎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他们的怨恨将越积越大。在狱中受尽迫害的人们说不定一时士气低落，做某种后退。但是年轻人的后备队将前仆后继，永不断绝。他们的个别接触是无法全部监视的。他们在一般的对话中也为保持纯洁的良心而互相带动。在底层蕴含着许许多多故事。但是，现在要介绍它，还嫌为时尚早。这里只是希望读者相信他们依然健在。掌权者虽然貌似强大，但因为总是对这种事费脑筋，所以心里总感到惶惶不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三日讯）

愚 昧 的 时 代

海难事件

摄氏零度左右的天气仍在持续。间或下一场冷雨就寒气逼人，渗入骨髓。今年，节气比往年来得早，一到十一月初就入冬了。

十月末，渔船在东海遇台风，有六艘沉没，十三艘下落不明。据报纸报道，因这次遇难事件，死亡和下落不明的人竟达四百零八名。我读到这条消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它就是目前韩国现实的象征。大部分的渔船装备不好，但是，因为近海没有可捕的鱼，不能不冒险到远海去。对于他们的这种大胆的冒险，也许该赞许，但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使人不禁心里感到不安。国民沉浸在不安之中，预感到某种事件将发生。

“韩德啤酒”公司非法的借款事件，至今成了民间的话题，但看来，它也已经变成了不足挂齿的往事。在这个国家，不管发生什么灾难，根本不去解决，也不采取任何对策，就象四百零八名遭难事件一时成了话题，而后悄悄销声匿迹一样。话题一失去新鲜味，再没有人去理它。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发生同样的事件。这就是说，这个国家根

本没有负责解决问题和事件的那种必不可缺的重要机构。

政府当局也发表说，对“韩德啤酒”公司的贷款是七十一亿六千二百万圆，保付额达五十二亿九千一百万圆。但它的有关抵押品的证件和出口证件都是假造的，而且这笔贷款是没有希望收回的。直到目前，在韩国，啤酒的产量浮于市场消费。因此，据说“韩德啤酒”公司以出口全部产品为条件，在马山建设了工厂。这个啤酒和在德国一样，贴上“伊检伯克”商标出售。

但是，这个啤酒很快充斥了国内市场。它最先出现在政府经管的观光设施和高尔夫球场上。结果，这个公司受政府的特别支援的事实暴露出来了。还判明了它是由直到两年前任青瓦台警护室长的实力派朴钟圭经营的企业。他是马山出身，在这一地区有相当的势力，所以这个啤酒公司出现在马山是理所当然的。他是朴正熙的心腹，是朴某的财产管理人，又是把来历不明的企业扩展到海外的人物。由此可见，韩德啤酒公司事件一时成为话题，但很快就销声匿迹，是有一定的缘由的。

这种事件，是周期性的社会政治事件。国民都对它感到极大的愤怒。再加上，逸出常规的事层出不穷。据说，明年还要大大增收税金。从大城市直到地方的小城市，所谓城市居民都要缴居民税，而这个税明年将增加到百分之一百五十至二百。尤其是，现政府拥有超额征收税金的暴力手段。例如，一九七六年比原定计划增收了二点六倍的所得税。 尽管如此， 人们都不敢要求当局重新审查课税额。这是因为他们深怕当局用种种手段进行报复。最近连

报纸也标了这样的标题:《一榨再榨的税金制度》、《不管生活如何,说增收就增收两倍、三倍》。

看来,朴政权企图用这样搜刮来的钱,给这个社会装装门面,好让它表面上带点活气。企业主们公然说,税款也罢,贷款也罢,不管怎样,还可以通融资金,所以应该感谢政府。可是,他们又反过来,哭丧着脸说,由于资金荒,简直喘不过气来。这可能是因为那个无力的在野党——新民党议员在国会追问到底是什么样的企业,竟给它发放了五百多亿圆巨款。全国经济人联合会发表说,由于资金荒,全国有百分之五十二点九的企业以百分之二至六的月息借用私债。这可能是要求朴政权再次下"英断",采取紧急措施禁止偿还私债的。难道说这些大部分的私债其实是该企业主集团本身发放的这一社会现象已经全被消除了吗?

与此相反,一方面有一则有关国会上的答辩的很有趣的报道。据说,对于依仗权力非法地从银行借出巨款来发横财而被捕坐牢的企业主,予以特别的关照。他们把未判决的拘留期间一天以五十万圆折算,从罚款中减掉这一笔。若他参加体力劳动也给他一天减去五十万圆。新民党议员追问道,在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一天能挣五十万圆的劳动。其实,那些发横财的人一直是搞那种出人意表的勾当,一天挣了五十万圆以上,这可能就是韩国社会的实况。

这个国家的贫穷,贫富之差,是难以言状的。甚至政府和执政党也都说,有百分之八十的国民是没有能力纳税

的。再说，纳税者的百分之八十一点六是每月收入仅有三万圆（约合六十二美元）至十万圆的低收入者；百分之十七点一是每月收入有十万圆至三十万圆的中产阶层；其百分之一点三才是每月收入达三十万圆（六百二十美元）以上的高收入者。这就是说，所谓韩国经济的发展，是在这种贫穷中取得的。

在这种情况下，频繁传来富裕阶层把外汇向海外偷汇的消息。昨天的报纸报道，某针织厂的经理把二十万美元秘密寄给住在美国的女儿，偷了四亿圆的税。他所以被拘留，不过是因为他运气不好，只要给中央情报部等的掌权者捐款，就能马上得到恩典，恢复自由，继续经营那个企业。总而言之，他就是因为没殷勤地对掌权者捐款，才遭受这种横祸的。

事实就是如此，可是政府却大肆叫嚷什么“肃清舞弊”。这个叫嚷越叫人听起来是一句空话，就越使人绝望。我问一个实业界的朋友，上缴的舞弊现象是否减少了？他答道：

“可以说，下级官员多少谨慎一些了，但是，对掌权者的上缴并没有减少，总的款项反而越来越增多，而且它的手法也变得更奸诈了。因为所有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手里，又是官僚万能的时代，所以国民是没有办法消除舞弊的。”

为掠夺国民，政府拥有庞大的机构。试举氮肥的例子，农协每吨以七万六千圆接收，以十二万二千圆卖给农民。而且在出口时牺牲血本，减价出口，也就是把生产成本一百二十美元的东西用一百美元的价格出口。因此，报纸报

道说，农民就是获得了丰收也要为私债喘不过气来。

和渔船遇难的情况一样，不合理的现象和矛盾有增无减。报纸间或用杂谈的形式，部分地报道对现实的批判。但不能指责这个体制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朴政权把在这个坏世道也能过富裕生活的少数人拉到自己一边，维持着它的统治。例如，遭受那些主张言论自由的人士的攻击的许多言论界人士，都在惶惶不安地想，如果目前的体制一崩溃，自己也免不了受审判。所以要想与朴政权共命运的少数者在各方面越来越增加。这就是目前的情况。朴政权用的手法是，把少数者变成特权阶层，拼凑他们的力量来共同镇压或操纵民众。这个社会的基础确实是脆弱无力的。

由韩国中央情报部搞鬼分裂并改组的在野党新民党的领导阶层也是这一类的人物。这样说也不是言过其实的。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国内政治靠对话，外交要超越党派。”虽然国民的领导者由于批判那些只要掌权者一个人说一句就马上废除宪法和法律的一人独裁体制而被判重刑，在监狱里受折磨，但这个在野党是不攻击和批判这个体制的。而且在外交方面，则站在所谓超党派的立场上支持这个体制。如果没有这个政权，在野党领导人、国会议员等特权，他是捞不到的。因此，这个国家的在野党为维护这个特权，实际上支持这个政权。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那些真正勇敢的少数人，才要求从根本上推翻这一体制。从历史上看，何曾有过不对体制进行挑战取得真正进步的例子呢！在这个低劣的法西斯制

度下，更是如此。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五日讯）

重新开始的审判

传说，中央情报部的一个高级官员被革了职，理由是他的女人借外交官的名义运进了外国造化妆品。他们说：这个人借外交官的名义竟能干出这种卑劣的勾当，可见这个人在同美国的政治交易方面也会发挥那种过分的卑劣的忠诚。但凡是韩国人，谁都不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会有人不经朴正熙的指示干出这种非同小可的大事。朴正熙虽面临这种事态，但他也许还在摸索妙策苟延残喘。据传说，不久将更换包括中央情报部长在内的内阁阁员。

这一丑闻开始传播的时候，掌权者周围的人们说，在美国举行选举时也总是发生这类事，不必大惊小怪，便尽量不把它当做重大问题。据说，如果有人把它当做严重的问题看待，他就会被指控为失败主义者。这样不把它当做严重问题的地方，是不会有真正的变革的。有一个朋友拿“初生的狗崽子不怕虎”这一俗语打了个比方。在国内，这一手法奏了效，因此，把它又扩大到国际关系方面，至今收到了相当的效果。有一个朋友对这一事态的解释，反映了一定的真实。他说：

“看来，比起洛克希德行贿事件来，日本对于韩日之间的贿赂事件更费脑筋，力图掩盖它。中央情报部的作为也罢，政治家之间的交易也罢，都加强了韩日之间的勾结。所以，日本政府考虑朴政权由于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干下的勾当陷于没脸再说话的处境， 立即出面替朴政权说话，反对了美军的撤退。在同美国的关系方面，面临了解放以来最大的危机。据说，如今只在形式上维持着关系。我们拿这种肮脏的行贿事件，可以把美日韩政治体制做一次比较。美国是可以自力揭发事态的真相的。可是日本被别国揭露出来，弄得动摇不定，但力图掩盖它。朴政权与美国和日本不同，犹如磐石，泰然自若。因此看来，日本人认为，朴政权才是最稳定的政权。”

我的朋友说，在朴正熙看来，在青瓦台，他和喽罗们一起讨论收买美国议员的情况被录下音，胶带又传到美国这件事要比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干下的丑事更严重，为此深感不安。这就等于警告和暗示朴正熙，美国几乎全部知道他至今谋划的重大问题和正在谋划的其他重要问题。朴正熙为维持他的政权，是不是已经计划挑起同北方的纷争，把美国拖进这一纷争里来呢。对这一问题也有各种推测。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重新开始的对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者的审判情况。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人们曾说，在韩国，民主只在法庭上才有。一九一九年三·一独立宣言事件当时，也未曾有过这种法庭。这完全是审

判者被审的法庭，它与其说是被告受审判，倒不如说是他们为民主而斗争的法庭。这个法庭，将在韩国的审判历史上永放光芒。与其说它是法庭，倒不如说它是讲授民主的教室。就是这个法庭，对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们进行第二次公审了。

我还要谈谈关于最近进行的别的审判中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实。有一个从事信仰复兴运动的牧师，以说教时诽谤了政府为理由被捕入狱了。由十月至十一月上旬，对他进行了第二审。中央情报部进行幕后工作，说如果他在法庭上保持沉默，就释放他。于是，教会的长老级牧师们特地到监狱苦苦说服了他。可是，审判的结果，并没有按照诺言释放他。他们的这种欺骗行为激起了周围的人们的忿怒。

这里再介绍一件比这更悲惨的事。希望读者不要把这件事看做是毫无根据的流言。我感到苦恼的是因为怕与这个事件有关的人受迫害，不能更具体地说明事实。在贫民区工作的大学生们被捕，和回国留学的旅日韩国人学生一道被捏造成间谍了。他们现在被处以重刑，生命垂危。这里谈谈他们是怎样招供间谍行为的。

他们在陆军保安司令部西冰库刑讯室受了审讯。这是比南山的中央情报部刑讯室更可怕的地方。他们对学生进行种种严刑拷打，强迫学生们招认间谍行为，并威胁说，如不服从命令，当场就打死。如果学生们进行抵抗，就给他打针，使他变成精神失常的呆子。这样终于使学生们屈服了。

要叫学生们在法庭上承认间谍行为，是需要对他们进行一番教育的。于是为了使那些未曾去过北方的学生说到过北方，教了他们北方的地理。从什么是共产主义教起直到看地图的方法、北方的港口、地名、公路等一一教给了学生。 这种教育整整进行了五十天。 学生们用大部分时间，背诵了从录音胶带传出的有关间谍行为的事实。他们条件反射地反复背诵了它。他们的间谍番号，与他们曾住过的房间的钥匙号码相同。他们受过这种教育后，被拉到第一审法庭上去了。站在法庭上的他们，都象是精神失常的白痴。他们在法庭，按照学到的东西"供认"了一切，结果被判了极刑或重刑。

但是，他们的家属都相信他们没有罪，当他们走进法庭的时候喊道，要豁出命说实话。在第二审时，学生们鼓起了勇气，揭露了一切事实。他们揭穿了不仅在刑讯室，甚至到牢房进行拷问的事实。据说，他们所以能够拿出这样的勇气来， 是因为他们得知了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领导人也被捕坐牢。参加共同斗争的自觉、要和他们一起进行斗争争取胜利的一线希望，使这些落到精神上的绝望和肉体上的虚弱的深渊里的他们奋然站起来了。这恐怕是他们的最后一次的挣扎吧。不知他们将面临何种命运。

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坐牢的李文永教授，也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 他为改善监狱里的生活进行了斗争。他除了吃从外面送进来的食品以外，一概不吃监狱给他的东西。在最后的两天，他还进行了绝食斗争。于是十一月九日，律师去和他见面，抄下他的要求，向汉城拘留

所所长提出了十八项“要求”。这个要求开头写道：

为了帮助制定旨在给被押在拘留所的人员保障最低限度的权益的拘留所职员应遵守的规则，进而为我国确立健康的民主政治道义，我认为在我所要求的规则里至少应包括我提出的下列十八项条款。

…………

其中包括：拘留所牢房不该位于从外面可用望远镜窥视或进行射击的地点； 房间里不该漏雨、 透风或老鼠爬进；应供应铅笔等等。尤其下列的几项，很带有讥讽的意味。如：

屋里不挂神圣的太极旗；

“我们的宣誓”，如不加上民主这一句就不贴；

不挂政治文件“国民教育宪章”；

被押者可以不听《新村之歌》；

不做所谓朝行仪式；

不许殴打和侮辱被押者；

允许被押者受民间医生的诊断。

从上述的要求中可以想见所谓维新精神多么残酷地对坐牢的人进行精神拷问。李文永是出名的行政学者，所以他感受到的可能更多。从前，在牢房里可以用睡袋，可是从今年起，根据在上的一个人的命令，禁止使用它，只允许从外边送进两张毯子。 他亲身体验掌权者的这种报复后，可能已感到他至今研究的行政学是多么抽象的东西。但愿他身体健康，能为未来的行政学做出贡献。

在狱中可能会产生新的思想，真正的民主也会萌芽。在上次的通讯里也写过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坐牢的牧师们正在探求“喜悦的神学”。

我感到很遗憾，不能在这篇通讯里援引长达一百六十八页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上诉书。韩国基督教方面要求当局保释那些“无须担忧逃跑”的民主人士，而后进行审判。并发表声明说，他们将继续为“那些遭难的人们”祈祷，在上诉审判中也将全力支援他们。有良心的少数人，在代表国民进行的斗争中并没有屈服。另一方面，由于为被拘留者祷告而遭中央情报部逮走的事件，越来越频繁发生。有一个年轻人在祷告时说了一句“我们失掉了自己的一切”，就被中央情报部逮走了。审判越来越简单化了，只进行两次公审，就下判决，这已成了惯例。尤其在第二审更是如此。因此，人们都在担心，对与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的第二审是不是也会这样草草结束。看情形，不管遇到何种情况，他们将死抓金大中不放。

十一月十三日，第二审公审时也大大限制了旁听，给一个家属只发了七枚旁听证。律师们要求法庭承认被告提出的证人。检察官拒绝了这一要求，但审判官却承认了俞镇午（前高丽大学校长、宪法学者)、千宽宇（前东亚日报主编)、吴世应（新民党国会议员)、张源宗（东国大学教授、经济学者）等四个证人。他说，至于其余的证人，等到这四个证人作证后再讨论。金大中指名朴正熙作证人，这在法庭上引起了哄堂大笑。因为他被起诉的又一个理由是违反选举法。所以他主张，持有与他不同见解的朴正熙

应该出庭作证。全体家属发表声明，对于当局在第一审中下不公正的判决，对持有旁听证的人进行“监视、 带走、软禁、甚至施加暴行”等事宜提出了抗议， 并这次又拒绝了旁听。

对于金芝河的求刑及判决审判，最早可能在十一月末或十二月初进行。这是因为大法院将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才最后审理回避审判官的申请。在法庭上的斗争今后仍将继续进行。

据说，对于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进行的第一审判决提出抗议的一百三十五名美国国会议员的联名信，也已传到青瓦台了。青瓦台一直拒绝接收这封信，但最后还是按照美国大使馆的要求接收了它。尽管事态已经到了如此地步，但最近我听到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说， 在日本教会内， 站在另一种教会政治立场上的人们，准备同韩国教会内的某个派系一道向关心韩国问题的人们发表奇怪的声明。 他们原想发表声明， 说明韩国教会的多数并不支援和同情与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们，但这种企图未能得逞，最后归于失败。

我们无法理解这种人的头脑是否正常。难道说，为日本教会内的争斗需要这样做吗？你们到底打算与带有何种背景的基督教徒携手呢？他们反对释放坐牢的人，竟想给别国的恢复民主的斗争泼污泥，作为基督教的牧师怎能抱这种想法呢？真叫人不寒而栗。把这些消息告诉我的某教会的长老慨叹道：

“大概在一个月以前， 他们说什么一架来历不明的飞

机突然出现在汉城航空禁区，进行高射炮射击，闹得市民大为惊慌。结果，有三十一名负了伤，两名丧了命。传说，那是西北航空公司的货运机，但一切都很怪诞，中央广播电台广播说，这是一次训练。报纸根本没有报道发生死伤的事实。他们甚至以杀人的勾当在国民中间引起恐惧心理，警告人们不要接近军队。因为不公开真相，所以人们更感到害怕。可以报道这种事的报纸，在韩国是没有的。因为事前要受检查。如果为某些文章引起麻烦，耽误了发报纸的时间，就会影响收入。所以他们搞商业主义，干脆删掉那种文章。印刷厂在印书的时候，必须先把一份校样送到当局去。”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想痛饮一场，大声疾呼，发泄郁愤。首先很想谈真实。近来，韩国人常常想起民间故事来。过去，有一个国王的耳朵象驴耳一般大。国王经常戴帽子把耳朵遮住。有一个部下一想起国王的那个驴耳似的耳朵，就禁不住发笑，可是他总是强忍着笑，天长日久，终于憋出病来了。有一天，他横下心，走到竹林里，大声喊着“国王的耳朵象驴耳”尽情大笑起来。于是，每逢刮风，那个竹林也和着喊“国王的耳朵象驴耳”。

这便是反映今日韩国人的心情的一个寓言。

最后，我听到这份写得不怎么样的韩国通讯译成英文问世，衷心表示谢意。我听到以拷刑捏造间谍团事件的消息的那一天晚上也没能入睡。我一心想把在韩国的这一残酷现实转告给海外，整整四年写了这份通讯。起初，我没有想到这么长期地继续写这份通讯。真的，光阴似箭。我

认为，在韩国产生的这种残酷现实，不只限于韩国这一国度， 凡是有人虐待人的现象的地方， 哪里都会有的。因此，只要条件允许，我想继续写这份愚昧的时代的证言。对于各位的支援，特表谢意。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五日讯）

冷 酷 的 冬 日

三个人的证言

越想越觉得朴政权是个不可捉摸的政府。由于总统发表有关在东南海岸的迎日湾出石油的谈话引起大骚动的这一年也在静静地过去。他们曾许下诺言，说要在今年五月间揭晓美梦的“全貌”，但是，到头来什么也没有搞出来。到了现在，报纸反而大叫大嚷，说什么原油涨了价，今后问题将更加严重。看来，他们准备把今后重又遇到的经济上的困难都只归咎于石油危机。

朴正熙拿石油问题造谣生事，骚扰民心，当然这不算违反紧急措施第九号。对这个问题，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谁也不能说长道短。现在你只现出担忧的神色，说句石油价涨了百分之十，就得追加开支宝贵的外汇一亿七千万美元这种话就可以了。而且对那些负责国家政治的“有苦劳而没有功劳”的朴政权表示同情，照他们的说法，说句憎恨“石油霸权政治”的话也就算安分守己了。

国民真的完全忘却了政府造的那么多的谣言吗？朴政权造的谣言和它的腐败一样，是出自社会制度的。朴政权认为这么点问题是自然该有的，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是，

这些谣言深深地刻入民众的心里，变成无法解除的怨恨。到了时候，它将变成爆发的能量。

再加上，入冬以来，电力情况越来越困难了。因为完全没有备用电力，实行着限制供电。直到现在在火力发电厂建设中发横财的勾当也揭发出来了。据说，外国的掮客和国内的财阀狼狈为奸，用昂贵的造价建设发电能力最低的工厂，榨出世界最高的电费。加上，政府对此提供了莫大的财政援助，用一千圆的价钱买进了现货交易价格七百圆的民间股票。作为民间人拥有全国性电力公司的股票的人，就是现政权的寄生虫——高级官员。这样的事实被揭发出来， 国民还是要保持沉默的。 当局说是对此评头论足，会阻碍韩国保障安全。如果有人不听这一套，硬说几句， 就会给你扣上共产主义者或“北方间谍”的帽子。再说，不知所措的民众还听到了朴正熙叫嚷的“要以精神革命来闯过难关”这样震耳的话。据说这是“统一主体国民会议”议长朴正熙向这个国民会议做的训话。“统一主体国民会议”是总统本身做议长、 每隔六年把朴正熙选为总统的怪诞的机关。 他说：“全体国民要一心同德地团结起来，人人都要力争带头消除各自的生活周围发生的浪费和不道德的现象， 发扬埋头生产的风气。” 这是掌权者要利用国民的伦理意识的呢，还是他们要把自己装成尊重伦理的人呢。 看来他好象完全没有感觉到， 他们在到处原形毕露这一事实。 看来他们想要说， 问题不在于掌权者方面，而在于国民的浪费、颓废和不道德。朴政权的态度确实是不可捉摸的。他们的感觉完全麻痹了。他们大肆叫嚷要消

除腐败现象，但有时他们自己露出马脚也不在乎，根本不想掩盖。前几天报纸报道说，过去当过商工部长官的人已经复原，做了新建立的国营工业企业的董事长。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约一年前，他的妻子牵连宝石走私事件，在受警察的住宅搜查时被搜出宝石和大笔现款，引起过公众舆论。当然，由于上头的命令，这个搜查中途停止进行，搜查住宅的那个勇敢的警察，负起了做事轻率的责任。朴政权独揽大权，他们一伙儿任意贪污国家财产。虽是这样的政权，它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他们最害怕基督教方面拿伦理问题发动进攻。一个朋友对我说：

“一个美国人说，朴政权害怕六个势力。那是军队、在野党、言论、学生、工人和宗教界。他们现在都保持沉默，唯有最后的宗教界还在活动。所以，朴正熙对他们咬牙切齿，恨得他睡不着觉。”

如果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还在活动，可以说那个人还没有死；如果那个人用伦理意识来呐喊的话，那可能是因为心脏意料之外地还在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说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受审判的人们的行动和思想扎根于自己的宗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心脏还在跳动，那末，血液总有一天会循环全身。学生和军队也不能那样老是平稳地得过且过的。法庭上的斗争现在也进行得很勇敢。如果没有旁听的限制和森严的警戒，法庭上的发言毫无限制地传到外边，那么，正象朴政权所担心的那样，一定会发生某种事变。这里简单地介绍十一月二十日进行的对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情况。

原决定， 这天先由前新民党领导人、 前高丽大学校长、宪法学者俞镇午作为证人出庭。但审判官宣读了他寄来的说明他因病不能出庭的信。然后进行了同律师方面的证人张源宗教授的对话。他是以批判性经济学者著称的。这简直是一场令人难堪的场面。下面介绍他们的对话：

律师：民主救国宣言中说，农业遭到了牺牲。你的看法如何？

张源宗：发展中国家都是如此。这是因为发展工业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虽说如此，我国的农业也还在发展。

律师：那末说，民主救国宣言歪曲事实喽？

张源宗：我是那样看的。

律师：希望举具体的统计数字来说明。不是欠了很多的外债，在出口方面不也接连亏空了吗？

张源宗：我是专攻理论经济学的， 所以没有掌握数字。凡是发展中国家都为开发，需要借款。不应该把借款和亏空看成是什么严重的问题。

张源宗教授的这一突变的态度是令人震惊的。虽然大家都认为在它的背后可能有不可告人的悲惨的缘故，但无法抑制愤怒。

这回他又同被告们进行了问答。

金大中：感谢你繁忙中抽身前来。不是应该正确地利用借款吗？这是要由国民还的债。不是在出口方面也弄得债台高筑了吗？拿那宝贵的外汇，利用朴东宣之流，对美国发动了贿赂攻势。这在美国报纸上不是引起了很大的舆

论吗？

检察官：（厉声叫道）那类事与本案毫无关系。

律师：因为是三·一事件后发生的事，所以我认为应该在审理本案时研讨。

金大中：我从十年前起就在国会上把这种腐败事件当成了问题。据说美联邦调查局从三年前起搜查这个事件。说是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四，但这个数字里包括渔业方面的数字。农业究竟发展了多少？每年有五十万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的大部分住在贫民窟。对此你的看法如何？

张源宗：（沉默）

文益焕牧师：所谓经济的增长是不是以闭眼不看通货膨胀为前提的呢？关于国民是否享受产值增长的份儿的问题，在你所说的理论经济学里不也是重要的吗？

张源宗：因为没有统计，无法知道。

李文永教授：我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地方见到你。我虽不是统计专家，但我专攻的行政学也经常利用统计。你利用的统计材料是来自哪个方面的呢？

张源宗：是政府的统计。

李文永：没有别的统计吗？是不是应该做比较呢？如果没有那种良心，又不诚实，那就不能称为学者了。我们都将分别坐八年、十五年的牢了。所以我们才希望你作证言，可你怎么能说出那样不负责任的话呢？

张源宗：（沉默）

咸世雄神父：你不认为重要的不仅是经济，还有国民

的伦理精神吗？

张源宗：我也认为是那样的。

咸世雄：掠夺、腐败、不公平的分配、贿赂，这些都可以说是好的吗？

张源宗：（沉默）

看来，张源宗教授沉痛的神色，深深地印在旁听者们的心里。他似乎就是今天在这暴压统治下的许多韩国人的象征。在以沉默支持朴政权的人当中，象他这样的人占大多数。据说，由于他写的文章和发表的言论，他正受中央情报部的调查，还受到要从大学撵掉的威胁。下午继续进行了新民党国会议员吴世应和前东亚日报总编辑千宽宇的证言。下面介绍他们的证言：

律师：民主救国宣言指出，政府忽视同第三世界的联系，只追求同大国的联系。但到了现在，甚至遭到西方阵营的唾弃。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吴世应：第三世界差不多都反对帝国主义，但是我国重视同遭到谴责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联系。从去年开始对第三世界进行了工作，但和北方比起来还显得落后。

金大中：还遭到民主国家的唾弃。据说，韩国甚至在美国国会上也成了问题。

吴世应：是那样。

金大中：韩国在国际上陷于孤立，这是事实吗？

吴世应：是事实。

金大中：我曾反对了向南越派兵的措施。特别是主张

不应该派正规军。由于这个派兵，同第三世界的关系恶化了。这样的批评是为国家着想的，也是考虑保安的。政府不是应该接受这种批评吗？

吴世应：我也是这样想的。一九七四年在东京举行的各国议会联盟会议时，北方的代表向与会的六十七国代表提出了南方的蹂躏人权问题。

检察官：最好不要谈国家机密问题。

吴世应：不要把人看贬了。我熟悉国家机密条例。不需要你来指教这些。这个问题，六十七个国家的代表都知道，所以不是什么机密。

金大中：蹂躏人权不是对国家保安毫无帮助的吗？

吴世应：那是危害国家保安的。

金大中：由于这种事，我们才站在法庭上。这本身不就是危害国家的吗？

吴世应：批评是民主的象征。

…………

律师：你是否认为有镇压言论的现象？

千宽宇：我认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是那么简单的。新民党在国会上提出了腐败问题，这种程度的自由是有的。但是有关国家领导问题的批评，也就是对政府的批判是不允许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言论自由是没有的。我认为言论的使命是揭露腐败现象，唤起舆论，而这种自由是没有的。

律师：那么说有镇压言论的现象吗？

千宽宇：可以报道事实，但不允许对那种事实进行批

判，还加以镇压。

律师：在第一审时，检察官说，我国有报纸、无线电广播、电视广播等各种东西，所以说有言论自由。你的看法如何？

千宽宇：种类的多少不能证明有言论自由。现在没有立场不同的报纸，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报道消息。

检察官：你说言论真的遭到镇压吗？

千宽宇：我不是说很难说吗？一句话，从言论的使命来看，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

千宽宇虽然严肃地做了答辩，但听起来好象在讽刺法庭，常常引得旁听者发笑。人们都知道，这个法庭是从政治上决定一切问题的。 而且认为， 说出来也是无济于事的。但是他们都以真挚的态度说了话。

国会上的问答

据说，韩国法庭的审判官和检察官的百分之七十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这是令人痛心的现象。我认为这是因为许多有良心的得力的法官对政治审判和腐败的法庭忍无可忍，选择了律师职务。就是这样年轻的法官在全罗南道光州审判了第二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他们为了防止律师和旁听者们的汇合，同一天进行了对这两起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

光州法庭也实行了旁听证制度。给被监禁的牧师的家属发了四十张旁听证，但是家属拒不接受它，于是，第二天发了一百张。法庭上聚集了约六百个人。这么说，他们的一半以上是没有旁听证也能入场的所谓机关人员。不知是什么缘故，据说，五名被告中的一个人被分离开来，单独受审判。

四位牧师可能是由于紧张和恐惧，没有回头看一眼。从汉城赶来的牧师和传教士大声喊道："请你们向后看看吧。我们是从汉城来的。"他们这才振起精神现出了微笑。他们被关在可怕的威胁笼罩的单身牢房里，好象失去了外界的人的爱。对他们的戒备很森严，有十六个看守监视这四名牧师被告。照朴政权的话，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是政治犯。

他们几乎没能同律师会面，因此，审判一开始，律师们就说，他们没能做好辩护准备。对此审判长的回答倒挺有趣。他说：

"为什么没把这件事告诉法官啊？ 为这件事推迟了审判，被告们没有意见吗?"对此，律师用叹息似的语调回敬道：

"在这样的政权下， 我们切身感到自己是多么无力。我们办了正式手续，到监狱无谓地等了一整天。在现行法律下，我们是完全无能为力的。 再说， 除了正式法律之外，随便造出的法律太多了，所以那正式法律也无法实行了。"

在旁听者中间爆发出了"对，对""阿门"的喊声。被告

牧师也应声说："我们不愿意在这样的法庭上受审判。 推迟审判也好，希望进行公正的审判。"在法庭外面，约有三百名没能入场的教徒和制止他们的武装警察发生了冲突。教徒们高喊："维新宪法也是个法吗?"最后， 他们为了到光州基督教青年会馆去举行祷告会，开始了示威游行。警察逮捕了六名领导人，于是三百个人立即朝着警察署涌去了。这么一来，那六个人给放出来了，人们在基督教青年会馆流着泪举行了祷告会。 到这个法庭旁听的朋友 最 后说：

"审判长对律师说：'大家都在注视我， 不要感 情 用事，如果好好协作，就可以妥善处理。'这是他要在政治审判上保持体面而施展的一箭双雕的战术。因为他们是农村教会的牧师，所以背后有会员们温暖的支援。据说，牧师被监禁后，教会反而搞得更活跃了。连那些一直不露面的人也都上教会来了。那只黑色魔爪不久将也伸向这一和睦的教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汉城进行了对三·一救国宣言事件的公审。从各方面来看都是挺有意思的审判。十点二十分审判一开始，辩护人方面就对审判官方面驳回他们申请的证人一事提出了抗议，结果双方拿它争执不休。加上，他们还要在这里同时审理与这次审判没有关系的金大中违反选举法事件的政治审判。审判官一直压制了律师方面，可是律师方面所说的话压倒了这个法庭。律师方面说：

"我要谈一谈上次的审判当时有关证人的问题。 张源

宗教授被申请为证人时，曾对本律师说，他很想做真实的证言，可是八月因得知文教部通告他为不可信任的人物，所以他要求予以保留。于是，我们也应承了他的要求。可是在公审当天，他突然出庭站在证人台上，说了与他迄今写作和发言的内容完全相反的话。对这种情况，我们实在无法理解。俞镇午曾对本律师说要作为证人出席，可是，听说给审判官写来了不能出席的奇怪的书简。这也是无法理解的事。对带旁听证的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加甚。当局从各方面阻挠他们到法庭来，有时在途中截拦他们。在法院门口，强迫他们盖毫无必要的章，同居民登记证核对后叫他们写名字，并强迫他们保证不对别人说出这些事。难道你们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也能搞出公正的审判吗！”

律师方面说，他们在第一审公审时申请的所有证人全被驳回了。 在那以后也受到了各种形式的压力， 尽管如此，他们仍对审判官予以一定的期待，希望他做出精明的判断。可是如今那个审判官也不可信赖了。在光州进行的第二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也不是公正的审判。就是新闻记者来到了法庭也没有写出文章。因为人们对在汉城进行的这次审判寄予一线希望，所以希望听取更多的证人的发言，做出公正的审判。他们还说，要把张源宗教授写的论文也作为证据提出来。但是，检察官大喝一声，说：“那是没有关系的。有了他在法庭上的发言就可以。”就这样给驳回了。

这天，曾参加有关基督教的国际会议的日本、欧美、东南亚的教会领导人到法庭旁听了一会儿。这成了很大的

鼓舞。但令人可笑的是，他们乘坐政府为了向世界标榜公正的公审而提供的车子来了。这里介绍一份这个国际会议给朴正熙的英文公开信。信里写道：

“在三·一宣言上签名的人们由于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基督教的信念，博得了全世界的支持和赞扬。我们相信：他们所以参与这次事件，是因为他们希望实现基于基督教见解的社会福利。因此，我们要求释放在汉城和光州受审判的与三·一事件有关的人们。同时，我们要求释放金芝河。我们还特别关心学生，敦促韩国政府对现在在韩国成了良心犯的人们实行特赦并予以释放。”

我向世界教会的各位表示衷心的感谢。你们来到人权遭到蹂躏的现场给予了很大的鼓舞，这将在教会历史上写下新的一页。朴政权对此表露的态度是：“外国人对韩国写的信，从国际法上来看是不妥当的。”并说，对此寄予期待是事大主义，那又是“干涉内政”，“政策不受那种压力的摆布”。但是，卡特当选为总统后，朴政权确实由于那种压力发生了很大的动摇。这种看法恐怕是正确的。

在一段时间里，国会预算决算委员会稍微批判了国家的政治，报纸也多少报道了有关这方面的消息。在野党里也有人说了些挺勇敢的话：你们嘴上说摸索南北对话的途径，为什么不能和在狱中的与三·一救国宣言有关的人进行对话呢。在野党在诘问政府同美国的关系的过程中，暴露了弗莱则等美国国会议员曾要求对韩国政府采取重要措施的事实。国民早已知道韩美关系处于危机。一位记者朋友对此做了如下的说明：

“即使政府不公开真相， 也会一点一点地透露出来，在沉浸于不安之中的国民的心里越来越扩大起来。民心急剧地脱离掌权者。如果遭到美国的唾弃，掌权者将失掉几乎全部的地盘。掌权者说，为了保安才镇压人权和民主，可是现在就是为这个，连美国的支持也要失掉了。这就是说，在保安的借口下，就要失掉保安的最大力量了。朴政权的非民主的生存方式、它的延命之策就成了他象口头禅似地叫嚷的保安的最大敌人。他曾夸口说，美国还是给予支持的，但这种神话已经被粉碎了。卡特当选总统后，韩国的国会、其中在野党的呼声也强烈起来了。虽然是那样卑劣的在野党，还是有比没有强啊。”

实际上，最近从国会透露出各种消息，使得各报多少活跃起来了。虽对他们来说是不幸的事，但是不是这么一来，民心就从那冬眠状态中大大苏醒过来呢。当然在答辩时还不能说出与对朴正熙的个人迷信相抵触的话。一个在野党议员并没有忘记采取谨慎的态度，首先花了很长时间赞扬了朴正熙个人， 然后批评了总理以下各级官员的缺点。一个记者朋友给我谈了最近流传的有关对朴正熙的个人迷信的插话。他说：

“某一个纺织厂有良心的工会干部因为这件事被捕了。事情是这样的：由政府硬派进这个厂的家伙竟恣意调换了女工宿舍的舍监。于是问他为什么这样做，他就回答说，这是总统的命令。工会干部说，总统没事干怎的，连这些琐事都来管。这就犯了总统冒渎罪。目前这个工会会员们为使他获释进行着斗争，但是警察当局说，他们不知道谁

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单是在国会上的答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就足以使人们忧虑这个国家的将来。自从朴政权掌权十多年来，国民的租税负担在国家预算中增长到五十四倍。现在，工资收入不到先进国家的十分之一。一九七五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是四万六千圆。领到两万圆以下工资的工人竟占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

对一个财阀提供四千亿圆特惠贷款的事实也暴露出来了。韩国的银行都置于政府控制之下。还有人控诉了如下的事实：

“有人为筹措学费出卖山地得了二十八万圆， 但要缴纳一百五十万圆让与税，对此，他向国会提出了请愿书。有一位朋友出卖土地得了二百五十万圆，但要缴纳二百三十万圆的让与税。”

不动产的买卖中断了。就这样把过重的赋税负担强加于一般百姓的身上， 但对大企业家则给了无限制“特惠”，如：提供低利贷款、以挣得外汇为名免缴国内税、以关税和公共设施使用费支援输出，等等。一九七六年，单是通过租税制度、关税、公共设施使用费提供的支援，就达国内租税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八。这正是拿输出迫使国民贫困的政策。

再说，汉城的主要建筑几乎都是外国人资本家的。据说，同日本合营的韩国产业开拓公司成了日本的亲韩派暗中活动的场所。为了发展同日本的关系，在东海岸正在兴

修大港湾。听说，在庆尙道昌原要兴建占地面积一千二百万坪的大军需工厂，但这决不是为韩国军的。人们说，这是美国和日本回避国内的批评，跑到这里来大搞军火买卖的。这样，他们要把军火商的牌子挂在韩国人身上。就象过去把韩国军赶到越南反共战场，把韩国变成第三世界的孤儿一样。朴政权派兵越南，获得了美国的有力支持。这些大国今后要对韩国搞些什么勾当呢。而且所有丑恶事件招致的后果都加在全体韩国人的身上。当韩国人同朴政权进行坚决的斗争的时候，大国忙于压制韩国人，支撑朴政权。 但到了现在， 却赤裸裸地揭露朴政权干出的丑恶勾当，把它描写成为所有韩国人的丑恶勾当。一位美国朋友告诉我说，弄得不好，会在美国人当中引起讨厌全体韩国人的情绪。

我想对日本朋友们说几句。你们曾赞扬韩国的年轻官僚说，韩国拥有头脑非凡的人和技术人员。但现在你们该认清他们的真面目了吧。你们现在可能了解到，从美国回来的他们一伙，实际上是企图收买美国统治阶层的爪牙，他们的价值是超不出这种水平的。韩国驻美大使也是那号人物。尽管如此，同他个别地见面时，他就装出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样子，吐露他们的苦衷。但那是他那卑劣的双重人格的表现。据说，这个韩国驻美大使忿懑地说，他最近提出了辞呈，但没有得到批准。法西斯体制的走卒还能留存国民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吗。

现在和朴政权进行斗争的人决不是极端主义者。他们只是因为不能保持最正常的良心，从某种意义上说不能保

持最低限度的良知而挣扎着。我想对日本朋友们说几句。有很多人反省说，在过去的历史上，由于没能阻止军部独霸大权，经受了那么大的不幸。如果现在不能制止日本经济的无节制的扩张，恐怕会重演往日的不幸。据说，日本快要举行选举了。在选举后，是不是会出现更忌讳由于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干出的丑恶勾当被揭露使韩日之间至今的丑恶勾结也暴露出来的那种政权呢。过去，当日本人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的时候，那个不幸在朝鲜和中国蔓延了。同样，那更致命的可怕的不幸，是不是今天也在汉城的饭馆里洋溢着的日本人漫不经心的享乐为象征的环境中蔓延呢。从饭馆里传出的他们那欢喜若狂的声音也许是他们把朴政权下的太平当做自己天下的欢乐的尾音吧。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日讯）

汉城大学的民主救国宣言

韩国有句俗语说："一只乌贼给鲜鱼店丢脸。"这是说，一条小烂鱼倒能糟踏一家鲜鱼店的牌子。朴政权对美国政界搞的丑恶勾当对韩国人来说是和那个烂鱼一样的东西。解放后三十年的历史上，怎么就出现了这么一个叛逆集团了啊。这对这个民族的命运来说是该叹息的事。到了现在，国民才模糊地认识到韩美之间发生的各种严重的问题。报纸上只是用《议论韩美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这种标题，

刊登了没有任何内容的外务部长官和美国大使之间的会谈的短讯。国民曾在心里抱着期待和不安想，卡特当选总统后或许会有什么事情来临。

据说，国际大赦令委员会把一九七七年规定为“良心犯的一年”。他们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运动， 主张应该释放那些不使用暴力的良心犯。据报道，这是在十二月十日人权宣言日通过的决议。

据说，在这人权日之际，韩国政府要发表谈话，举行活动，这简直太可笑了。法务部长官的谈话，好象多少承认他们的政权蹂躏国民人权的事实。他说：“自由和人权，只有自觉地维护它的人才能把它作为真正的自由和权利享有。”国务总理在人权周纪念会上说，因为要坚决粉碎北方的侵略，捍卫自己的安全，所以韩国人权的存在方式不能不有所不同。他还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无视这一点，要求保障人权，那只能是“无视现实的空谈”。那个纪念会是只有政府长官参加的，是没有国民、没有人权的一次聚会。

近来， 报纸也可能对当权方面的这种人权论忍无可忍，迎接世界人权宣言日，发表了社论。社论写道：不应该无视朝着人权时代发展的历史， 如果无视人权， 那末“近来常谈的国民团结的形成”也会发生裂痕。如果侵犯个人的人权，“社会和国家的安全”也会受侵犯。因此，必须站在这种人权意识的立场上，设计今天和未来的国家。虽然社论谈得很消极、概括，但该说的都说了。

象三·一民主救国宣言那样在世界上引起注目的事件，可能被利用为对美关系的交换条件。但是看来，与学

生事件有关的人，偶而有服刑期满出狱的和假释的。这样的时候，总是有中央情报部的较高的官吏在释放的前一天突然出面威胁说，你还要反对维新宪法吗！并用老一套的话说，如果出狱后再犯错， 就要立刻关进去。 这样的时候就从朋友那里送来秘密信，说可以适当地答应，出狱后看机会再次展开斗争就行。 但据说， 其中也有拒绝这样做，自愿留在监狱里的年轻人。有一位先辈说：

“×××君的假释，由于本人顽固拒绝， 被取消了。他的良心不允许他听从中央情报部的话。只要中央情报部官员来访，就是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或司法部已做出决定的事也都被取消。 ×××君对要取消假释的威胁， 付之一笑，并明白地回答说，我要同金芝河兄共患难，从心里帮助他。看来，年少的女学生政治犯表现得最强硬。这可能是和东洋女性的贞操观有关系。”

金大中的狱中环境也好象多少有了改善。把收容二十一名的大间牢房，给他做单身牢房了。法务部长官曾在国会答辩中说，每坪平均收容三点八名，最高收容七名。所以这可以说是了不起的待遇。有小火炉可以热东西吃。还放有一张床。有风闻说，那些与三·一救国宣言有关的人也在得到同样的待遇。据说，李文永教授为改善待遇而进行的绝食斗争也奏了效。

把国民弄得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只有来自外部的压力才能对掌权者多少发生影响。所以，如果知识分子对外国记者说点什么，朴政权就立刻指责他说是事大主义者。为了同独裁进行斗争，应把和外国良心的团结的问题看做是

斗争战略策略中的最大的现实问题。美国黑人争取人权的斗争，如果没有世界良心对美国的批判，就不会有那样的发展的。只有进行这样的共同斗争，才会有日韩之间的历史性和解和新的时代的互助合作。

有必要谈谈韩国教会传教自由大会的事。这个大会是在卡特当选总统后，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搞的丑恶勾当被揭露后举行的。这个大会搞得盛况空前。但由于发现中央情报部安在会场的偷听装置，闹出了大骚动。但主持大会的人反被中央情报部抓去了。这个大会显示了教会的团结，这就使中央情报部惶惶不安了。但据说，这回被抓去的方面反而强硬地追究了他们：到底是谁在危害国家的保安呢？是基督教搞的事带来了危险呢，还是在基督教的集会上安置偷听装置、利用朴东宣之流搞出收买美国政客的丑事轰动世界的事危害国家保安呢？据说，中央情报部官员给问得张口结舌。新的中央情报部长上任了。他在当陆军保安司令的时候也为捏造政治犯拷问过与教会有关的人。人们都注视这个冷酷的人为了保卫当权者将搞出什么名堂来。

十二月八日，在汉城大学再次爆发的事件也是和在美国造成的对韩政治形势有关的。这个事件是在期末考试期间发生的。有一个学生到图书馆宣读了民主救国宣言。这时候很快聚集了约三百名学生，而且越聚越多。教授企图制止他们，但他们喊道："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我们非常愤慨。不要妨碍我们。"这样，把宣言宣读完了。

三十多名学生被中央情报部逮走了，但五个小时后，

只有两名被开除并监禁。据说，有几名学生躲藏起来了。有一青年对我谈了如下的令人惊讶的事。这可能已经传到日本去了。

“中央情报部人员逮走学生的时候， 没把事弄好竟把学生推上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广播车上去了。于是日本广播协会的特派员用相机一一拍下了这种光景。中央情报部人员就把相机抢过来摔在地上，摔得七零八碎。”

学生们高呼：“废除维新宪法”、 “要援救被开除的学生”、“要公开贿赂事件的真相”。还喊道：“解散学生护国团”、“撤消面谈指导室”。 所谓面谈指导室指的是：挂着指导中心的美名的中央情报部大学分室。常驻这里的中央情报部人员向大学学生处长通告要惩办哪个学生，那个处长就把它当做紧急事态，立即撵掉那个学生，然后再向大学校长和文教部报告这个事实。在这方面，负责指导的教授和职员，掌握学生的黑名单，在中央情报部有事要找学生时，就把学生找来交给中央情报部。学生高喊的就是要撤消这个中央情报部分室。 当时学生们所唱的 《正义之歌》 的歌词是这样的：

正义和勇气是青年的生命，
我们的旗帜在高空飘扬，
让我们高呼青年的卫国精气，
引导和保卫民族的勇士，
三千万民族跟随他前进。

啊，为了自由，
流下鲜血的这个土地，
胜利的黎明即将来临。

不知是谁创作的这支《正义之歌》，现在背地里在青年当中流传着。那天也不知是谁起了头，大家都和着他唱，歌子变成了悲壮的旋律。人们不知什么时候都把这支歌记在心里了。这可能为的是要跟随坐牢的先辈。他们的宣言也是《民主救国宣言》。就是说在这里发生了第三个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这份宣言的开头写道：

同学们！

每当祖国临危时奋然挺身而出的三·一运动和四月革命的脉搏还在微微跳动的同学们！

在反帝反独裁的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扬光大的同学们！我们又一次接到了历史的呼唤。

现在天空黑暗，大地冻结了，但没有一个人出面说真实话，都在卑怯地保持沉默。难道不该果断地控诉这种现实吗！

宣言控诉黑暗的现实说："无数主持正义的人们被关进牢里了。"接着，宣言疾呼：

生命有限的人，怎么要治理永恒的历史？

智慧有限的人，怎么要蹂躏活力无限的自由？

能力有限的人，怎么要独揽变化无穷的保安？人格区区的领导者怎么要永远统治永恒的国民的政府？

岂止这些，现政权搞出对美国高级官员的行贿事件，挫伤了韩民族的自尊心。也就是说，把数千万美元塞到福特、基辛格和许多美国国会议员的腰包里，哀求他们支持现政府。

宣言还回顾朴政权的过去， 说“现政权的非道德作为并不是昨日和今天的事”。它背弃向民众许下的诺言，“用坦克和军靴炮制出维新宪法”。这个维新宪法应遭到“彻底、全面的否认”。这份语调悲壮的宣言结尾写道：

那打破暴风前夜的寂静，将在民族历史上开辟新的一页的恢复民主运动的火焰即将从冠岳山山麓熊熊燃烧起来。

我们高举正义、自由和真理的火炬，决心如下。

他们还继续疾呼了：废除维新宪法； 保障学校自由；公开在美国干出的丑恶勾当。汉城大学校园位于冠岳山山麓。我读到赞扬这种近乎宗教的崇高精神的文章，不禁流下了眼泪。难道这一勇气和这一精神茁壮地成长起来、他们用这一精神对祖国历史做出贡献的那天是不会到来的吗？我对祖国的未来满怀着信心，但总觉得很惭愧。

无可逾越的界限

的确， 人是有限的存在。 朴政权同样也是有限的存在。朴正熙在内外已经不能保持韩国的体面了。“问题在

于它怎样垮台”这种呼声已开始支配韩国人的心理。 朴政权如果是象一九六〇年以前的李承晚政权那样的政权，可能早已垮台了。 但是朴政权是目睹了李承晚政权的 垮 台的，所以它对此保持最大的警惕。对美国，他们掩饰内心的焦虑，虚张声势。他们乐观地认为，只要稍稍缓和人权镇压，就能重新获得美国的支持。还认为，如果采取强硬的态度，美国就会劝阻他们不要那样做。也许会和以前一样死心不管，任他去。

曾有一时，大声叫嚷“输出量又增长了”、“景气好转了”，但那不过是空洞的喧闹的事实已大白于世了。 纤维类的输出大大减少了。缝制品的包工业受了很大的打击，报纸也报道， 缩短开工时间、停业、 倒闭的现象陆续出现。有一个尼龙厂因为电力供不应求，决定从下午两点开工。他们考虑到可以用计时工资雇佣女工，所以经营上的利润不会有变化。但是，女工们掀起罢工，闹成了骚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朴政权体制已经到了头。

为了使市民恐惧不安，不时地说什么飞机侵人了以青瓦台为中心的航空禁区，便发射高射炮。但他们几乎不发表什么样的飞机怎样侵入到那里的。市民对这种频繁发生的谜一般的事件的耐性也似乎达到了顶点。十月中旬发生发射事件当时，死了很多人，受伤的人更多。这种不幸的消息层出不穷。这给更多的人留下它是杀人政权的印象。据说，他们发射了两千发炮弹，单是这一项不就浪费了一千五百万圆吗。而且失掉了比它更宝贵的许多人命。对这个问题，好象在国会上也引起了相当的议论。报纸上只登出

了国防部长官的答辩："反省十月十四日发射高射炮事件，为减少市民的灾祸，已讨论多种方案，并已采取了部分措施。"

他们指使电台把这种杀人行为说成是训练，迫使报纸一概保持沉默，但看来为施行恐怖政治而杀人的这一统治方法也已经到了限头。虽然还不曾有人对损害人命一事提出抗议，但这种手法已不是那么容易施展的了。

统治阶层内部的钩心斗角似乎也非常激烈。有一个曾参与政权的退伍将军受收贿嫌疑被逮捕了。但他在法庭上揭露，他在狱中所受的拷问完全是因为别的问题。他受了十八天的拷问，问他谁当下次的总统，要他说出近友的名字。他无法忍受拷问，把朋友的名字统统道出来了。他们之中有现国会议员、前内阁成员。传说，这样做是他们想知道他和那些继朴正熙之后会成为由美国支持的掌权者阶层的人们的关系。

就是这样，他们为了不让那些他们推测可能成为下一个掌权者的人们培植势力，甚至折磨着和他们有关系的财阀。最近，报纸大肆报道说：高丽远洋渔业公司经理遭到逮捕，被扣上了各种罪名。他是曾以民间人参加朴正熙发动的军事政变后成了财阀的。各报纸还在连载他的舞弊事件的内容。当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的时期，他曾经营一所小小的印刷厂，筹措资金，为军事政变印宣传品，后来成了有权势的人， 但如今竟落到这步田地了。 军事政变以后，由于政府的压力，差不多所有的印刷品都集中到这个公司了。应该说掌权阶层的这种内部情况，是一种临终症

候。告诉我汉城大学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青年作的如下的说明是值得注目的。

“自从卡特当选总统以来， 有中央情报部人员钉梢他们注目的学生。尽管如此，他们也没能事先察觉汉城大学的起义事件。他们都是些堕落分子。他们只是贪钱财，根本不会有什么忠诚。特别是，近来因为局势有所变化，他们也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 因为他们是道地的机会 主 义者，所以很会看风使舵。最近，监狱里的情况和待遇可能有些变化。 说不定汉城大学在明年的某个时候要开 始 行动。”

看来，掌权者在博得低级官吏的忠诚方面也已经到了限头了。朴正熙在听着《祖国赞歌》自我陶醉的时候，说不定民心会来个大转变。 据说， 与金大中有密切关系的十名少壮派在野党党员被捕了。国民恳切希望，当权派在灭亡时不要干出让市民流血的疯狂的勾当。有一位记者朋友把机密消息告诉了我。他说：

“六月间突然召开了全军指挥官会议， 这条消息在报纸上也登过。和往常一样，这个会议是强调‘有北方奇袭的可能——发誓在最前线予以粉碎’的， 可是这次闹得比往常更嚣张，尤其奇怪的是，这样的全军会议不是由朴正熙主持，而是由国防部长官主持的。据说，这是因为发生了重大的事件。在开会前一天，朴正熙动身去前线视察。和往常一样，出动了三架直升飞机。不料，飞机突然挨了地上的炮火，没想坏蛋运气好，打落的不是他坐的直升飞

机。因此，报纸没有报道视察前线的消息，只报道了有关指挥官会议的消息。他现在可能在有五百名军人和五千名警察保卫的青瓦台里面坐立不安哩。”

这话是不是真的，可没法核实。在那以后的事也还没听到任何传闻。总之，人们感觉到这个政权已经到头了，都在拿这种事当话题，这是事实。我想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除了振起抵抗的勇气，酝酿设想以外，还需要摸索积极度过在那以后的时代的组织和思想。

我想同积极勉励了韩国软弱的民主的呼声的日本朋友们一起送走这一冷酷的冬日——一九七六年，并致以一九七七年新年之禧和谢意。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讯）

“三·一法庭”的语录

充满象征的日子

一九七六年在气温降到零下十五度的二十年来罕见的严寒里过去，一九七七年丁巳年带着许多不安和未知数来到了。为了了解韩国情况，今年也要努力译出许多隐藏着的密码。

去年年底，在延世大学的操场上散发了名为《国民是政权的侍女吗?》的“怪文件”。该文件收录了《我们作为大韩民国国民有权了解大韩民国》的序言和译自杂志《新闻周报》的有关朴东宣事件的消息。在末尾还有五项“延世人的决议”。决议指出：

一、朴政权要负起玷污民族名誉的这次事件的责任立即下台；

二、要停止蹂躏国民的基本权利的暴压政治，释放被监禁的教授和教员；

三、要解散学生护国团，停止对学校的监察；

四、要废除维新宪法，解除紧急措施；

五、全体延世人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实现这些要求为止。

这是共有两张的油印的普通文件，并不是令人大为震惊的文件。可是，不论是当局还是国民，并不把它看做是简单的问题。真是很奇妙的事。这不是预告春季斗争的萌动的吗？学生们准是在计划着什么事情。今后，这类奇妙的文件或传单可能会更多地出现。直到现在，延世大学里没有一个学生为这种事件而被捕。

有一个大学生对我说：

“可以说是学生工作吧， 他们甚至搞出了什么宗教调查。他们要我们根据这个调查向他们报告所属教会里的学生们的动态。他们说搞了这个差事，就发助学金，还派到外国去留学。今后由中央情报部派的留学生可能会增加。他们威胁说，如果不听从他们，今后没有好处，找工作也会遇到困难。世道越不安，学校就越变成中央情报部的巢穴哩。”

目前，前中央情报部长下落不明之说还没有消失，可是中央情报部忙于大大扩充机构。 部里也有了全面的变动：部长下面设第一副部长、第二副部长和几个副部长帮办等职，组织得简直象一个内阁或青瓦台一样。据说，这次新任的中央情报部长是朴正熙的同乡，又是他的最后一个亲信。他虽然不怎么聪明，但朴正熙非常信任他，把自己的命运寄托给他和中央情报部。这样，乌云越笼罩我国的周围，韩国就越变成中央情报部的天下。

据说，他们打算解决韩美关系后，大大整编内阁、青瓦台和外交阵容。 和一般的法西斯主义者的精神状态一样，朴政权在感到极端的不安的同时，还抱有一种安妥之

感。这是因为他们知道主张人道主义和正义的个人或国家当中也有腐败的自私自利的人。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搞出的丑事正是利用这一点的。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也会屈服于金钱和女色的，所以在利用他时，只要使这件事不被暴露，他们的伪善的假面具不被摘掉就行。他们在国内用这种方法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在国内，同基督教发生冲突，对美国则怎样呢？

如果对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实行大赦，就能为美国保全体面。同时，如果获释的民主人士引起骚动的话，只要由中央情报部造成国内混乱，加剧紧张局势，以致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大为吃惊，然后再一次肆行镇压就可以。他们就是这样有着基于这种阴谋的安妥之感。

昨天的报纸上刊载了以《准备建立韩美日安保协议体》为题的一条消息。对此，朋友们进行讨论，解释了它的含义，结果没有什么意见分岐。都认为那意味着甚至国防问题也可以依靠日本。国民对日本干预国防问题的反抗，比起反对日本干预经济问题来，是无可比拟地强烈的。它还向美国暗示，这种问题只要交给朴政权，就能轻而易举地加以处理。有一个专家叹息地说：

“他们对于日本可以切实干预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问题，试探美国的意图。在缔结韩日条约的时候，朴政权曾受到了美国的支援。美国的看法是：压制韩国国民，实现所谓韩日关系的正常化是只有依靠朴政权才可能的。这就是说，只有朴政权才能迫使韩国国民承认今后日本代替美国担当韩国的国防的事。在这里，朴政权再次表现了要出

卖国家的利益和独立来苟延残喘的企图。他们看穿了卡特政权口头禅似地叫嚷的所谓人权这个话里藏着的美国的黑心肠。如果美国硬要撤走美军，那么到那时，他们将一心求美国保证延长他们政权的命，作为他们答应撤走美军的代价。他们正在重蹈李朝末期的卖国政权的复辙。”

这位专家说， 韩美关系只有通过日本才能实现。 因此，朴政权对日本的新政权福田政权寄予期望。因为是这样，可以说，韩国的重要外交权也已经被夺去了。去年年底，汉城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发表说“在输入农协肥料时有了巨额的舞弊”行为。就是说， 太平联营股份公司向海外汇去了七百八十万美元。这个事件与日本的住友商社有关。据说，大韩航空会社的赵重勋社长也与这个事件有关系，所以他被不拘留起诉了。下面不妨听一听一位记者对这个事件的意见：

“报纸大叫大嚷，说这是韩国版的洛克希德事件。 据发表，在这个事件中，农水产部科长有受贿三百美元的嫌疑。这倒是挺有意思的。赵重勋是跟日本的小佐野相勾结的。这一边可能一面观察日本怎样处理小佐野，一面装出追究赵重勋的样子吧。日本方面可能依靠所谓韩国政府的‘有良心的’自行净化的能力，托它调查事件的经过。这岂不等于叫犯人辩白自己的清白吗！这样，日本和韩国都企图继续做现在这样的蜜月旅行。我们又有热闹看了。”

去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报纸写道，韩美之间就朴东宣贿赂事件、金相根亡命事件、美国机关对青瓦台的偷听事

件已进入了收拾局面的阶段。所有的报纸都刊登了同样的文章和同样的解释。这是向国民公开迄今没有揭晓的消息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已经有把握能给国民以问题已定局的印象。报纸在解释中说，这只不过是朴东宣个人发挥爱国精神，只送了四万美元左右的钱的，所以是不足为奇的，是美国的报道机关恶意夸大事实的。报纸还解释说，在这方面，朴政权一向是对的，因为美国是议论纷纷的国家，所以也有说怪话的人。当然国民是不相信那套解释的。但看来，当局企图拿它来敷衍塞责，说他们向国民公开了真相，解决了一切问题。对此，有一个朋友说：

“据说， 美国驻汉城大使向华盛顿提出语气坚决的报告，说如果朴正熙下台，就会造成大混乱。而且，他作为现地大使很怕朴政权掀起反美运动。所以，美国大使宣称这次政府公布事实，是得到他的谅解的。以此为代价，使朴政权提出保证决不掀起反美运动。政府在指示报纸报道这一问题时也提醒说，不要激起反美情绪。韩国的言论界可能将永远同朴政权一鼻孔出气，生死与共，直到朴政权进入坟墓的那天。另一方面，中央情报部有意散布这样的论调：美国中央情报局在韩国挥金如土的情况下，就那么点四万几千美元还成什么问题。同时还召集大学校长拉起高调说：美国也是不可靠的。他们为了制造撤出美军的借口，将为所欲为。现在正需要我们切实进行丢掉事大主义精神、尊重自主独立的教育。他们操纵群众的手法有多高明！”

今天我听到了大邱启明大学学生们在去年年底用油印

机印发了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消息。由于这件事，“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十二名成员被捕了。 我还接到了一条可靠的消息。 有人给所谓在野党新民党寄去了一封 匿 名信。信里写有“十名国贼”的名单，名单里有新民党的领导者们的名字。其中第一名是新民党领导人李哲承，他是主张“祖国面临危机的时刻，必须搞超党派政治”的人。前新民党领导人金泳三的名字也列在第七名的位置上。看来，发信人可能是学生。金泳三因此而苦恼之余，动身访问美国去了。也许是这个缘故，新民党机关报《民主战线》刊登了如下的诗。我从中多少感触到新民党发生了动摇。

枯叶在凋落，
人的洪流在泛滥，
城市犹如冻结的活火山。
…………
喊声、鼓声震撼街道，
银色光芒波涛般涌来，
但沁入心肺的寂寞感
无从拭掉。

这一切象征着多么多的东西啊。今天要告诉海外朋友的消息可太多了。可是，把它们都推到后日，今天只传达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第二次公审的消息。我认为我有义务向海外朋友尽可能更多地传达那些只有少数的旁听者听到的勇敢的发言内容。但很遗憾，因为笔力差，不能很

好地传达它的内容，只能把它简单地综合起来传达。

律师的辩论

律师的辩论在十二月十七日和十八日两天进行，“被告”的最后申述是十二月二十日一直进行到夜里十点多钟，一共用了十二个小时。因为篇幅有限，不加我的评语了。这是因为摘要的辩论和申述对一切做了充分的说明。我要在这里只附带地说一句，那就是恳切希望这个内容以朝文、日文和英文广泛地传开。可以说那个法庭已变成了民主教室、神学教室、民族史教室了。但它又是一个没有被韩国国民知晓的、被禁止出入的实在太可悲的空间。据说，律师们从做辩论的前几天起几乎不能入睡。他们带着夫人到法庭，让她们作旁听者。这是因为他们怕由于做这种辩论而被逮捕。

首席律师朴世径首先回顾了一九一九年在这个法庭上进行的对三·一独立运动事件的审判。接着他指出，当时，日本人律师花井卓藏在辩论时说，独立宣言是“出自人类的天赋的本能的”。朴世径律师说：“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是人的本能。”并慨叹地说，他对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日本法庭上的那点自由都感到怀恋。

我不能在这里重复朴世径律师的长篇辩论，也不能援引他那具体的法律学理论。他指出：被告们虽经受了十个

月的狱中生活，但都“容光焕发，表情平和”。他说，审判耶稣的彼拉多法庭是受到众人呐喊的外部压力而下了错误的判决的法庭。他说这话是为了强调这个法庭也是置于外部压力之下的。下面介绍两天的勇敢的辩论中给人留下印象较深的一些话：

在紧急措施里规定处罚条例，是违反宪法的。动用紧急措施后， 与此有关的处罚条例应该经过正当的立法过程。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是与国家的命运有关的出自忧国精神的言论，所以它是超越法治范围的。我们有必要回想一下一九七二年发表七·四南北联合声明当时的情况。当时，南北的政治家来往南方和北方。这是与国家保安法相抵触的。可是，国民对它并没有提出什么问题，相反都表示了同意。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也和它一样，并不是负起刑事责任的。我要附带地说一句：尽管美军撤走的问题已提到议程上来，韩国的人权问题和旅美韩国人的丑闻在美国国会上闹成问题，但政府却仍然保持沉默。这不是掌权者对国民采取的正确的态度。

司法干预政治是有界限的。政治是带有多样性的。司法对政治，应该适可而止。这是为了使司法保持自己的纯洁性，发现司法的精髓——真实。在这次的审判中，争论的焦点是思想问题。对于十八名领导人豁出自己的一生，对国家的命运担忧和苦闷之余作出的结论，在这样不自由的气氛中进行审判是不应该的。本案并不是属于在这样的法庭进行审判的问题。

必须警惕日本的经济侵略， 第一次产业不振兴， 不

要满足于借款经济等这种忠告， 怎能是危害国家安全的呢。不应该遭受经济侵略，以致本国意志的决定也由外国来摆布这种警告，是应当的。目前，国民经济总产值的百分之七十二是依赖于贸易的。对此感到不安是当然的事。加上，为了支付借款的本利，不得不反复借款。为此，十二月十四日，韩国商业银行要在新加坡借两千五百万美元的外债。这笔外债是打折扣百分之零点二五、年息百分之九点五七的高利外债。它有韩国政府的保证和日本与美国的两个公司的联保。但在那里还是受到了冷待。这是因为韩国在国际上丧失了信用。今后在第四次五年计划期间，该偿还的外债总额竟达五十四亿三千六百万美元，它的利息达三十九亿六千四百万美元，总共九十四亿美元。这不仅是巨额的款项，而且比第三次五年计划期间大大增加了，这使我们不禁大为吃惊。它在第三次五年计划期间是三十三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为扭转危机，国民必须付出全部力量。为此，政府的下台是不可避免的。政府是为国家和国民而存在的，而它的存在是有限期的。国民可以要求政府下台。

对日本的经济依赖日趋严重。经济上的勾结和控制扩大到政治、军事上的勾结和控制了。日本在经济合作的幌子下，有意识地加强自己的支配。还要出胜过犹太人的商业本领。 同日本商社合营没有赚头， 这已是企业的常识了。向国外发展的日本企业尽是些公害企业、织品之类衰退的工业和为陈旧而不堪使用的设备寻找销路的。日本的贷款是高利息的商业贷款，是有附带条件的隶属性贷款。

本利的偿还， 必须由政府做保证。 还必须支付对进口设备的技术服务专利费。他们在给人家使用设备和材料后，要求保证他们获利，甚至企图掌握经营权和出售权。这是经济动物的无止境的黄金追求欲的表现。我们被他们紧掐着喉咙。加上，他们还策划攫取不当的暴利。韩国铝金属公司和地下铁道的事例就是如此。花日币三千二百万圆购买了价值日币一千九百万圆的地下铁道车辆。

目前，他们不流一滴血地在韩国这个叫做外国资本投资的天国登陆，并同国内财阀勾结起来了。国内所有的中小企业都遭到了严重的侵犯。在日本人企业中，资金一百万美元以上的占百分之十以下，十万美元以下的占百分之五十以上。这些企业甚至生产草席、木屐、文具以至玩具，所以，迫使我国微不足道的中小企业遭到了破产。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业滚落到没有日本的资本就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了。

这是借助于我们祖国的所谓近代化这一口号进行的地地道道的经济侵略。三•一民主救国宣言，很明确地指出了这一事实。要求改变经济立国的方向的这一呐喊，正是全体国民的呼声。日本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还活着。我们这个国家的财阀和执政者正在和它进行合作。所以，日本支持我们这个国家凋敝不堪的社会体制。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冷酷的姿态。如同美国所说的，日本大肆宣传他们向海外提供了十亿美元的援助，但这是他们为打下做买卖的基础的。那不是援助，而是剥削。它的大部分是附带苛刻条件的商业贷款，所以，它只不过是为输出商品而提供的

补助金。

人们说，看来，日本正在梦想，要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实现过去军国主义的旧梦——大东亚共荣圈。如果这个法庭把批判这种可悲的现实的事实判为有罪，那末暗中欣喜的自然是日本人了。如果不改变现状，明天就要悔之晚已，这句话怎能成为对这个韩国的犯罪行为呢？当权者到底是为谁效劳的呢？

农村也一样，百分之七十的耕地已经酸性化了。耕地好象为肥料厂而存在。政府声称今年获得了有史以来的最大丰收。可是，农村里没有钱。虽然说拨出一千八百亿圆收购秋粮，但是农民要偿还的钱比它多二百亿圆。虽然在大大宣扬获得了大丰收，情况却这样悲惨。这是把农村当做牺牲品的经济结构招致的后果。现在，农村里都在宰猪吃。据说，原是奖励养猪的，但因对日本的销路被堵塞，招致了这样的结果。 这样， 农村摊到的只有养猪借款。这就是朴政权的农村政策。

再举一个农村的实例吧。几个月前，许多渔民在东海遭难，丧了命。他们连一个救命带也没有，尸体也没能捞出来。另一方面，最近引起公众议论的高丽远洋渔业会社社长投下五百万圆资金，十年来攒了四十亿圆大财。他所以能够发横财，是因为一九六一年，当朴正熙发动政变的时候，给朴正熙印了所谓革命公约。这可算是报了恩了。韩日条约缔结后，他独占了由日本提供的渔业合作资金和由政府拨出的水产业支援资金。究竟是谁在危害这个国家的安定呢。我不是作为担当这个事件的律师，而是作为一

个缴税者不能不感到愤慨。

政府针对三·一宣言这一民族良心的呼声，乱弹被害狂式的独白。详细的内容将用书面提出。千言万语也道不尽他们十八人的爱国衷肠。我们只能低首表示歉意，因为我们对这个历史性事件所做的辩论是进行得很不充分的。希望你们多少体谅一下国民对八月二十九日的第一审判决放声痛哭的心情。 我们希望司法部能公正地处理这 个 事件。国民期望你们选择的不是方便的，而是正确的；不是宽大的，而是公正的。

三·一运动曾是用和平的手段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是继承这个精神并贯穿着民主信念的宣言。这是基于对民族的正确的评价的，即认为我国国民是能够过民主生活的。目前，外国资本企业里的劳动三权从法律上也被剥夺了。发生工潮时，劳动厅总是站在企业主方面说话。一九七三年，劳动厅曾委托汉城大学行政研究院对马山自由工业地区进行了调查。它是花费三百万圆进行的调查，但调查报告还没有公开。这个地区的百分之九十是劳动集约化了的日本系统的企业，但它的劳动条件是最恶劣的。甚至劳动厅发表的一九七三年三月的统计也指出：国内企业的工资水平是两万三千二百六十七圆，但马山自由工业地区的日本企业却是两万二千九百一十二圆。享有许多特惠的外国资本企业的情况就是如此。但政府不作任何努力去改善它。

原来，这种事实是不准许谈的。查明真相也是不允许

的。不能不在这里提起姜信玉律师在一九七四年七月为民青学联事件辩护时被捕入狱，被剥夺律师资格的事件。姜信玉律师是在援引十九世纪俄国历史学者吉瓦达叶夫如下的话时被迫停止辩护并被捕了的。

“我国历来是落后的，而且进行了野蛮的统治，所以从中找不到传统，也找不到教训。而且也没有一位领导者承认这一事实，只有彼得大帝才承认了它，并以此为基础，为发展历史而作出了努力。”

一八三七年，吉瓦达叶夫因此而触怒了当时的尼古拉皇帝，被扣上疯子的丑名软禁起来了。于是，吉瓦达叶夫发表了《狂人之辩》。他在序言中写道：“我的兄弟们！我是在冷酷的现实中生活过来的。但是，我未曾抱着冷酷的心生活下来。”

“我热爱祖国的精神并不逊于任何人。但是，我没有学会闭着眼、垂着头、 闭着嘴热爱祖国的方法。 我一向认为，只有能够亲眼看清本国的人，才能成为对本国有所作为的存在。盲目地热爱祖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现在任何人都有义务对自己的祖国谈真实。我是按照彼得大帝教给我的方式热爱祖国的。总之，我坦率地说：许多憎恨一切、只陶醉于自己的幻想的人正在为一种懒惰的爱国心所污染，而我并不具有那种爱国心。”

记得这大约是一九七三年，美国上院议员普布莱特代表鸽子派发言时从时代杂志上援引的话。姜信玉律师只开口说“尼古拉大帝……”，并没能说出后语。不幸得很，姜信玉律师也好，站在这个法庭上的十八名领导人也好，都

是些"没有学会闭着眼、垂着头、闭着嘴热爱祖国的方法"的人。在我国，难道看到劳动者实际情况，并对此说句公道话，就要犯大逆不道之罪吗？

有人说司法部变成了政府的侍女，就被说成是歪曲事实，遭检举了。如果在外部的压力下下了判决，那就不能说是审判官本人进行的审判。不妨回想一下一九七一年发生的司法部门的波动。检察官借口审判官受了律师的贿赂，申请了拘票，但两次都被驳回了。由此可见审判官似乎应该成为听从检察官的人。曾被北方的人拯救的渔夫们回来后谈了他们在北方的见闻，为此当局依照反共法逮捕了他们。在茶馆里拨收音机标度盘时响了一声北方的播音，结果在茶馆里供职的人被捕了。在竞选时，有些在野党人说朴政权是营私舞弊的温床，是策划大总统制的、扼杀民主的犯罪集团，为此当局依照反共法逮捕了他们。可是进行审判时倒宣告他们无罪。这件事大大激怒了政府和检察方面。

从此以后，根据维新宪法，审判官的任命权属于总统了。审判研究院的成员和司法研究院的教员也由总统任命。如果审判官不服从人事调动，提出辞呈，那么他就不能在那个地区开业做律师。根据维新宪法重新任命审判官时规定，被漏掉的人，就算自动地退出了法官职位。那时被漏掉的有五十名，那些违背政府的意志、违反宪法下了判决的九名大法官全都被漏掉了。对与学生示威有关的人判无罪而触怒了掌权者的审判官也都被漏掉了。看来，政

府认为这是司法权的独立，但国民决不这样看。

言论被扼杀， 这句话完全符合事实， 决没有歪曲事实。干涉新闻报道、中央情报部部员常驻报社、逮走和放逐记者，已是家常便饭。一九七四年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时候，甚至政府直属的汉城报社的记者们也指出这种事态说：“不能完成自己所负的任务的记者，已不是什么记者；违背记者的良心和义务而出的报纸，已不是什么报纸。”

学校的自由遭到抹杀，是连三岁的孩子也都知道的事实。信仰的自由和良心的自由，是在宪法上也没有保留条款的绝对的自由。但它现在遭到侵犯。为什么检察方面不想去检验这一事态呢。检察方面对解放神学无知的程度简直是令人寒心的。基督教过去向往未来的世界，但现在改变方向，要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建立神的国家。教会应该对世上的不良现象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特别是，这个世界上的罪恶越来越出于国家政策了。他们认真负责的行动对国家的发展本是有益的，可是反把它看做是危害社会秩序的罪行，这是为什么呢？当局的这种非难，在国内外都会成为笑柄。

检察方面主张，教会和宗教徒在数量上的增加，说明有宗教自由，但它不能证明掌权者没有侵犯信仰自由。只要迎合掌权者，就不受政府的干涉。即使教会这样增加，同信仰的自由是毫无关系的。如果那些不迎合掌权者，要在这个世上建立神的国家的教会能够繁荣的话，那么它是

依靠那些要战胜残酷的现实的强烈的信仰赢得的。企图用数量的增加来证明信仰的自由的这种诡辩，在这个以高级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法庭上未免太不入调了。虽然检察方面主张什么宗教的自由完全得到保障，但这一点在第一审时也没有得到丝毫的证明。那些只注明教徒人数的政府的资料，是不能证明公诉的事实的。

在宣言中提到的言论越来越受到压制的说法，对言论的现状来说，提得太委婉无力了。希望对国民的愿望给予正确的回答，他们要求对按照良心和神的教理行动的这些人进行公正的审判。

从第一审开始一直注视这个审判的我，不禁感到寂闷和空虚。因为检察方面和律师方面根本不考虑这些人的高尚的人格、政治见识和忧国心，只拿个别言词争论不休。这简直是再幼稚不过的争论。他们甲论乙驳地争执不休。说什么言论被压制，是事实还是不符事实？一方说，工人们正遭受剥削，另一方则说,不,给予那种程度的待遇就不算剥削；一方说，议会政治有名无实，另一方则说，不，议会上在积极讨论国家政治。甚至在金芝河没出庭的情况下，也拿他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方说，他是共产主义者，另一方则说，不是，等等。

法庭企图对说教进行审判。因为法庭企图审判良心和思想、内心的自由，所以搞成了这个样子。这里有个重要的问题。 那不是该受审判的东西。 它不应该事先受到压制，而只有带着某种表现形式给人造成明显的危险的时候，才该当成问题。最近，各家报纸的内容一模一样。当

送报的劝我订阅报纸的时候，我也借口各报内容相同，谢绝了。可是，如果因此而被判处三年或五年徒刑的话，国民就得在嘴上贴封条了。这就等于事前压制。实在是不幸得很。

检察方面说，言论、良心、信仰的自由已有保障。但他们根本不想证明这一点。他们不想对自己的主张负责，并负责地对此提出证明。他们只是说，这种自由已有保障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原来，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句话，是指历史上有名的事实或地理上著名的地名之类说的，可见检察方面是滥用着众所周知这个词的。同时当局还提出了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中提出批评的长官们的所谓答复。他们究竟把审判看成是什么样的东西呢？

在讨论国事的时候，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国民个人之间，有不同的意见，是理所当然的事。李朝时期的伟大儒学者李栗谷先生曾说，东西两派的主张可能都对国家有益处。检察方面滥用着起诉权。未来的历史将作出真正的审判。当国家临危的时候，不倾听国民的呼声的掌权者终究是要灭亡的。南越虽然得到了美国的大量援助，但它还是灭亡了。这是阮文绍政权的独裁和营私舞弊招致的。当国家面临危险的时候，他们一味压迫国民，只顾搜刮大量黄金，作逃跑的准备。南越政权垮台之后，那些人在外国过着十分舒适的生活。

检察方面说，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发表，向国内外揭露了国论分裂的丑相。但是，我不这样看。它表明，这

个国家里俨然存在着能够实行民主的民主势力。这还表明，有可能把恶化了的国家舆论扭转过来。应该想一想阮文绍政权策划长期执政阴谋，专事政治报复的结果灭亡的事实。

看来，司法部已经变成了长期执政的工具。李栗谷先生曾经痛斥了把反对派撵出去的乙巳士祸（一五四五年）。他还申明，不管有多么渊博的知识，如果行事不当，就不能受人尊敬。可是现时代的风潮是不管国民怎么说，只要把住政权不放就行。李承晚曾为了掌权，用四舍五入的方法修改了宪法（一九五四年）。当时，大法院院长金炳鲁宣告这是违反宪法的。这个法官的传统跑到哪里去了呢？这个审判，将载入我国史册和世界民主发展史册里。

对金芝河的起诉内容是不符事实的，毫无根据的。申铉奉神父在自己的讲话中只说了如下的话："马丁·路德虽然把封建主义的基督教改造成为资产阶级的基督教，但他没能把它改造成为被压迫的穷人的基督教。耶稣也把自己看成是被压迫的人的。在向往这种原始的基督教方面，新教和旧教可能是一致的。然而，在韩国，只要把资产阶级这个词记在手册里就会被扣上赤色分子的帽子。"申神父再没有说别的话。据说，当局录音了他的讲话。那么当局为什么不把它拿出来作证呢？

在开展新旧教联合周活动的时候也只说了这样的话：对受苦人的爱，是对神的爱。为保障安全而抛弃民主，这等于为防盗贼而烧毁财产。国民团结，是只有在真正的人

的生活得到保障，并充满和睦精神的时候才能实现的。在压迫和不平等之下实现团结，这是不合乎逻辑的，而且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国民团结的真正的敌人是腐败的特权和为维持特权而进行的压迫和剥削。朗诺和阮文绍的逃跑说明，即使船只失事，船长的救命艇依然是安全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压迫者的命运和民众的命运是不能一致的。不应该再继续推行独裁。无论如何，不应该在韩国半岛上发生战争。败于和平，就意味着败于一切。他确实说了这类话，但是起诉内容是与此截然不同的。

说是对金芝河的问题是歪曲了事实的，那到底指什么说的呢？难道曾指责当局说拿金芝河谈论资产阶级做口实把他说成是共产主义者，就是歪曲了事实的吗？一切都是这样不明不白。当局在起诉金芝河的同时，还发行了一本黄皮小册子《金芝河违反反共法事件的真相》。岂有在审判之前搞出这种名堂的道理？ 我看了对金芝河的审判记录，那里没有关于他写良心宣言的理由和原委的记录。就搞到这种程度怎能对金芝河宣告有罪呢？

金芝河真的是共产主义者吗？不妨谈一谈他所关心的解放神学。使人恢复神的面貌， 这是基督教的本质。 为此，解放人，发展社会，这不是基督教的传教手段，而正是在传播福音。清除不义，为人创造更好的人的生活，使他们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怎能成为基督教的异端呢？这是基督教会的本性。

解放神学所提倡的解放，在实践方法上完全不同于共产主义。解放神学是使爱达到别的阶级的。金芝河的作品

《五贼》、　《蜚语》或将要公开的作品《张日谭》、　《木桩》等，在其收尾，不论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都得到神的拯救。这是金芝河的基督教思想的核心。检察方面主张解放神学是接近共产主义的。这是压制那些对人的痛苦不能保持沉默的基督教会的态度。这是出自只要关心受苦的人和穷人就是接近共产主义这一公式的。

最后，就歪曲事实的问题附带地说一句。假如有人说第一次公审的判决是由中央情报部下的，那么可以说这是歪曲事实的。因为这是不符合绝对的事实的。然而，对维新宪法的思考方式，因观点而可能有所不同。对十年徒刑的看法也因人而异，可能会有人说它不是重刑，对国民收入说高或低的问题也一样。对同一个客观内容，在评价方面有所不同，这是修辞学上的问题，不是法律所能干涉的领域。如果干涉它，那就等于掌权者甚至干涉国民使用形容词了。检察方面的国语水平并不令人佩服。

这样陆续进行了辩论。 倒数第二人金光一律师的辩论，引起了一场风波。他说,原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是被告们是一些既不能修身,又不能齐家的人。恶法不也是法律吗？检察官和律师面对面地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这个法庭不就是司法权独立的证据吗？然而因为这件事，世界都误会，说韩国没有人权。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希望从宽处理。他用这种论调进行了辩论。这时，在被告席上人们喊道：“停止辩论。”也许他原想拿似是而非的议论,极其讽刺地进行辩论。据说，他是这天自愿从釜山赶来突然发了

言的。在这里也散发出中央情报部的味道，给人留下了令人厌恶的苦味。

（一九七七年一月七日讯）

不稳定的政治

疯　　狗

受虐待的人们往往从不大的事件中也会发现反映这个国家面貌的重大的问题。

今年一月八日在汉城西大门区发生了一桩悲惨的事件。一个四岁的男孩子被牛犊一般大的叫做土佐犬（用来斗狗的日本狗的一种）的狼狗咬死了。这条狗是日本高知地方的狼狗和西洋猛狗的杂种，据说韩国有一万多条这种狗。这条狼狗疯狂肆虐，乱咬孩子足有三十分钟，可是在场的三百人却吓得不敢动手，只站在那里呆望。孩子悲切地叫着“妈妈，妈妈”，活活被咬死了。在野党机关报《民主战线》以《这个冷酷的世道》为题大书特书地报道了这条消息。这条狗以前也咬过不少过路的人，所以，那里的居民曾向警察当局请求把它杀掉，但他们置之不理。

这如实地反映了今天韩国的面貌。含有欧洲狼狗的血的土佐犬，似乎是支配韩国的日本等新殖民主义者的象征。疯狗跋扈起来，而人们只管袖手观望，所以死伤者愈益增多。因为耐不住痛苦，间或发表一张声明，那末不是被无视，就是被捕入狱。人们认为这个时代确实是个疯狗

横行霸道的世道。 看来，《民主战线》用十一个栏的篇幅报道这个惨事，正是民众这种心理的一种反映。

其实朴政权所干出的勾当，很象疯狗的所作所为。所以，民众总是恐惧不安。因为有这种恐惧心理，人们从去年春天开始参加每月举行的居民班例会。 据说， 不去参加，当局就向青瓦台报告。但近来知道了不去参加也不会受严厉处分，就没有一个人去参加了。结果，这个例会也就变得有名无实的了。针对这种情况，当局这次要特别加强居民班例会，说是搞什么拴狗运动。难道一般市民尤其是贫穷的人们会养那种大狗吗？朴政权的民众组织本来就是这样的货色。疯狗大发狂症，人们感到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也许这还能见效。可是疯狗的狂症也不一定老是发作的，只要狂症多少缓和下来，民众就重走自己的路，回到流言蜚语满天飞的世界。听说，准备在离汉城很远的地方建立中央青年训练所来加强基层组织。就是说，要建立一个类似希特勒青年团的东西。然而没有一个人相信用韩国的年轻人能够建立那种“温顺的组织”，认为这也只能浪费一大笔费用，带来虎头蛇尾的结果。

看来，因为不得人心，朴政权更是象疯狗一样丧心病狂起来。从今年一月十九日起，朴正熙开始了对各中央官厅的所谓年初巡视。据说，这次竟对前来出席的政府高级官员也进行了搜身。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想到这些人当中也可能有人谋杀他。对这种行径，连那些官员也感到愤懑。正象咬死孩子的那条狼狗当天下午被警察的卡宾枪打死一样，疯狗总是十分担心自己不知何时有可怕的下场。

听说，中央情报部有了扩充，撤销名曰第六局的民间人搜查部门，把它编入第五局。这也许是为了消除人们对迫害了批判政府的人的第六局的印象。但是，第五局是对共产主义者进行监察的部门，所以，今后反政府分子就将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受更残酷的刑罚。事实上，在这个国家，如果被认定为共产主义者，就得不到民众的任何同情。甚至连海外舆论的压力也几乎不起作用。至今也有被扣上所谓与人民革命党事件有关者的罪名，被判处直到无期徒刑的重刑受折磨的人。监禁这些人的牢房里没有灯。他们不能作操和会面，也不能和监狱的牧师或神父见面。不仅如此，黑暗牢房的广播喇叭几乎整天赞扬朴政权。这显然是成心逼他们发疯的。而对与他们有关的人道主义问题，却一点儿也不讲。这个国家的国民带有一种浓厚的倾向，总要对“反共的残忍性”表示同感。当然我们可以理解这是为了不被疯狗咬而只是袖手旁观的。

因此，朴政权尽管接连遭到失败，但仍然千方百计地捏造事实，给那些持有批判态度的人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对于金芝河也是如此。如果没有他的良心宣言和世界的声援，他早就象与人民革命党事件有关的八人那样身归黄泉了。被扣上共产主义者帽子的人，被判决以后也仍在监狱天天受拷刑。不妨举最近的三个例子。有一个青年因小肠串气受折磨，但不给他服药，置之不理。对另一个人则把方木夹在那个人的两腘之间施加拷刑，弄得那个方木断了三次，还踢他的腹部以致吐血，还逼他喝他自己吐出的血。有一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人被监禁在光州监狱，他

的手指、眼睛、脸都受了冻伤。但只许他涂点外用药，不许服药。还限他一天只喝两杯水。牢房里黑得不能看书。眼睛也因病几乎失明，但得不到治疗。牢房窄得连胳膊都不能伸。身体日趋衰弱。

当权者施加这种反共产主义的拷刑，但说的倒好听。据报纸报道，朴正熙在一月十二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我认为需要树立视人重于金钱的价值观。这可以说是精神文化的开发。要认识到，只是物质文明发达，而精神文化得不到发展的那种社会是非常脆弱的。"

他所说的尊重人这句话，应作何解释呢？以反共为名屠杀人的行径大概是不包括在这个慈善的关怀里面的吧。正因为这样，被监禁者家属协议会发表声明，诘问道："不释放作为良心犯被监禁的所有既决犯和未决犯，不停止一切非人的迫害行为"，怎能谈得上尊重人呢？

声明最后说：

"最近，政府既然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释放了被判无期徒刑的犯人——'日本人间谍'，那就没有理由不释放因违反紧急措施第四号和第五号而被监禁的本国的思想犯。我们再次强烈要求释放我们的丈夫、儿子和女儿。"

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人们连报纸也不能看。由于律师的抗议，最近允许他们一天做十分钟的体操。

尽管情况如此，多数国民在疯狗面前只是不安地袖手旁观。外部一有变化，他们就抱起很大的期望，但又立刻沉入更浓厚的失败主义情绪里。"卡特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国会把韩国中央情报部的舞弊事件看作严重问题"之

类的话一传开，律师在政治犯审判场的辩论，也就活跃起来。可是，不多久只传来掌权者的如同疯狗的吠声那样的骇人的叫嚷，他们就闭口不语。这样的时候，民众只是以不看三家电视台同时播送的政府宣传节目，来表示抗拒罢了。每天晚上八点到八点半，各电视台必须播送文化新闻部提供的政府宣传节目。有时因没准备好，三家电视台都播送同样的节目。每当这时，全国许多电视机都被关掉。有一个朋友嘲笑说："这就叫没有储备的电气公司占便宜了。"

惶恐不安而又抱不平的民众往往对一些小小的消息也夸大事实，甚至有时弄得不合乎逻辑。一月十四日，在国会里只占两个席位的民主统一党的最高委员梁一东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各家报纸对此只报道："敦促同第三世界加强外交。"但人们说那里面还有比它更重要的事情。据风闻，中央情报部觉察到有记者招待会，便没收有关印刷品，全面修改了其内容，可是在招待会上分发了藏起来的二百份印刷品。这份印刷品，对镇压言论的行径和国防费占国家预算百分之三十四点七的目前事态表示了忧虑，也揭露了预算的不合理性、舞弊问题、工会的状况等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主张是：政府对韩美之间不和问题的解释是不够充分的；美军的撤离问题是由于朴政权扼杀民主，肆行镇压而提出来的；应当废除紧急措施，恢复民主和人权；尤其是应当解散国会，举行普选，等等。知识分子从这种抗拒中得到鼓舞而议论纷纷，这是事实。这份印刷品还严厉批判了新民党变成堕落了的在野党的丑相。令人悲痛得很，给我讲这些话的那个朋友这样表示了怀疑：

“在国会里占有相当多的席位的新民党完全变成了准执政党。对最大的敌手金大中则施加那样的集中镇压。而对无能为力的民主统一党容许发表那种程度的言论。这个党的人说了那种程度的话也不至于被捕。让在野党互相争吵。看来，这是中央情报部的高明策略。”

朴正熙的个人性格完全摆布整个朴政权。不合他的个人性格的人，是再不能留在他的身边的。据说，有个现在做长官的法律学者，过去反对日韩条约，对政府采取过批判的态度，但听到劝他做长官的话，他就感激涕零，向总统说的头一句话就是：“因为小人那时是不懂世面，糊涂……”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典型例子。朴正熙不喜欢对话，只是把对方划分为敌人还是自己人。他确信任何人都会在实力和现实面前屈服，这就是他的信念。这可能是因为他在年轻时当过日本尉级军官的缘故。这在解放后体验民主的过程中也没有改变，依然保持下来了。正因为有他，国民的日常生活受威胁，人权遭到蹂躏。不仅如此，韩国的国际影响非常不好，到了几乎无可挽回的地步。据说，在美国，美国人教师甚至拒不接收韩国学生送的圣诞节礼物。正因为有他，韩国在世界上陷于孤立，撤走美军的问题成了最深刻的问题。尽管如此，朴政权认为朴正熙正是保证国家安全的中心，企图坚持不下台。国民把这看作是疯狗的心理，是理所当然的。看来，日本认为这种政权才是有利于维护日本的权益的，而且希望曾维持“满洲帝国”的昭和的历史能够延续下去。

事 件 神 学

一月十九日早晨，在汉城地下铁道阶梯的阴暗的角落里发现了以“韩国民主斗争国民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表的地下文件。据说他们散发的足有一万份。这个文件，共分《谈话》、《民主斗争宣言》、《纲领》、《决议》、《口号》等五个部分。

这里只介绍《谈话》的全文：

“热爱自由与和平的我国国民和全世界人民！

“为了打倒人类和平的敌人、五千万朝鲜民族的叛徒、蹂躏三千万国民的人权的朴正熙一人暴政，我们建立了‘韩国民主斗争国民委员会（简称民斗）’。这个‘民斗’，是今天吸收各阶层国民参加的反独裁争民主运动的主流。她继承了在我们民族历史上光辉灿烂的反帝斗争的先锋——义兵斗争和三·一运动的精神，继承了四·一九革命和从那以后的民族革命斗争传统。

“我们认为盲目的、流于形式的斗争，是欺骗历史和国家的行动，因此，我们要为民主革命展开实际斗争。

“在国内，就是过去协助独裁的人，只要改邪归正，投到民斗的旗帜下，我们就宽大为怀，团结他们。

“在国际方面，我们认为维护自由与和平的斗争是没有国境的，因此，我们对为此而进行的任何一种共同斗争和任何形式的支援都表示欢迎。同时，我们还宣誓，我们实

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也为争取全世界人类的自由与和平而斗争。

“为维护自由与和平而斗争的国民，全世界人民！

“只有我们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地球上消灭独裁者，实现自由与和平、平等和博爱。

“全世界所有民主力量要为打倒独裁，奋勇前进！”

这个《谈话》，是以“议长韩民胜”的名义发表的。韩民胜，顾名思义，就是韩国民主必胜的意思。许多人为包含在这个名字里的含意，都表示了高兴。

《决议》的第一项指出，为“打倒朴正熙一人的暴政”，将贯彻“反独裁斗争单一路线”。这是用很工整的字体写成的、作了充分准备的声明。不难看出，韩民胜这个名字也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的，而且这个组织考虑国际关系问题也是很周到的。他们还没有忘记给这份声明附上这个委员会的英文名称：Korean Struggle Association for Democracy(K.S.A.D)。

有一位朋友对我谈到这个声明时说：

“治安当局立即没收了它，可是因为它逻辑严整，没有一星半点的瑕疵，所以我起初怀疑这是不是中央情报部干的勾当。要说是情报部搞的鬼，冲击可太大了。直到现在，那么有能耐的情报部还没有找到任何线索，也不去乱抓人，这确实使人疑惑不解。依我看，这必是接近我们这边的人们做的事。总之他们做得很巧妙，他们是既考虑国际关系问题，又有目的地进行活动的集体。”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对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进行了审判。这次的审判，判刑要比第一审轻一些。比如对金芝河，由十年徒刑减到七年徒刑了。这种做法，也许是朴政权要对美国表明让步的姿态，只要美国允许朴政权继续存在，不妨缓和人权问题。最近，朴正熙在行动时，总是先考虑美国的态度。据说，他最近当着国内新闻记者说，美国对他施加压力，要求他辞职，接着他表示强硬的态度说，决不能那样做。看来这是一种有目的的、恐吓人的发言。他想散布这种风闻，借此使他的强硬态度传到美国去。另一方面，韩国日报社的经营主张基荣最近去访问了前总统尹潽善。 他曾当过朴政权的经济计划院长官，是给朴正熙献计谋策的人之一。他去谈的是，要尹潽善担负一项任务，去美国，拿美军的撤离问题说服美国。当时，尹潽善回答说：

“我从三年前起就为这个问题一直警告了政府。现在，虽觉得时机尚早些， 但美军反正是要撤走的。 尤其是目前，由于朴政权蹂躏人权，这个问题引起了更广泛的舆论。象今天这样没有民主的情况下，我对美国没有话可说。”

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进行第二审以后，全体被监禁者家属发表声明，批判了不当的判决，并表示确信，上帝必将判他们无罪。 这个声明最后说：“我们对世界各国为在这个国度恢复人权和民主给予的深切关心和声援，表示谢意。”李海东牧师和安炳茂教授两人在这次审判中被判为缓期执行，出狱了。李海东牧师说：

“我听到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已变成世界性的、世界教会的事件，吃了一惊。今天，要谈世界基督教，就不能不谈韩国教会问题了。当在监狱里听到这种话的时候，我深受了感动。我作梦也没想到，我那个小小的一光教堂，在这里竟占据那么重要的地位。我在狱中，熬过了这次的严寒。就是在狱中，也能忍受一切了。可是，最使我难忍的是，狱外的人们、家属、朋友和教会在遭受痛苦。我出狱的时候，李文永博士对我说：‘请你转告我的妻子，如果两个人都倒下，那可就太糟糕了。就是为孩子着想，也希望她保重身体。’亲爱的人们所遭受的痛苦，比起我们自己遭受的痛苦来，更使我们难受。我隐忍先出狱的内疚，下了一个决心，各位无论要我做什么，我都要尽力而为。”

当时在场的人们说：“你叫人下了狱，还不忏悔自己的罪过啊！”引得大家哄堂大笑。据说，坐了牢，兔子也会变成老虎，这似乎是事实。在这场斗争中，决不可能有变节的事。接着，安炳茂教授说：

“过去，我不懂缓期执行是什么意思。回来的时候，有人在公共汽车里给我解释了它的意思。我听了之后流下了眼泪。因为我留下同志们受折磨，而我一个人出狱，难免感到痛苦和疏远之感。在监狱里，天主教人士、基督教人士和政治界人士已经结成了牢不可破的联系。我们在前往法庭的路上、在汽车里或者在吃午饭的时候，决定了对策，在法庭里也小声谈论起来。起初，当局企图制止我们这样做，可是终没有办得到。我们就利用这种机会，互通消息，主要地谈了关于信仰的事。金大中先生的笃信精神，

使我深受了感动。对于金芝河的信仰，本打算做最后的申述时谈，可是临场竟忘掉了这个最主要的一点。民青学联事件告一段落,他出狱后有过这样的事。他对我说,他在狱中多多少少认识到了基督教的本质，所以很想找我来谈谈他自己的想法。当时，我担心他的健康，说我要去找他。可是，还没有做到，他又被捕入狱了。我在狱中，老是替他担心。……我被撵出了监狱。我本是无能为力的软弱的人，可是周围朋友们的刚强精神，使我坚强起来了。我在一张纸上签名的事，竟给我和韩国以及韩国的教会惹起了这么大的事件。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事物看得合情合理。如同圣书上所说，上帝超越人们的智慧，甚至把一件区区小事都会变成一个事件。就我们的立场来说，应该把事件神学当成一个问题来看待。……对于坐牢的人们，不必过分担心。尹攀熊牧师患上了腹泻，徐南同牧师还好，每天两次用冷水擦身哩。由于一般教徒们信仰激昂，弄得牧师或神父有时感到难为情呢。金大中先生等人一有机会，就提议进行绝食斗争。于是，大家开玩笑说，要是按照这些一般教徒的话去做，牧师和神父都得饿死啦。那监狱的大门是不会长期关得那么严的。每天早晨，去洗脸时，无数的人向我们打招呼，都是些我们不认识的人。我们人狱还不到半个小时，这一消息就传到全体被监禁者的耳朵里了。于是人们都想尽办法把自己的面包之类的东西送给我们，虽然他们明知道，这种行动被发觉就会吃很大的苦头。我们感到，新的时代似乎已经来到这里了。盗窃犯也都表示了充满爱意的友好态度。这就是民心所向啊。

“我得悉我今天出狱， 心里感到说不出的内疚犹豫不决的时候，金大中先生鼓励我说：‘你出去进行斗争， 要为韩国的未来， 打下神学基础。’我说：‘你说的是新的神学吧。’他便回答说：‘是真正的神学。’我觉得我们十八个人犹如一体融洽无间，这种感觉，在我的生平是决不会变的。金大中先生曾经说过，如果基督教在韩国不能苏生，它就会灭亡。他还说，杜仁非曾认为基督教可能围绕着美国黑人问题复活，可是我觉得基督教应该首先在我们韩国复活。我们不该只一味效仿西欧的东西，而应该把我们在痛苦中创立的神学传播给全世界。我们要向人们传播不仅把韩国，而且把一切被分裂的世界融合成一体的那种思想和实践途径。他接着说，他至今认为科学家应实现政治化，可是到现在， 才认识到政治家应实现神学化， 政治应该以信仰为基础。金大中先生不仅理智出众，而且是笃信的人。我认为为这一点，也该感谢上帝，同时认为这是上帝当作一桩事件的问题之一。在坐牢的时候，我从心里念着大家做了祷告。”

那一天，到了深夜，人们才走出坐落在汉城市东北方的一光教堂， 担心犯夜十二点的宵禁， 急急忙忙地往家走。摸黑走路的人们的心里，充满着一种悲壮的决心。这使人们深感悲伤，同时又感到喜悦。这是个用语言无法表达的、很想抓住某个东西纵情祷告的那种情感。

（一九七七年一月十五日讯）

即 兴 政 治

据说，由于韩美之间的丑事闹成了问题，韩日之间的丑事也引起了世界公众的注目。曾闹出渥特盖特事件的美国，又将怎样处理马利亚盖特事件呢？曾对金大中事件施展那种伎俩的日本，将用何种手法处理这次的事件，那是可想而知的。因此，那些高声批判的人们好象从开头就有一种颓唐的感觉。金大中事件发生以后，朴政权一概否认了明摆着的事实。日本则对朴政权的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径采取了一唱一和的立场，所以日本对这次事件也是不会改变从前的那种立场的。他们不但不做丝毫的改正，反而会比以前更慎重地、彻底地掩盖真相，毁掉证据，更紧密地相互勾结起来。

今年二月五日，朴政权的中央情报部公开庇护的统一教所经营的人参公司、一和制药公司的六名要员，由于偷税而被捕，惹起了事件。二月十三日，一个执政党国会议员由于私吞与“住友”有联系的太平联营公司的代表送给他的五千万圆贿赂而被捕了。据说，这个事件是与农协输入肥料有关系的。大韩航空公司的赵重勋也因这个事件被起诉了。人们说，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中央情报部的政治意图。下面不妨听一听我的一位当记者的朋友说的话：

“正当韩美、韩日之间的丑事，引起国际公众的注目的时候，要在真相被揭露之前，装作搞出一些名堂的姿

态，是要紧的。而且也有必要说明，这些问题是与政府无关的个人之间发生的问题。可是我认为，问题不只限于这些方面。在美国，统一教事件已闹成了问题，说不定在日本也会有别的什么丑事闹成问题。到那个时候，即使进行搜查，也不该把朴政权或朴正熙的底子都给兜出来。看来汉城方面要把统一教的财产和人员扣下来做人质。对日本，可能威胁说，他们掌握着足以轰动日本政界的证据。尽管韩日之间狼狈为奸，但他们还是把国民的反日情绪当做武器或者挟持行贿的个人的手段加以利用。他们辜负人的善意，利用人的弱点，破坏一切价值和人们之间的一切诚实的关系。

“那些卑鄙无耻的法西斯党徒哪有做不到的事呢！”

朴政权在这一点上是干得很彻底的。他们把金大中、朴东宣等事件，都说成是“过度的忠诚酿成的个人错误”。至少，日本不得不采取承认它的立场。为了编出这类脚本，这回也企图拿中央情报部长做替罪羊。而中央情报部长为抵抗这种作为，向美国大使馆请求了政治避难。事到如此地步，为金大中事件编造的脚本就算真相大白，完全归于失败。因此，情报部长的上司金钟泌躲在他的老家忠清南道的农庄里，惶惶不可终日。据说，最近他又被拉出来，要到国外去旅行，为朴政权做宣传。

中央情报部长申稙秀是否得到美国大使馆或美第八军的保护，人身安全了呢，这还无从知道。有风闻说，他遭到美国方面的拒绝，被朴政权抓去关起来了。总之，他辞去中央情报部长之后，不再出现在掌权者中间了。据说，

因为做过对美工作而不得不辞职的中央情报部副部长，如今在陆军保安司令部占据了重要职位。

这是权势更大的位置。把这条消息告诉我的朋友解释说，这是朴正熙公开表示他的意图的：他要击退公众要求他下台的压力，干到底。朴正熙认为，那些没有不辞干坏事的那种忠诚的人是不可靠的。不然，这个权力集团是很难维持下去的。

这样说也许不大顺耳，朴政权只能看作是智能低劣的暴徒集团。虽然智能低劣，但动物固有的生存本能方面的反应却很敏感。唯有在施展阴谋诡计方面表现的智能倒不低，反而确实有人所不及之处。所以可以说，他们的所谓政治是从那低劣的智能挤出来的即兴政治。

不知是什么缘故，从今年起，当局不再剪掉或用墨涂黑从日本来的报纸了。当局可能认为，那些凡是要读那种文章的人，即使禁止他们读，也会想方设法探知关于朴政权的来自海外的丑闻的。当局可能在想，只要把他们和民众的关系割断就没有问题，也可能在想，因为国内各报在全力协助掌权者，所以没有问题。可是，当局要给外国以好的印象的努力，是不会持久的。那是因为这伙当权者不能耐心地对待那种文章。他们不过是要想在举行韩日议员联盟会议等进行韩日交涉的前夕，对日本方面的立场表表态度罢了。在这个无法无天的世道，这种做法，说不定明天就会根据一道即兴命令恢复原状。

国内各报的报道倒很有意思。不论是国外通讯，还是国内消息，有的来个“掐头去尾”，有的干脆全部删掉。他

们编报道时，力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虽然卡特总统重视人权问题，但由于国防部方面的压力，撤走美军之说将会被撤销。报纸的社论强调，“在韩、美、 日的安全体制中”，日本应该采取积极的态度。 在报道持有批判态度的人的言论时，去掉它的基本内容， 捏造和传播“歪曲事实的东西”，以便在国民中间留下坏的印象。 报纸报道说：“美国的反韩人士詹姆斯·希脑特神父于一月二十三日，在《纽约时报》上登出了对‘北方的宣传表示同感的反韩广告’。”

报纸写道，他主张撤走美军，停止对韩军事援助，又说朴正熙准备北侵，力图把美军甚至把全世界拖入战争火焰里，等等；他的话同“北方的宣传”如出一辙，确实是值得注目的，云云。

这显然是要说服国民相信朴政权的“反政府”就等于“同情共产主义”这个说法。至于那个广告的全部内容，我们还不知道。可是，我们认为，他很可能呼吁：要抱着断然撤回美军的决心，对韩国的不民主的统治和镇压人权的行径施加压力。而中央情报部却拿着那个广告去找那些持有批判态度的国内人士，威胁说：“你们所支持的和支持你们的人，不就是这类人吗！”据说，有一位教会领导人回答说：“听了你们传达的话，简直无法了解它的内容。 如果那是事实，责任还是在你们身上，因为是你们驱逐了希脑特神父。”

这些暴徒的即兴政治又有几分“诚实”呢？国民总是浸沉在不安之中。而这种不安对法西斯独裁来说是必不可缺

的肥料。

在新村民众大会上选出来的三千个村子，分别得到了一百五十万圆奖金。有一个村子的代表对我说：

“他们指示我们村子养鱼。靠养鱼挣了五十万圆。可是，为这个，我们村子负了七十万圆的债。上头硬叫我们搞新村运动，给我们村子投些资金，这样我们才勉强动一动，就是这样罢了。他们奖励种‘统一’稻种，增加了一些产量，可是成问题的是米的质量很差。再说，那种稻子稻棵矮，所以拿这种稻草没法编草袋。编草袋本是农家的副业。编不了草袋，还得买麻袋来用。这样给农家增加了支出，而且用麻袋保管米也是个问题。政府可能对这样的连锁反应还不了解。”

从这个例子中，也可以看出朴政权的即兴政治是个什么货色。矛盾一加剧，他们就强调来自北方的威胁。

即兴政治的更突出的例子是，朴正熙曾向北方说：“要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接受粮食援助。”这是他在一月十二日新年记者招待会上说的。他企图用这种毫无意义的谰言来夸耀所谓优势。毋庸赘言，这与其说是向北方做的宣传，倒不如说是向南方做的宣传。更觉可笑的是，政府方面在收集包括外国人在内的各界人士对这一宣传的反响。他们原以为，外国舆论会对韩国的这种值得赞扬的人道主义十分感动并大加报道。对这样低劣的政治感性，该说些什么呢！

即兴政治的危害还波及到这次的大学入学考试。去年，朴正熙到一个实业学校访问时，突然说，要“优待”实

业学校毕业生。于是，这个部门的学生受到了不同于一般的人文系统高等学校毕业生的待遇，他们可以不经过大学入学考试这个国考就升入实业系统的大学了。他们甚至占了录取定额的百分之五十。结果，人文系统的高等学校毕业生很难升入工科大学了。这在学生中间，造成了一场大混乱，有的学生要变更投考的学科，有的学生说，将来要投考工科或商科，就要上实业学校才行，等等。总统的话是绝对的。他的话是正确的，是不容斟酌的。他的话音一落，就立时变成犹如晴天霹雳的可怕的训令。他的话，再幼稚也要成为绝对的。可是那是出于即兴的，所以不知什么时候怎样改变。谁也不敢说，要优待实业高等学校这道严令，明天会怎样改变。他的话，一向和军队的夜袭或奇袭战一样，是突如其来的。这就是韩国社会不安的根源。人们不可能展望未来，也不可能有计划地、脚踏实地地安排生活。他们处于不安之中，总是过瞬息变幻的生活。

总统在年初巡视中央官厅时，这种即兴政治表现得最为突出。

一月二十九日，他到主管人事的总务处，下命道，要编写“舞弊官员名单”，永久保存。于是，当即决定编写《庶政一新年鉴》。但是，现在成为问题的是，究竟要把定为传给子孙万代的恶行者的范围划在什么程度上。在李朝时期，曾把清廉洁白、精明强干的官吏，死后荐为清白吏。在四百年的期间荐为清白吏的仅有一百九十多名。另一方面，有不少贪官污吏被裁定为“赃吏”。裁定为“赃吏”意味着其罪殃及代代子孙，以致“伐门灭族”。做这种说明的报

纸倒是有的，但没有一家报纸对朴正熙的这种“复古调”进行批判。官吏们也和他一唱一和，加大这种即兴行动招致的危害。在朴正熙面前， 只能答应一句“是”， 去执行命令，或者装模作样地摆出搞点什么名堂的样子，这是绝对必要的。

他到文教部时说：“要彻底进行以忠孝为重的人本主义教育。”到科学技术处，他“训令”道：“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 一定要站到先进国家的行列。”到文化新闻部则说：“要在全罗南道光州， 建设国立博物馆。”这一切命令都得到了赞扬，说这是英明的君主所作出的伟大决定。二月十一日，他视察汉城特别市， 扬言说：“要在从汉城沿着高速公路用一个小时才能到达的地点，建设临时首都。”这使汉城特别市市长大吃了一惊，问道：“可以公布吗？”他答道：“这是我早从二三年前就设想的。 已经指示报社公布了。”这简直是君主的独断专行。现在，由于这个独断专行，汉城的人们经受着心理上的恐慌。这个政权，如不经常对国民进行震惊疗法，恐怕无法维持下去。风闻说，那些同高官们勾结的土地经纪人早已活动起来， 套购了土地。这可能是因为直到现在，要动工搞建设，当权的一伙就把它当做发财致富的好机会。而那些迟了一步的小土地经纪人，通常要受很大的损失。原因是，当局在防止投机倒把的名目下， 用法律和权力对他们进行阻挠或横加掠夺。

韩国社会好象倒退到几百年前的李王朝社会了。在君主的统治下，国民为不安和不满发抖，但保持沉默。过去

那些想得到掌权者庇护的两班贵族们，为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 对不懂事的孩子一般幼稚的君主说的即兴的“话”，盲目地大加赞扬。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过去少数诚实的儒学者一样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那些笃信者企图进行孤独的抵抗。在这样幼稚可笑的环境中，生活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报纸象是要恢复一些元气似地企图对东欧发生的抵抗尽其能地大加报道。

前　夜

战斗的人们

“期望朴正熙任命的审判官把我们这些主张朴正熙下台的人判为无罪，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愚蠢的想法。”

这是前总统尹潽善于今年一月底向大法院提出的上诉文的开头部分的一句。他说，我们虽然“在那演出为独裁者编的审判戏的舞台——维新法庭上”被判为有罪，“但我们是没有罪的。维护真理的法庭、良心的法庭、民众的法庭”和“即将到来的历史的法庭”，必将进行公正的宣判。根据这种自信，尹潽善在这份上诉文里主张“朴政权应该下台”。这不只是一份法庭上的文件，而且是宣布韩国历史面临民众起义的前夜的宣言。

另一方面，看来活在这一前夜的朴正熙的日子，也并不那么好过。要转移民众的视听，就要制造出大事件，也就是制造出使报纸每天大叫大嚷的话题。强调什么“来自北方的威胁”，已是家常便饭，但效果不大。于是他们抛出迁都之说，掀起大骚动。汉城的人口到了八十年代也要固定为七百万。接着发表总统谈话说，“汉城作为首都将继续发展下去，行政首都的迁移，到了八十年代才能进行”。

这无非是想要给人们造成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他将继续掌权的印象。总而言之，为扰乱民心而掀起的这种骚动，将与日俱增。他们死气白赖地要给世人继续注入这样的认识：朴正熙俨然高高在上，他的一句话，就能决定全体国民的命运。他们很想在国民的心版上刻下这样的印象：不管外面刮什么风，不管要求民主的人们怎样谴责他不道德，不管社会上的矛盾怎样达到顶点，快要爆发，朴正熙依然坐在任何人都不敢触动的宝座上，朴政权依然坚不可摧。

这种做法倒是收了不少的效果，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幻想象个沙上楼阁一样，是很容易坍塌的。所以，统治阶层感到极大的不安，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制造出那种大事件来。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力量，仍将把财阀的舞弊行为当做攻击的对象。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民众把怨恨的矛头指向富翁或与他们相勾结的官僚，而不指向当权派。可做攻击对象的舞弊现象多得很，但一向成为这一攻击对象的不是统治阶层或经济界的中枢，而是其周围的人。这种做法，还可以收到另一种效果，即可以激起官僚和经济界的忠诚。目前，所有的韩国人都想，如果叫统治阶层看不顺眼，就只有死路一条。

如果情况恶化，朴正熙就会下一道命令来一次大屠杀。目前广泛传开可能事先逮捕知识分子的风闻。这也许为的是他们要取得威逼的效果。在座的一个当大学教授的朋友谈自己的主观臆测说：“他们可能要给我们造成对这种大屠杀的恐惧心理，封住我们的嘴。到那个时候，果真

会有把枪口对准民众、自以为自己很安全的那种军人和警察吗？”目前，他们的首要任务，不是继续维持韩国的存在，而是继续维持朴正熙的存在。只有这样做，那些称颂目前体制的家伙们才能继续享受掠夺的乐趣。有一个朋友以悲痛的口气小声说：

“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的人占有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可是，据估计，到一九八一年，将有仅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的人占去国民收入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五。难道这不是叫人悲痛的事吗？”

他分明在流泪。当局发表汉城市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七百万。据推算，汉城市有将近一百万未经登记的流动人口。这些人是不被认做市民的，他们象罪犯那样过着地下生活。他举出各种数字做了说明。例如：一九六〇年，农村人口有一千四百六十万，但到了一九七六年减少到一千三百二十万了。韩国农村收容农民的能力可能不超过这个水平。农村人口的每年自然增长率是百分之三。在这一段时间里，城市人口也增加了，同时，能雇佣十名以上工人的作业场的雇佣能力，由三十五万人增加到二百万人了。但是，如果考虑在农村自然增加的人口，那么，就有八百万人在这段时间里离开了农村。这样算起来，我们不能不问将近六百万的人到哪里去了？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为把持权力和财富而挣扎的人把继续维持朴正熙的存在当做首要任务。而且现在还为争取美国卡特政府的支持而竭尽全力。

民主化运动方面的人们把现在看做是解放前夜的黑

暗，正在展开着激烈的斗争。迎接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一周年，局势大大动荡起来了。二月二十一日，在明洞圣堂，为被监禁的人举行了特别弥撒。警察把要参加这一弥撒的六名被监禁者家属架上小型警察车载走了。有二十多名警察“护卫”这六位妇人驶车逛游三个多小时，然后才放她们走。

二月二十二日，大法院决定废弃对高永根牧师的第二审判决。高牧师说教时曾批判过朴政权。他说，给朴正熙的妻子修建很讲究的茔地，甚至邀请外国人参拜，是一件可耻的事。但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而不是流言蜚语。因此， 高等法院不得不取消在第二审时给他判的两 年 徒刑，进行复审了。

由于这件事，人们推测，朴政权对反政府政治犯的态度是否开始缓和下来。还有一种揣测说，这是不是要释放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有关的人的前奏呢。可是，我总觉得有一位朋友告诉我的他在中央情报部听到的消息才是真的。他说，这件事，实际上是大法院刑事部的几个审判官拿出勇气搞的，而不能说它意味着整个局势发生了变化。这可以说是司法部在独裁统治下表现的一种无法抑制的反抗。因此，大法院将受更严密的监视。而且那几个审判官将有很大的不幸临头。这可以说是一种小小的良心发现，但它刚一萌发就被践踏无遗。

在二月里，也有很多人被扣上散布流言蜚语之罪被捕了。看来，在野党方面的人被逮走的较多，这是因为要除掉在野党内的强硬派的缘故。今年的三月一日，正是一九

一九年三·一独立运动五十八周年、发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一周年的日子。因此，宣布了超戒严状态。到了四月，还有一九六〇年的学生革命纪念日即四·一九。传说，学生也将以某种形式进行活动。当局为了以暴力完全控制这一抗拒的季节，出动了所有警察、中央情报部和军队搜查队。从二月末到三月初，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把民主化运动人士软禁于自宅里的措施，弄得许多神父、牧师、被监禁者家属一点活动的余地也没有。原州的池学淳主教原打算去汉城，但被制止了。原州市长和警察署长到他家对软禁的理由做了一番辩解。前总统尹潽善的秘书也被抓去受了恐吓：如果今后尹潽善继续活动，那么他的家属的生命难免遭殃。为反对这种软禁，“三·一节被软禁者全体”发表声明，表示了抗议。

当局给与教会有关系的人捏造丑闻，并大加宣扬。他们还到处散布写有这种内容的信件。但是，教会为被监禁者举行祷告会而发出的集会通知和请帖之类的信件，却被没收或只送空信封。于是准备举行集会对这种现象提出抗议，发出了通知。有一位与教会有关的人苦笑着说，就在要举行集会的当天接到了那封曾给压下的信件。反抗的人们也要大大运用游击战法，越来越需要动脑筋了。要到乡下教会的集会去作演讲，就必须避开中央情报部的耳目，突然出现在集会场所。这是因为警察在大庭广众之下是不好逮人的。但是，一有这种情况，警察就借口临场检查，深更半夜里闯进旅店里进行搜查，甚至检查携带品，到第二天一清早，就会把你带走，撵回汉城去，甚至连行李也

带不回去。

去年年底被释放的安炳茂，在今年二月底也遭受过这种横祸。在他不在家的时候，有六个便衣警察到他家要进行搜查。可是他的夫人挡在门口，顽强对抗，不准他们进屋。据说，这种僵持一直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在那寒风刺骨的夜晚，那位夫人连冬装也没能穿，一直进行了对抗。

据说软禁在自宅里的夫人们，在自家的外墙上贴了“弥阿里监狱”、“水踰监狱”等字样。这意味着弥阿里的她们家变成了监狱。据说监视那家的便衣警察和情报员只是把它撕下来，仍旧默默地进行了监视。

二月二十八日，那些虽然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但没有被监禁的九个人，又发表了声明。他们要在全体参加下举行记者招待会，但遭到制止，都被撵出来了。这时幸而声明书得以分发到国际通讯部门的记者手里了。该声明在开头写道：

“当我们几个人想到九位同僚被逮捕，在墙壁和天棚蒙上一层白霜的冰冷的单身牢房里，同严寒搏斗，熬过漫长的黑夜和白天，不禁感到切肤削骨之痛。身在狱外的这一事实，更使我们心痛欲绝。”

这份声明包括“我们没有罪”和“要立即释放”一切良心犯等两项内容。它还提到在一九一九年三•一独立运动当时，对参加这一运动的人最多判了三年，对参加东京留学生的独立宣言事件的人最多判了一年的事实。声明说：“在本国，本国人民主张在本国实现真正的自由和民主，却要被本国人判重刑，这不是太残酷太悲惨了吗？”并号召说，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在要求把今年变为“释放良心犯的一年”，要求自由，和按照良心行动，既然这是人心所向，就该为“值得夸耀的祖国”下一决断。声明在末尾表示决心说：

“只要那些被监禁的这一国度有良心的人得不到释放，我们决不会停止为正义、自由和人权而进行的斗争。”

“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者家属全体”也对于判处残酷的重刑来做“政治报复”的恶劣勾当，进行了攻击。

三·一节纪念礼拜，于三月一日上午十一点在基督教会馆举行。主要人物因被软禁，未能出席。教会妇女联合会会长李愚贞和三·一民主救国宣言起草人文益焕的夫人在前一天到朋友家里躲避，当天赶到了会场。文益焕的夫人高呼“民主万岁”结束了集会。会刚结束，她和李愚贞被拉上了汽车，她们全身受了殴伤和撞伤。

傍晚，下了毛毛雨。和去年一样，明洞圣堂做了盛大的纪念弥撒。许多神父都软禁在自家里未能参加。在这次弥撒中，对于圣职者在全国范围遭软禁的事实，作了详细的报告。

贫民村教堂即居民教堂，也举行了纪念礼拜，虽然它的圣职者被监禁。据报告，这个教堂的人们也被抓去受尽了严刑拷打。有许多人被禁止参加这一礼拜。传说，这个教堂的圣职者在法庭谴责审判长说，“法官是养肥掌权者的补药”。

有四名圣职者因第二民主救国宣言而被捕的全罗南道

光州也举行了三•一节纪念礼拜。社会意识较高的基督教长老派，发表三•一节谈话，要求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和传教的自由。今年二月，这个教会对于今年一月发生的有四名传教者“被非法地带走，剥光衣服，遭到集体毒打昏倒的惨无人道的拷问事件”，提出了抗议，同时要求内务部长官，要对肆行这种不法行为者采取一定的措施，并向他们回报其结果。在牢中的金大中等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九人和许多学生，在三月一日前后举行了三天的绝食斗争。咸锡宪给朴正熙写了一封劝告他退阵的信。这些事，已经传到国外了，但在国内还没有传开。然而很遗憾，这封信还没寄到朴某那里，就在某一次的搜查住宅时被没收了。所以，该看这封信的朴正熙恐怕没有看到。

这封信的口气，既柔和又严厉，正象训诫脱轨的弟子一样。这封信向未曾受过国民的尊敬和爱护的朴正熙写道：

“阁下，您何曾有过一次是面带微笑站在民众面前的呢？您何曾有一次是挥着手走过民众中间的呢？您何曾一次和民众交谈，听取他们的需求？”

朴正熙根本不想深入理解这个国家的历史，也不了解世界历史潮流。他应该对这个国家的现状负责。这封信提出这些后，在最后一段写道：

“阁下，您要是真心为这一民族和国家的永恒的将来着想，那么，现在正是时候，决然立断，自动退位，以便创造条件，使国民有机会在和平的环境中履行自己的义务，转祸为福。如果您做到这一点，国家和您都将见到欢

腾的日子。可是，如果您不能做到这一点，那冷酷无情的历史规律，将不会放过您。这将给阁下和国家招致很大的不幸。我们希望不要招致这种不幸。”

这封信，才是国民的呼声。这封信很象古代王朝时代，在野的有良心的儒学家向国王提出的上奏文。朴正熙活象王朝时代的君主。在这个国家，什么时候会出现具有高尚理念和不惜为国民牺牲自己的那种崇高的精神和人格的人物，以对现实的敏锐的洞察力和行政手腕来治国安民呢！难道抱这种想法是因为这个国家的国民还没有从儒教时代的王道政治的梦想中觉醒的缘故吗？

二月二十七日，有一个服完两年徒刑出狱的女学生，参加了某教堂的礼拜。她原来患心脏病，如今又加了肺结核。虽然如此，她向人们致意说：“只要上帝需要，我就情愿再到监狱里去。”告诉我这件事的那个朋友眼里噙着泪珠。这确是不屈不挠的战斗。的确，她们在恶劣条件下战斗，在战斗中成长起来了。中央情报部对于许多学生和记者参加星期四祷告会这件事，很费神经。于是各大学的学生科长等人动员起来，守在集会场入口，寻找来参加集会的学生。最近，又开始剪掉或用墨水涂掉来自外国的报刊的文章了。

贫穷的人们

据传闻，两三天前，咸锡宪只身在汉城市厅前举行示

威，要求朴政权退阵的时候被捕了。三月五日，梁一东的民主统一党党员要举行的示威也遭到阻止了。据说，那天有数百名青年党员动员起来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规模。他们在位于汉城市中心乙支路入口处的该党办公厅三楼上，拿出扩音器大声喊朴政权滚下台去。他们从上午十一点起一直喊到下午两点。他们在办公楼前设了防寨，因此警察没能闯进办公楼。于是他们利用消防梯子爬上了三楼，可是，扩音器拿到屋里去，窗户也关上了，弄得警察无计可施。这一争执持续了三个小时。行人听到从汉城市中心传出来的朴政权滚下台的喊声，都感到了惊讶。真奇怪，在他们的脸上，流露着象是碰到一件怪事的表情，却没有一点受感动的表情。告诉我这一事实的那个朋友附加了如下的评论：

“据说，这是党内强硬派的压力下搞出的。但是，比起这个骚动来，这个党这回也受到了宽大的处理。这是不是当局试了一下市民会不会跟着在野党的喊声跑。我总觉得它的背后潜伏着巧妙的诡计。总之，现在的在野党是无法发动市民的。民众都在想，谁知道在野党里有什么样的人，它的活动里隐藏着什么诡计。朴政权统治下的在野党，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残废。所以说，只有咸锡宪等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才具有精神力量。这从未来的政治角度来看，也许是一件可悲的事。”

正因为如此，在三月一日前后遭软禁的人，并非是在野党人，而是圣职者、被监禁的人的家属、知识分子和年轻人。这些人只要五六个人碰碰头，就有十多个中央情报部

特务和警察动员起来监视他们。一些大学教授等人明明知道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却深怕被革职而战栗不安，以至变得怯懦卑鄙。据最近听到的消息，在全罗南道光州招考大学生时发生了奇怪的现象。有十一名学生虽然功课都考及格了，但人学人品审查得了丁，结果没被录取。他们的大部分是念高等学校时由于参加罢课或示威而受退学处分，经高等学校同等学力鉴定考试应考大学的。当局在表面上弄成他们功课不及格。这类事，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是常有的。如今，可以说李朝时期和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为镇压民众而动用的一切最恶毒的东西，都借尸还魂，到现世复活了。

在同日本的关系方面，也使人感到往日的亡灵又在徘徊。它的最有象征性的事件便是以“再生进口”的名目进口废油的事件。用这种方法进口的公害物质四千吨废油，如今大部分放在露天上，没有人管。

这里，有许多问题纠缠在一起。而且韩日两国商人狼狈为奸，狗苟蝇营。他们所以能干出这种勾当，是因为韩国有那么些堕落的官僚。日本商人要用这种卑鄙勾当来挣钱，就要有象如今的韩国那样堕落的执政者。同时，这个掌权者必须彻底镇压民众对他们的这种腐败行为的反抗。所以可以说，韩国目前的掌权者对日本商人是最可心的帮凶。

在目前的严重局势下，这个废油事件并不是由受害者——韩国人提出的，而是在日本国会上成了问题之后才传到韩国来的。受害人被迫保持沉默，而只能靠加害人的

一种自我批评来闹成问题，这真是叫人啼笑皆非的事呀！

围绕废油事件的韩日关系，实际上可以说照实反映了目前韩日勾结的实况。韩日勾结，上从执政者下至小企业，波及到所有领域。在一所贸易公司经售店供职的一个年轻人慨叹说："日本商人都想投机取巧啊！ 他们可能认为，在不稳定的韩国， 应该用短期计划搞投机。 他们出差到韩国， 就要由这边从各方面至诚款待， 包括妓女宴会在内。把这些费用都算计起来，有时还要赔本哩。可是总不能闲着不动，所以只好忍痛和他们做交易。欧洲的商人出差来韩国，完全用自家的费用，可是日本商人就不同了，他们有时约定付手续费，但一过去就象没有那回事了。也许可以把这种做法叫作韩国人式的交易吧。这可能也是因为日本的小企业过多地向外扩张的缘故吧。"

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捞点赢利，就不得不向象废油事件那样的罪恶买卖插一手。在这方面也自然使人回溯李朝崩溃前夕的情况。 当时， 也有日本的二流子、小商人、投机分子在朝鲜半岛横行。而且，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正是韩日两国政治统治者之间不可告人的勾结。由于韩日之间有这种关系，日本统治势力对朴政权苟延残喘给以最有力的支援。我听到从马山回来的一位记者讲的如下的话，实在受了很大的冲击。他说：

"马山有一天挣二百五十圆的女工。 她们一个月做二十五天工，才挣六千二百五十圆，而且她们工作的地方都是日本人的企业。既然日本企业用这种方法攒着钱，福田政府当然会向给他们保证这种条件的朴政权表示谢意的。

同时，日本人可能会在心里想：在这没有工作做的地方，还是我们给她们发一天二百五十圆工钱，难道这不是该感谢的事！就是由于有这种勾结，整个社会歪扭了啊。”

这是大约在一个星期前有过的事。报纸介绍了在法国获得“金针奖”的一张照片。这是一张去瑞士和荷兰做“养女”的韩国人孤儿姐妹在戴高乐机场重逢拥抱的照片。她们是四年前只有四岁和两岁时，分别叫不同的“干爹娘”“收养”的。据说，姐姐说她一看妹妹的眼睛就能认出来，她四年来热切地盼重逢的日子，终于与妹妹重逢了。四年前，她们大概是在汉城金浦机场哭喊着“妈呀！妈呀！”“姐姐！姐姐！”离开了祖国的。

这种惨不忍睹的情景依然定期展现在机场上。现在，我手里有一份全国工会联合会清溪被服厂支部女工们发行的名为《洋槐》的杂志。这是一本字迹不大清晰的油印杂志。据说，她们为继承于一九七〇年要求改善劳动条件而焚身自杀的年轻工人全泰一的精神，设立劳动教室等进行着斗争。《洋槐》这本杂志里也有可歌可泣的斗争记录。它满篇都以激昂的词句控告了现状。下面援引其中的一段。

“我们不是他们的奴隶，也不是机器，而是人！可是，他们把我们当做自己的奴隶，任意驱使。我们在流着血汗做苦工的时候，他们却摆上山珍海味，搂着女人吃喝跳舞。他们舍不得给我们增加十圆的工钱，当他们要增加一点工钱时，就摆出大发慈悲的样子。上班时，稍迟了一

点，他们就横眉怒目，大发雷霆，可是却在任意延长下班时间，甚至缩短午饭时间。可见如今是有了钱就能使鬼推磨的世道。他们拿钱这个暴力来这样残酷地作践我们这软弱的人。”

这些女工诘问道，你们教我们的是只要辛勤劳动，就能过好日子，这不是弥天大谎吗？报纸报道了温度计制造厂发生的惨事。他们用的是水银和硬化粘着剂，所以皮肤上生出红斑点，又脱皮。由于患这种皮肤中毒症，已有一个工人丧了命。据说，出《洋槐》的那个被服厂里， 甚至有年仅十岁的童工。许多女工由于一天做十二至十七小时的苦工而得了肺结核。可是，她们一说出来就会被解雇。虽说一进厂就能领一万圆工资，但实际上比这少的时候也很多。于是，政府于三月十日劳动节即工人之日宣布说，要把最低工资提高到二万圆以上，并强调了劳资合作。

同一天晚上， 有近二千名的群众在明洞圣堂举行集会，通过了《工人人权宣言》。 这一集会呈现着民众的真正的劳动节的气氛。该宣言开头写道：

“工人拥有人权是天经地义的事， 它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工人的人权是依法保障的、拿任何理由也不得侵犯的尊严的人权。 但是， 如今频繁发生在国家保安、经济发展等美名下侵犯工人基本权利，违反俨然存在的劳动法，把不人道的痛苦强加于工人身上等事态，这是令人深感遗憾的事。我们认为这是再也不能容忍的犯罪行为。我们反对无视那些提供劳动力的工人的意见，强迫工人无条件地遵守企业主片面规定的劳动时间和

生产定额的那种不民主的、封建的劳资关系，并要求建立作为自由人的平等的劳资关系。”

这个《工人人权宣言》提出了共十三项要求，其中包括保障工人的团结权、团体交涉权、团体行动权等劳动三权和废除紧急措施等。宣言还遣责了一向同企业主狼狈为奸的掌权者和御用化了的工会。挂着工会名牌的大韩劳总，实际上是中央情报部的一个支部。汉城某大学劳动问题研究所如今教给中央情报部情报员以有关劳动问题的知识。这就是说，为工人谋利的机关变成了镇压工人的机关。而且，正如该宣言所揭露，政府的意图在于：把工人运动变成象新村运动一样的东西，促使工人自动发起以百分之一百二十完成生产定额的运动。中央情报部在干涉所有行政工作。这一暴力性干涉，使所有行政工作陷入了混乱。

由于大韩劳总变成了中央情报部的支部，工人运动不得不离开原有的工会。

这个宣言还遣责了当局借口工人同基督教有关系，迫害他们的事实。实际上，天主教和基督教共同支援着正义的工人运动。在韩国，工人问题确实越来越尖锐化了。因此，包括军需工业在内的新的自由工业地区，例如庆尚南道昌原等地，把工厂移到完全隔离的地方，实行军队式的管理制度。在汉城和仁川附近等地，由于工厂坐落在市区内，经常受社会的影响，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人也能支援工人运动。因此，朴政权企图把这个国家的全部工业与社会隔离开来，置于军队式管理制度之下。实际上，目前使他们最伤脑筋的是女工多的纺纱厂。我已经谈过的仁川东一

纺纱厂女工的斗争，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这个厂的女工们自己组织工会积极展开了活动。因此，中央情报部、御用工会和资方合谋勾结，撵走了工人组织的工会会长等十五名干部。于是，三月上旬，工厂内外的女工一致站起来，准备在明洞圣堂举行一个巨大的抗议集会。据说，她们向民间的重要人士发去的请帖就有两千枚。中央情报部对此大为惊慌，对资方和御用工会施加压力，使十五名全体干部复职，才解决了这次纠纷。

结果，这个集会突然停止举行了。但是这天，已有一千五百多群众涌到明洞圣堂来了。于是当局通告集会停止的事实，把他们撵回去了。据说，在南荣尼龙厂被解雇的女工复职的同时，有四名监工被解雇了。女工的斗志越来越高昂了。 三月十日劳动节集会也正是以这种热情举行的。听说，在这个集会上有几个人被逮走了。她们可能在遭受严刑拷打。有一个朋友把这些报纸不报道、一般人无从知晓的事实告诉了我，他又补充说：

“我觉得中央情报部的伎俩也到头了。 比中央情报部更厉害的军队式管制可能是唯一的出路吧。可是，这样的话，谁敢说那个军队不先打倒政治统治者呀！总之，那些女工的斗争是很了不起的。她们去找大韩劳总纺织委员会委员长，谴责他已御用化，集体地狠揍了一顿。那个委员长衬衫全被撕破，好不容易逃脱了。因为工人运动遭受残酷镇压，所以，问题一发生，就很容易变成暴力行动。我总觉得，现在已经是民众起义的前夜。”

他认为汉城市贫民村被拆除这件事也是民众起义前夜

的迹象。在美化城市的借口下，贫民村首当其冲，全被拆除了。因此，这些贫民到不显眼的洼地、山涧或铁路那边马马虎虎搭起帐篷住下来。这样的贫民村，在汉城市就有三十多个。这是大体上七十户至四百户集中的村庄，是些法律达不到的僻地。在这些村子里，差不多每个帐篷住十个人。如果来了陌生人，他们就用横眉冷眼逼视他，所以谁也不敢接近这个村子。他说，只要剖视一下这个国家的内部，就不禁感到极度的不安，因为它与外表的装潢完全不同，是一个空洞无物的洞窟。女工们那样展开殊死斗争，也是理所当然的。《工人人权宣言》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不下三万圆的工资制。至今，政府在发表各种工资统计数字时，一般多添加一万圆，但对工人的健康状况则向来只字不提。 目前， 有百分之三十的女工患肠胃病，在全国工厂，工伤者占百分之二十。报纸报道了工作中失去双腿的年仅十三岁的童工的惨状。他一天工作十四小时，一个月才挣二万四千圆，而企业主也穷得不能付治疗费。据说，他病在床上说："我不干活儿，家里的人就要饿肚子呀……"这哪能谈得上是人的生活啊。然而， 统治阶层却尽力压制对这种现象提出抗议的呼声，把这个世道当成他们的天下讴歌。

因此，民众对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干的丑事抱有极大的愤怒。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为争取对政府的支持，倾囊挥霍了美元。极口赞扬朴政权建立了伟大功绩的、被称之为未来学者的哈门坎的哈得逊研究所也得了韩国中央情报部的钱。他们对哈佛大学也施舍了一百万美元。我们

听到这种消息，不禁要质问:“在和日本的关系上搞了些什么呢?”

日本和美国，是否有勇气向全世界揭露这些事实呢?韩国等全世界所有贫穷的人们，只能对它寄与希望吗?如果是那样，这个民众起义的前夜不是太可悲了吗?今年又要度过苦难重重的一年的喽。

（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四日讯）

四 月 宣 言

黎　　明

大学的教职员和学生们，从睡梦中醒来吧！压制的黑色旋风在这昏暗的凌晨，席卷着贫瘠的大地。不民主的、反民族的现体制，早已脱掉绵羊的外皮，露出了豺狼的獠牙！

他们玩弄掌权不超过十年这句话，制造恶毒而悲惨的新的神话。果真我们有民主这个词吗？我们有人权这句话吗？

现在，我们这里残存的是越发朦胧的意识和越发变冷的躯体。大韩的人们行动起来吧！揉去睡意，睁开眼睛，奋然站起来吧！给这个相互监视和怀疑的社会吹入温暖的生气吧。

这是四月一日，一捆一捆地撒在汉城大学校园各处的传单《黎明》的开头一句。传单谴责说：朴东宣搞出了两千万美元卖国行贿事件，但当局却在国内发表说，他只是拿自己的钱四万五千美元赠送了礼物。传单还指出：当这些骗子们摆奢华的宴席饮酒作乐的时候，“我们的兄弟姐

妹因营养失调消瘦不堪”， 学校变成“便衣警察队的游览地”，和平惨遭蹂躏，在这里只有一个“强行的变质的学业”。“要认清现实！ 为了在浸满无数的努力和血汗的大地上，培育民主这棵树，使之开花结果而斗争。”这是传单的末尾一句，这个传单是以“汉城大学恢复民主学生联合会”的名义写的。

事实上，这条道路将是以“无数的努力和血汗”铺平的道路。由于学生护国团的建立和教练，学校变成了兵营。有一个大学教授讥笑自己似地说：

“我们与其说是教员，不如说是监狱看守。禁止搞政治活动的结果，大学反而更政治化了。如果教员不讲一点社会正义，学生们就瞧不起那个教员。要是讲些死亡或人生的问题，就要受到讥笑；要是强调应该用功学习，学生们就说，在这种情况下怎能用功学习呢。学生们经常衡量教员是亲政府派还是反政府派。学校荒废不堪了。”

日本神社搞什么“袚除不祥”，意思是说提防灾难。韩国的迷信里说“驱邪”，意思是说解除厄运，如果驱逐了厄运，这个国家的民族就能发挥无比的力量，做出伟大的事业。在今天的这种压迫下，这个国家的全体民族只能颓废下去。

事实上，民众都陷于沉重的绝望之中。朴正熙绝不会让出自己的权力。 他控制着民众可能进行抵抗的一切要冲。他担心美国是否搞些活动，忙于采取对付它的对策。所以许多人说，无论是什么样的抵抗，都不能奏效，只能

招致民众的牺牲。他们还象小市民那样患得患失，非常担心，如果再发生什么事，造成大混乱，会不会连现在这种勉强对付着过的生活也失掉。

传单《黎明》对这种精神面貌也发出叹息。执政者认为只要利用这样的小市民心理，提出“爱国”、“反共”的口号，就能为所欲为。由于这种恶毒的政治，在民众中间滋长着极不合道理的意识。真是可怕的事啊。

中央情报部对这样的民众散布着种种流言蜚语。最近，有关美国的谣言流传得特别多。由于怕美国，不能在报纸上公开地讲出来，所以只能利用人们的嘴。现在它好象成了比报纸更有力的传达工具。朴政权操纵民众的手法是很巧妙的。

他们对于韩国中央情报部在美国搞的坏事传出这样的话：“那不单单是韩国搞的事。许多国家都在搞，为什么偏偏把韩国当成问题呢？人们拿它作美军撤回的借口。事实上，那个贿赂也并不是为的朴正熙个人，而是为要制止美军撤退而做的为爱国而努力的表现。”还说什么“卡特总统同美国财阀的关系是不好的。而且，限制进口，这可能会使他们的经济政策遭到破产。由于严重的通货膨胀，可能会弄得一筹莫展。”还说：人权外交也将在共产主义国家和南美洲早晚要遭到失败。其中最大的非难是，卡特总统将连遭失败后陷入和肯尼迪总统一样的命运。在他们当中没有一点点在不安之中也展望光明未来的心情。那里却隐藏着希望再来一个肯尼迪悲剧的那可怕的暴力的因素。

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对话里也萦绕着沉郁的空气。他们

在谈话中如果涉及一点政治问题，就说："不要提了， 没有办法。带家眷的，总该想法活下去啊。"他们说，怎样议论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只能招致危险。这就是一般人的想法。这是个失去了热情的时代。有些人说：即使更换了现政权，也是一样的，比起招来混乱，不如将就维持现状。然而，由于某种契机，谈得很起劲的时候，他们也怒冲冲地喊道：

"他执政十六年了，还要继续掌权哩。 在甚至遭到最大的友邦美国唾弃的情况下，怎能做到保安呢？没有一个国民或一个军人想能够做到那样。国民切身体验到，靠那些欺骗和镇压国民、唯个人享乐是求的势力是不可能做到的。他自己下台，重整一切，才可以说是为国家着想，也是为他常说的保安着想的哩。看来，这个国家在跟他一道走向灭亡。"

这样的话也说不出口，干脆打消一切念头，只埋头于日常生活， 这是今天韩国人的实际动态。 没有了政治自由，人们自然就只管埋头于个人生活。在没有真正的政治的地方，人们不会关心政治，只是陷入绝望，但愿政权快些崩溃罢了。抱着个人无能为力的意识，本能地防卫自己，到头来， 想尽办法做移民去海外。 这样叹息着交谈的时候，有一位被撵出大学的教授严肃地说：

"战斗的人总是占少数。现在， 只有那些有勇气的教会，才是可以交谈的场所。不过那也要在警察队和中央情报部的包围之下。但是，许许多多的人在这谁也不敢说真话的社会里， 仍然迫切地想听到正确的话， 并为此挣扎

着。我看到演讲会场上洋溢的热情，深受了感动。我从年轻人迸出怒火的目光，感到无限的希望。”

为了不让学生到那种场所去，学校当局有时搞紧急集合，有时派学生科负责人到会场门口检查学生。可是，演讲会场总是挤满听众。会场上有时还提出一些在紧急措施下无法回答的质问。每当这时， 演讲人常常回答说：“我充分了解你想问的是什么，你也会很了解我想做什么样的回答。”这么一来，提出质问的人答一声“是那样”，便坐下来。“这样就好了。每当这时， 我也感到眼眶热辣辣的。”当教授的一个朋友这样热情地说。可以说，这就是人们在总统紧急措施第九号下一团糟的社会里生活的面貌。

通过一九七四年的民青学联事件广为知晓的韩国基督教学生会总联盟，于三月三十日开办了第一次人权讲座。这次由曾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捕坐牢后得到缓期执行获释的安炳茂教授以《圣经里阐述的人权问题》为题作了讲演。基督教会馆的大厅，连走廊上也挤满了人。各大学的学生科长在入口取缔和监视学生。六十个机动警察队员包围了会馆。主办方面抗议道，这不正是镇压人权的吗？这么一说，他们只好撤到停车场那里去了。他们可能想到不该刺激年轻人。安教授毫无顾忌地讲起话来了。回顾一下历史，由于执政者恣意行使权力，由于披着合法外衣的独裁之下的法律，人权不断地遭到了蹂躏。耶稣为反对宣扬法律至上主义的独裁体制而进行了斗争。安教授这样说着喊道：让我们沿着耶稣所选择的宁作主张正义的失败者，也不作卑鄙的胜利者，背起十字架的道路前进，为争

取人权而奋斗。

民主救国宣言

为争取民主、民族的自主和民族统一而斗争，是今天各阶层所有民众的最大任务。我们号召人的自尊心、自由和生存权利全遭蹂躏的所有工人、农民、职工、公务员、情报员、学生、宗教徒、知识分子和中小工商业者等民众，要拿出最大的勇气和创造精神，迅速发扬民主热忱，明确地表明民主国民的态度。我们把这个文件当做我们自己誓为实现全体国民的联合而努力的保证。民主万岁！

这是在大法院三月二十二日决定驳回有关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上诉的时候，民主人士发表的民主救国宪章的最后一段。据说，由于对上诉的驳回，尹潽善、金大中两人的刑期分别定为五年徒刑、取消资格五年。还有郑一亨国会议员和李兑荣律师分别被剥夺了国会议员和律师的资格。那时有一个新民党人权委员会所属国会议员也出席了法庭。审判刚一结束，旁听者们一致谴责他说："你是不必到这里来的。你是在野党人，可你在国会上对这个事件提过一句没有?"这么一来，他慌张地溜走了。

今后将依然只有基督教圣职者和学生们继续进行悲壮的斗争。李文永教授在三月初进行绝食斗争表示了抗拒。据说，他对去探监的夫人说了遗嘱般的话：

“看样子，我要变成尸体出狱了。 我希望你在加列利亚教会举行我的葬礼。你要多关心教育孩子，无论如何要靠自力抚育他们。不要麻烦亲戚和朋友。”

他的夫人立即向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人权委员会报告了这一事实。 据说，那时夫人呼天抢地地哭着说：“他可能是为正义选择高尚的死，可是到底叫我们怎么办呀？”人权委员会代表去找典狱长问了究竟。他回答说李文永教授并没有绝食。人权委员会提出抗议说当局总在说谎。第二天他强烈地劝告李文永教授停止绝食。

全体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者的家属，在三月二十二日大法院决定驳回上诉后就发表了声明， 声明开头说：“非正义的不法行为横行的今天， 我们痛叹真实和良心成为处罚和镇压的对象的这一毫无道理的现实，并对国家的未来深感忧虑。”声明指出：我们将继续进行斗争，直到实现受苦受难的人们的意愿，“从压迫中争取自由”的那天，声明最后写道：“我们向国内人士表示感谢， 感谢他们深切关心恢复民权运动，以祈祷给予声援。”

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五十分许，汉城大学学生又在校园举行了示威。他们散发了约五百份民主救国宣言。据说，参加示威的有三四百名学生。这时立刻赶来一群便衣警察和当学生处长的一个教授。 机动警察队也闯进了校园。 据说， 机动警察队不经许可冲进校园里这还是第一次。看来，他们害怕四月十九日学生革命纪念日，进行毁灭作战。三点二十分前后，这个示威被暴力镇压下去了。

这天的事件中产生了令人悲痛的事。汉城大学校长尹

天柱接到举行示威的报告，当即赶到了现场。他把一个认为是主动人物的法学系学生拉到校长室，大骂一顿后交给了警察。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这件事后说：

“去年十二月八日法学系举行示威以后， 校长受到了青瓦台的严重警告。他们说要是往后再发生示威，就把他革掉。所以他想表现一次忠诚，今天竟干出了那种勾当。校长也罢，教授也罢，都是些‘大学监狱’的警察和看守。人在压制下竟会变得这样卑鄙无耻吗？……”他说完这话，流露出悲凉的表情。

尽管如此，学生的抵抗仍将继续下去。这一天的示威也是在去年宣读救国宣言的第九号馆前举行的。去年十二月八日在这里宣读了“生命有限的人， 怎么要治理永恒的历史?”的救国宣言。 据说， 这次的示威中有两名学生被捕，一名学生躲避了。从此以后，即使举行示威，当局也不会逮走很多的学生。这样做，为的是，不中抵抗方面想增加被监禁的人数的作战之计。也为的是挫折要以良心犯填满监狱的非暴力运动计划。同时，考虑国际影响是一个方面，但主要是为了不使狱中斗争得到加强。连中央情报部也说：“如果把更多的人监禁起来， 你们就会高兴啦。”据说受审讯的学生列举了参加者的名字，审讯官就厉声呵斥道：“行啦，你说就你一个人搞的不就完了吗！”然而，如果这样做了，抵抗运动就有可能重新扩大起来。

据说，事实上，最近每当发生事件的时候，常常是三个人一起被捕，这里有它一定的理由。三个人，就是为实现一个事件的计划所需的最低限度的人数。要起草、油印

并分发声明，至少需要三个人。最近当局常常逮捕这样的三人组，但这样的三人组是可以无数地组织起来的。只要这些甘冒坐牢的危险的三人组组织起来，就能够用游击战法进行某种抵抗。下面援引这次《民主救国宣言》的开头一句。

在长流不息的民族历史的洪流中，每当民族处于危机的时候，正是你们青年学生们奋然站起来以真理和正义的呼声，把准了历史的方向。那遥远的东学的喊声、三·一运动时全民族掀起的浪涛、热血沸腾的四月革命的脉搏，现在严肃地下令敦促我们谴责并改变毒辣而残忍的现实。在国内，由于假装民主和自由的独裁的残忍的专横，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权利受到威胁；在对外方面，民族的自由和独立正在变成虚构的东西，这不就是今天的历史现实吗！

这个宣言揭露许多学校内部的罪恶和社会罪恶后指出："我们的许多主张民主的同学不能返回学校，在铁牢里成了哑巴。"同时提出这样的要求：要解散学生护国团、停止对学校的监视、保障国民的基本权利和生存权利、停止对言论的镇压、释放被监禁的民主人士和同学、不是捏造数字而是真正提高国民生活、铲除买办势力、撤销紧急措施第九号、实行自主外交政策，等等。和我一起念这个宣言的一个当记者的朋友说：

"要是有了言论的自由，朴政权就完蛋啦，不，同它

有密切关系的一切都会完蛋的。比如，就审判一项来说，不单是对政治犯的审判，就是几乎所有的审判，都是由权力和金力摆布的。真象是腐败的李朝时代。你想想，如果言论把这些都揭露出来，那会成什么样子。”

他还谈到不是捏造数字而是真正提高国民生活的一句时说：

“政府宣传说，国民收入增加到三百美元， 增加到五百美元，但国民却对此没有切身感受。政府越宣传，国民就越不相信。他们说，如果增加了那么多，那末，它到底塞到谁的腰包里了呢？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这倒是事实，但物价却涨了百分之三十。生活越来越贫穷。政府说，在这一年要把物价的抬高固定在百分之十的水平。根据这一假设的数字就算把工资提高了百分之十，但在把物价的抬高压在百分之十的水平的这一期间，原材料的价格却涨了百分之三十。结果偷工减料的商品充斥市场。特别是掺假的食品严重地危害着国民的健康。据说，这类问题最近也大量揭发出来了。这和世界头号公害城市汉城一起成了大问题哩。”

汉城大学的这一次民主救国宣言也揭露说， 由于“与国内工业没有关系的工业化”， 国民生活越来越贫困了。不是为国民而是专为资本而搞的工业化，究竟要往哪里去呢？偷税进口饰有密开朗基罗雕塑的仿造品的意大利造家具一事引起的骚动，大大刺激了国民。也就是说和日本商人合谋勾结进口了价值两亿三千万圆的家具。

同时，还发生了独揽经审查合格的中学和高等学校教科书的出版和销售的教科书公司的舞弊事件。报纸连日大肆报道说偷税一百亿圆，对全体文教部编辑官行贿等等，为了不使国民的心里产生任何余地，必须有使国民震惊的事件接连发生。如果教科书公司获取了暴利，那末几乎所有国民都会作为受害者大为激愤的。然而，对获取那么多的利润的公司，政府的当权者一派和中央情报部决不会直到现在不去过问的。他们共同分享了利润，如今才把它变成政治上的事件，这里必定有它的原因。直到现在，当权者动手整财阀或大公司，是因为有利害关系或有必要这样做。

电力不足也是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从四月起一律禁止使用霓红灯了。甚至规定了办公室用电灯的照明度，并且根据行业禁止了夜间营业。从现在的电力情况来看，要到傍晚六点到八点的所谓用电最多的时间， 工厂就得停工。这就是说，发电量供不应求了。可是不知为什么，电力部门的人说，电力供不应求的原因，在很多情况下是由于发电设备不完全。看来，这里也盘据着有名无实的企业。

四月一日也在汉城大学工学院周围到处散发了写有“告汉城大学学友！”的一捆捆传单。 看来，因为有企图扼杀四·一九起义的暴力，所以只有这样间或分散地掀起的抵抗继续下去。如今还没听到为这次的传单事件有谁被捕的消息。这个传单是以《一个坚信自由和民主是保安的最大关键的声音》为题散发的。下面援引宣言的最后一句结束今天的通讯。

春天确是来到了。又红又嫩的金达莱花染红山野的浴血的四月也确实是来到了。啊！清除扼杀自由和正义以至玷污这个国家民族历史的行径，结束贫困和屈辱的时刻到来了。难道你们听不到那响彻漆黑的天空的自由和真理的呼声吗！

艳红的金达莱花盛开的春天来到了。可是，那冰冷的监狱，什么时候才能迎接春天呢。

（一九七七年四月三日讯）

对良心犯的报复

高丽大学的一位哲学教授自杀了。他是被迫担任赞扬维新体制的所谓“国民伦理”课的。他再也不能继续讲授连自己也不信的东西，来受学生们的嘲笑了。他向学校当局恳求免去他讲授这个课，但学校当局回答说，不愿意干就辞职算了。他回家对妻子吐露了自己的苦衷。本来身体虚弱、神经过敏的夫人，当场昏倒，被送到医院去住院，但不幸死去了。他看到夫人的死，自己也在医院跳楼自杀了。

朴政权的独裁在所有领域，给人世间带来了悲剧。有一个实业家常常做海外旅行。他说，从客机在金浦机场起飞的瞬间起就感到心情非常舒畅，脑子里杂乱的思索也有了头绪。看来，我们的精神沉浸在这犹如黑雾弥漫的不安

状态中，连思考也要枯竭了。 那个实业家笑着说：“掌权者也许会说，谁也不需要进行正常的思考，只要按照他的命令行动就行。这怎能行得通呢?”当局的逻辑是：美国已抛弃了韩国，所以怎样摆布这个国民，也没有关系。这可以说是一种暴徒的逻辑。朴政权将越来越倾向这种逻辑，直到它垮台的那天。

他们厚颜无耻地叫嚷，只要杀掉三十名搞民主化运动的人物，就能恢复韩国的和平。从大学撵出来的教授们生活已经落到最低水平了，逼得连住房也要变卖了。据说，中央情报部的上层人物主张实行强硬政策，但下层人员认为采取强硬措施，就会招致更严重的危机。还有一种见解是：问题越是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强硬政策就越发强化起来，这样，反而会加快掌权者的崩溃。

年轻的一代不关心政治的现象一直在蔓延，但另一方面，要豁出生命进行斗争的青年也在与日俱增。有一个曾被中央情报部逮去的基督教徒学生说：“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了谎。虽然踌躇了一下，但却感到自豪。”他们现在冒着危险展开民主救国宪章的签名运动。三月二十三日，金大中的夫人也为这个宪章受到审讯。首都女大打算四月六日举行示威，但事前遭到了镇压。四月七日韩国神学院举行了校内示威。监理教神学院也召开抗议集会，通过了民主救国宪章。

四月四日， 延世大学也准备举行示威， 但遭到了失败。汉城大学、梨花女大、天主教的西江大学和建国大学的计划也遭到了破坏。淑明女子大学响应校内广播的号召

进行了一齐穿白罩衫配黑裙子到校的斗争。据说，许多学生参加了这一斗争，斗争的目的是追悼民主之死，要求朴正熙下台。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四月十日夜晚，盗贼偷袭了咸锡宪的家。谁也都知道他家里没有可偷的东西，盗贼的目的显然是他的文件。这样，那天晚上用这种方法检查了他的所有文件。

在全国范围内对政治犯的审判在连续进行。在光州进行对第二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审判，在汉城永登浦法庭进行对去年十二月八日汉城大学法学系举行示威事件的审判。不论在哪个法庭上，所谓被告们都战胜了监禁和拷问的恐怖，没有失去谴责独裁的勇气。看样子，监视集会和个人的警察最近也疲惫不堪了。对于个人，他们要从解除宵禁的清晨四点起到开始宵禁的夜晚十二点进行监视。不然，谁知道那些监视对象什么时候溜出去干出什么来呢。我的一个朋友说他已经和他们亲近了，并笑着解释道：

“他们嘟囔说，一天只能睡四个小时。他们说如果不详细地报告监视对象到什么地方去干些什么事等，脑袋瓜就要搬家。中央情报部有时乘汽车来检查他们是否严密监视软禁在家里的人。他们的心理状态是很复杂的。有时哭丧着脸要我给他们找个适当的职业哩。我们只能憎恶掌权者，不能憎恨他们喽。对他们来说，没有别的糊口的办法啊。他们有时用非常尊敬的目光望着我，这未免使我感到尴尬。”

的确，我跟进行斗争的朋友见面时也常常不由自主地受到很大的感动。他们经受着无可言状的悲哀和痛苦，但他们在斗争中成长了，依然保持着从容不迫的精神，充满喜悦。从《朝鲜日报》撵出来的人们组织的斗争委员会，迎接斗争三周年发刊了小册子。作家李浩哲在这本小册子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容不迫》的文章。文章的末尾写道：

“有时候，不免要发脾气，不知不觉地性情暴燥起来。不过，越是这样，就越要把心放宽些，并要从容不迫地耐着性子等待。”

他们在斗争中所以能够保持从容不迫的精神，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自我反省和自我锻炼。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相信即使懦弱的民众离开他们，民众的心情是和他们的心情完全一样的，而且具有只憎恨不让民众过人的生活的掌权者的那种思想和自制精神。无力的他们脱离了民众，能做出什么事呢？他们不是因为热爱民众，才甘愿忍受那种痛苦的吗？

在他们中间，没有人埋怨不参加斗争的人。他们说：“只是留在大学罢了，我们的心还都是一样的。”我听到这句话，对他们异常宽大的心怀不禁肃然起敬。我和他们分手，在回路上想，即使他们在政治上遭到失败，这仍是一个伟大的收获，最后必将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这么一想，心里感到热呼呼的。

政府对基督教的措施，弄得一塌糊涂。针对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坚持批判的态度，政府指使十九个教派的代表组成联合团体。

看来，政府妄图利用十九个教派代表参加的集会炮制出一个代表韩国教会的联合团体。但是靠金钱活动的组织在我国一向是一时的组织。有一个教会领导人乐观地说，民众还是有分清那类人物的智慧的。有一个教会机关办的月刊杂志登载了《四·一九专刊》。 这在韩国最近的出版物是根本做不到的事。现在，由于当局迫使各企业不在这一杂志上登广告，这个杂志在出空白广告，并遭受全面的税务监视。要展开象《东亚日报》当时那样的空白广告斗争的年轻人被警察抓去了。

以复活节为中心的教会青年们的集会也毫不畏惧地谴责了对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的判决，并高呼了恢复民主。 他们要求释放“由于在耶稣的爱护下主张正义和真理而被监禁的人士”， 并宣誓作为信仰的联合团体继续坚持斗争。在这样的集会上，如果领导人被抓去，全体与会者就进行静坐斗争。四月九日下午，汉城西小门教会也召开了青年们的这种集会，许多中学和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参加了这个集会。有个人悄悄地对我说，最近在高等学校里也有人散发文件。 在汉城， 在韩国的这种“和平”外表的里面，这种抵抗正在掀起热潮。正因为如此，那么强大的掌权者竟惶惶不可终日。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能把我所掌握的许多材料全部介绍给读者。

据说，天主教方面三月二十八日在明洞圣堂做了特别弥撒，发表了《圣母请愿》。但因为对外保密， 它的内容不得而知。从《东亚日报》和《朝鲜日报》撵出来的记者们也都健在。三月十七日，被放逐两周年的这天，他们聚

集在泰和馆（中国饭馆），高呼了言论自由和民主万岁，并宣誓要斗争到底。只要召开这种集会，那些进行民主化运动的人士们和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人们的家属们也都前来参加。警察包围这个饭馆，调查了出入者的名字，甚至拍了照。但是，在这种集会上经常合唱这样的赞美歌："不论哪个民族哪个人，总有一天会下决心。真实和虚伪搏斗时，该站在哪一边？"

有许多教授被监禁的韩国神学院举行的示威，是有全体学生参加的，他们一致表示了决心。在他们发表的《苦难宣言》上，招笑似地竟然盖了堂堂的韩国神学院学生护国团的图章。有五个学生为此被抓去了。据说，他们将被起诉。大学正在停课中。他们提出的要求条件第一条写道：现政权要对一切事态负起责任总辞退。这种提法是不能算违反紧急措施的，所以他们将以犯反共法为理由被起诉。

汉城大学也在继续进行抵抗。四月十一日，以"汉城工业大学紧急救国学生大会"名义发表了《救国紧急决议宣言》，在宣言里的《我们的决心》一节写道：

一、我们坚信我们的行动是反映全国同学和全体韩民族的迫切要求的。

二、我们的行动，是不受任何主义的团体或党派的指使的，而且今后也将一概排斥那种可能性。

三、我们决不妥协，我们发誓将斗争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个人。

四月十二日，以“汉城大学紧急学生大会”名义发表了《四月宣言》。宣言附有《民主救国宪章》，和以“民主国民联合汉城大学结成推进会”名义支持它的文章。朴政权将更加暴力化，抵抗的火炬也决不会熄灭。今天，我应该报告的东西还很多，可是已经写了不少，发稿的时间也晚了一些，所以，我想最后传达一件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人们最近的悲惨遭遇，来结束这篇通讯。

被监禁的各阶层人们的家属联合起来结成了“良心犯及其家属会议”。三月二十二日对三·一宣言事件下了驳回上诉的判决的那天，他们发表了已在三月十七日起草的《良心犯及其家属会议宣言》。这个宣言申明，他们将斗争到“消除充满这个黑暗时代的悲哀、怨恨和痛苦，烧毁一切镇压人的良心的压迫者的魔爪时为止”。还同宣言一并发表了《韩国良心犯景况》，并宣布今后将毫不踌躇地揭露无视人权的残暴行径。

在三月二十六日，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人，除了金大中而外，其余的八个人分别被押到各地方监狱里去了。这可以说是一种狱中流放。

当局把他们押送到离事件发生的地方很远的外地去，为的是加倍地折磨他们。直到现在当局把他们的家属软禁在家里折磨了她们，这次又给她们带来了新的痛苦。既决犯在监狱里同外人的会见分几种，有一周一次的和一个月两次的，最坏的是一个月只有一次，寄给家属的信也限一个月只一次。对与三·一宣言事件有关的人只允许这个最坏的条件是不言而喻的。

在四月六日和十二日，家属们分成几个小组探访了这个地方的良心犯。我在这里介绍我听到的几个例子。

李文永教授被流放到从汉城乘高速公共汽车也需要七个小时才能到的顺天去了。从外面送给他的钱也不能超过三千圆。还不许送鸡蛋、牛奶、水果之类的东西。他的头已经剃光了，冬装给夺走了，穿着夏装挨冻。他根本不知道别的同志都分散在什么地方。他被监禁在只有一个人身长大的零点七五坪宽的 没有窗户的暗室里。 简直是 一座墓穴，里面只能容纳一个尸体，容不下一口棺材。这是平时用来惩罚罪犯的房间，但对李文永教授来说，它成了日常用的房间。李文永教授的夫人说，耶稣只过了一天的坟墓生活，但李文永教授要在那里过上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了。据说，李教授说他简直要发疯了。也不让他劳动，每天只允许不到十分钟的放风。夫人抗议说，这是要把人折磨成瞎子或疯子后逼死的最野蛮的刑法。

监狱内部已经军队化了。会见时间也不容许超过十分钟。会见时，三个监视员守着李文永教授，一个监视员守着夫人。因为隔着双层窗，很难听懂对方在说什么。为什么要干这种惨绝人寰的勾当呢，这可能是最上头的人憎恨他们直到现在进行的斗争，下令那样做的。特别是他们在狱中支持了金大中。据说，他们在政治上和信仰上给了他很大的影响。 可以说对这件事的报复用这种形式表现 出 来了。被流放到全州的文益焕牧师也被监禁在零点七五坪宽的牢房里。那里倒有窗户，但房间里冰冷，手受了冻伤，也得不到治疗。他说，他做瑜伽（古代印度语，一种身心

锻炼法），维持着身体，现在好不容易开始适应了。 他还谈着耶稣受难的事，说一定要忍耐到底。

尹攀熊牧师的情况最坏。他也被关在零点七五坪宽的牢房里。 他经常受看守的监视，不准躺下。 只要稍微一打盹，看守就大声吆喝，叫他端正姿势。这个大田监狱是收容共产主义思想犯的最残酷的地方。看守也全是出名的暴徒。他穿的内衣给夺走了，冷得直发抖。据说这位老牧师对夫人说：“看样子，我不能活着出狱了。 你不要把我当做丈夫，就当我已经死了吧。”

家属们三月底去探监的时候，都被撵回来了。理由是三月里大法院下判决之前已经会面了，所以违反一个月会见一次的规定。她们乘汽车到监狱的路上，汽车好几次被拦住，受了搜查。一到达目的地，就被几十个军人给包围了。当地的教会不能采取某种措施吗？ 据说， 天主教方面，由金红衣主教向各教会写了信，说不仅要为天主教圣职者而且也要为新教圣职者做祷告，并要做到所能做到的一切。

金大中因为患病，睡不好觉。据说，他的夫人打算提出抗议说，如果不容许找专医治疗，就把他处死。家属们对这样的最坏的状态向法务部提出了抗议，但他们竟敢回答说，连窗户也没有的牢房，在大韩民国的监狱里是没有的。家属们在这方面也要进行苦战了。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五日讯）

流言满天飞的日子

绝 食 斗 争

五月，连日日丽和煦。在韩国，的确有两个相反的历史在发展。一个是报纸上报道的历史，另一个是报纸上不能报道的所谓流言的历史。所谓不能报道的历史，是只要听一句说一句就被送进监狱的那种历史。

目前， 报纸上报道的历史大肆宣扬什么“除了战斗机以外的一切武器全由国内生产”，甚至说“准备出口部分武器”。这就是说，在大量生产武器方面也已经压倒了北方。对于武器的生产，一直是保密的，但是，美军撤退问题提出来以后，忽然做了这种报道。报纸上不能报道的流言，对此做了如下的回答：

“日美两国的军火工业集中在昌原。 日本和美国都由于国内情况，企图在这里向世界各国出口军火。这等于对越南战争的协助转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由于这种事，朴政权自以为它大大受到日本和美国军火贩子们的抬举。”

另外，报纸上报道的历史，最近几乎每天整版地报道有关“韩日大陆棚协定”的消息。报纸上说什么围绕这个协定，日本“拿批准弄鬼”啦；又说什么看来日本甚至要同北

方扩大交流啦；还说什么一九六五年签订韩日协定后，日本在同韩国的贸易中获得了七十七亿美元的利益，但日本却屡次对韩国表现出“轻视”和“背信弃义”的态度啦，等等。对这种报道，流言做了严厉的批判：

“朴政权为大陆棚问题非常焦躁不安。他们很想大肆宣传出石油，使国民抱期待后，借此演出一场鬼把戏，来闯过政治危机。并且企图投下大量资金开发海底资源，并由韩日两国适当地加以分享。他们几乎每天在报纸上宣扬大陆棚问题这个事实表明，如果发生政治危机，他们要再一次掀起反日运动。”

有一个记者朋友说，现在的统治阶层道德上太堕落了。因为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恶棍，所以任何勾当都能干得出来，而且也无法弄清在他们周围横行霸道的尽是些什么人。据他说，他们无条件地追加征收占税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的防卫税，还以防卫诚金的名目强迫人们捐款，这些巨额款项，实际上是防卫政权诚金，大部分用于中央情报部的工作费。有关这方面的财政是根本不公开的，说是因为与国防有关。他可能为了压抑自己激愤的心情，说了一个幽默的故事。他说：

“在延世大学，有一个学生边走边散发了传单。驻校的情报员们大吃一惊，赶上去把传单抢过来一看，原来净是些白纸，使得他们白瞪眼，无可奈何。这可以说是一种捉弄和威胁，但是，近来不写上内容也可以，就是拿一张白纸也可以充分沟通思想。”

金大中在狱中， 从五月七日起展开了 六天的 绝食斗争。在写这个事件之前，我想先介绍当时他为寄给国内外的朋友们写的信的内容：

一、我得知同志们和国内外人士们为我的绝食和健康担忧，因我无法谢绝这一盛情，“暂且停止”绝食。我虽绝食六天，但依然保持了健康，我想这完全是靠上帝和各位的热心关怀的，为此，我再次表示谢意。

二、但今后我要注视政府对蹂躏人权事态采取何种纠正对策。如果，政府不改正，我将随时随地展开斗争，维护人权。 我希望同志们也开始行动。 要牢记这样一种真理：即使有良心，如果没有见之于行动，那种良心必然会站到罪恶一边去。

三、所谓人权，本来是上帝赋予人的，所以它不是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做让步的那种权利。人权是不可侵犯的，维护和扩大人权，是人所不可推卸的义务。

我希望政府改正方向，走向民主化的道路。到那个时候，我将为国家不辞进行“对话”和“协助”。我再次表示谢意，并预祝各位身体健康。

金大中从五月七日起进行绝食斗争，开初只用了些水和水果。但从九日起什么也没有吃。他的夫人也赶到位于韩国最南端的晋州，请求监狱长允许她和他会面，说她可以劝他停止绝食，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金大中的夫人和家属提出抗议说，“监狱长在等待金大中死掉”，便在监狱门前，“坐在地上”开始了绝食斗争。这时五个律师也参加

了这一斗争。不知何时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六十多个人也和他们采取了同一行动。由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而坐牢的人们的夫人也都赶来参加了这场斗争。他的朋友们也听到这一消息，从汉城和地方赶来了。当局深怕参加绝食斗争的人会越发多起来，在晋州一带宣布了特别戒严令，检查所有的行人。金寿焕红衣主教给金大中写了如下的短短的亲笔信：

兄弟！你的身体不只是属于你个人的，而且是属于我国国民的。保重你的身体，是报答国民的期待的。切望停止绝食。

看来，中央情报部也不能不把这封信转交给他了，而且允许夫人和他见面。夫人劝金大中说："不只是为你一个人，要为和你一起绝食的朋友着想，希望你停止绝食。"金大中为了不再连累朋友们受苦，接受了她的劝告。听说，他的夫人考虑今后会发生紧急事态，正在打算迁居晋州。那天晚上，警察到金大中的家属和律师们住的饭店，占据了他们房间的左右隔壁房间。到了半夜，人们听到"着火啦！着火啦！"的喊声都惊醒了。就是警察占的那个房间里失了火，但谁也说不清失火的原因。

谈金大中的绝食斗争一事，当然是属于第一流的流言。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而坐牢的人们的景况，不能让人乐观。被关在韩国南端金海监狱的文正铉神父，目前患骨髓炎和神经痛受折磨。他曾经在人民革命党事件有关者八人被处刑时进行反抗受了伤，现在它复发日渐恶化

了。据说，牢房里潮气很重，被褥都湿渌渌的，更加影响了他的健康。据说，他的作修女的妹妹去探监后，向大家报告哥哥的景况时，不停地流下了眼泪。

文东焕牧师从西南端的港都木浦移到中部地区的清州来了。因为木浦是金大中的故乡，又是基督教势力很强的地方，当局深怕他会受到市民的同情。文东焕牧师也患高血压和神经痛，正受折磨。当局不允许他进行劳动，只允许他一天做十分钟的体操。他长期没能看书，到了最近才允许他一周看三本书。

李文永教授的夫人到韩国南端的顺天去探监后谈的那里的情况，确实是感动人的。夫人只身长途跋涉，精疲力尽了。可是当她赶到那里时，不禁感到惊讶，那里已有二十多名当地的人赶来，和她一起行动并勉励了她。无论到哪里，都有不屈服于暴力的少数人。

由于在民主救国宪章上签名，咸锡宪先生也被带到中央情报部了。据说，他到那里拒绝坐在椅子上，而在地板上正襟危坐。他说，这样做，并非因为是在审判官面前，而是因为他是对国民犯下罪的罪人。在苦难中，也许人们不能不愈益带宗教性质的吧。

春日琐记

近来，我身体不大舒服，所以今天我想只简单地报道一些周围发生的事件，请原谅。

三月和四月这个学生们抵抗的季节，好象过去了。朴政权可能为此吁了一口气。一到夏天，学生们的抵抗也一时停止，所以直到秋天可有一段闲暇了。朴政权就这样一个一个地闯过难关，苟延残喘。抵抗的人们对卡特总统的期待和由于印度在野党在竞选中的胜利而感到的喜悦也在渐渐消失。抵抗的人们已经精疲力尽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气馁。

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三点，有一百五十名汉城地区基督教青年在明洞，冒着倾盆大雨举行了示威。他们高呼着和平、自由、民主万岁前进到明洞圣堂前。他们同机动警察发生冲突，有两个青年倒地，昏过去了。有很多青年被捕坐牢，现在剩下的只有青年会长一个人。

对那些促进民主救国宪章签名运动的人和在宪章上签名的人依然肆行带走、监禁、恐怖等暴行。由于所谓登山事故而身亡的张俊河的儿子，在半夜里遭到来历不明的怪汉的暴行。他的外表没有伤痕，然而，颊骨和下巴骨被打折，头盖骨出了裂痕。他的伤势很重，住院四个月，治疗一年以上才能复原。张俊河的家属都给拆散了。他的夫人卖零工，在拖鞋上画花纹，每双三圆，一天挣几百圆，勉强糊口度日。民主救国宪章签名运动本部，于四月二十六日以《要停止拷问和恐怖行为!》为题发表了声明。声明记述了上述恐怖事件，还谈到了如下的事实：

“最近， 警察以学生策划示威为罪名逮捕梨花女大学生，至少对五名以上的学生肆行极其恶毒的‘水刑’这个事实已大白于世。近来，当局残酷地对待被捕学生，对他们

进行殴打、拷问等的许许多多事件，已广为知晓，这个事件不过是这些无数事例中的一个。”

该声明说， 这些事件是朴政权自行暴露它“是个赤裸裸的暴力集团”的明证。声明在结尾中说：

“如果这种事态再持续下去，我们全体国民将动员一切力量，采用可能的一切方法和手段坚决进行抵抗。朴政权如果不希望被那些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民众的爆发性愤怒所打倒，就必须立即停止一切愚蠢的暴压行为，虚心倾听国民的要求！必须永远停止拷问和恐怖行为！必须立即释放被逮捕和拘留的所有青年和民主人士！”

可以说，这个声明在最近发表的声明中是个语气最强硬的。它的语气所以这样强硬，是有它的理由的。警察在梨花女大抓去了十三名学生，强使她们仰卧之后，一个人骑在身上压着，另一个人就往嘴里灌了水。据说她们之中有五个人被强奸。这件事为本人着想，是不好公开的。目前，有两名被起诉，因犯号码是5209号和5235号。他们对女学生竟干出这种野蛮暴行的目的在于：惩一儆百，给妇女以致命的打击，逼使女学生抱恐惧心，以便事先挫败抵抗运动。但是，韩国有光辉的妇女反抗运动的传统。过去她们的抵抗，往往触发了整个抵抗运动。

从抵抗的四月以后，如今有许多年轻人遭受这种苦难。仅据教会方面掌握的材料，最近被逮捕的学生和牧师至少有四十名。据出狱的人们说，目前监狱里有许多完全不被人知晓的无名人士。

中央情报部为了更残酷地处理这些所谓违反紧急措施

的政治犯，最近派了自己人当狱吏和看守。因此，监狱里的情况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变得更坏了。他们不但严加监视，而且加强了罚规。为了切断囚犯之间的联系，在牢房里又砌了混凝土墙。他们不允许政治犯做劳动，一天仅有的十分钟的放风时间也把他们一个一个分离开来，派看守监视。有时，甚至把政治犯关进押着凶犯的牢房里，使他们遭受无可言状的虐待。

他们对无名人士干下如此恶毒的勾当，而对著名人士则不大触动，造成镇压缓和下来的假象。因此，有很多人表示忧虑，如果美军撤走了，他们就封锁消息，不使它传到海外之后，把全国变成令人可怕的黑暗社会。

四月以后，对学校的监察更加强。中央情报部的官员常驻学校，对那些他们认为会闹出事的学生，个别地进行监视。如果认为有必要，就随时把他们带到警察署或中央情报部去。 他们还随便出入所有集会， 发生不大点的事情，也用望远镜头拍照下来，进一步深入调查。警察、中央情报部、学校的训导机构，完全变成了一体。有无数的情报员打进梨花女大，女情报员和便衣警察冒充学生。整个学校笼罩着恐怖气氛。

在这种情况下，延世大学的学生又在五月十二日举行了示威。为纪念建校纪念日，做集体劳动时，他们突然高呼了废除维新体制，废除紧急措施。为此，有五名学生被捕了。四月下旬，在高丽大学也有五名学生被捕了。

他们因为不能死心，不，因为不应该死心，所以继续展开斗争，付出这种牺牲。单单为那些已经知名的坐牢的

学生和牧师进行辩护，就需要五百多万圆的费用，基督教方面为这件事大伤脑筋。律师如果为政治犯作辩护，就要受压力，再不能受理其他案件。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有关的人们的家属也因经济上的困难受苦。为支援在全国范围内与日俱增的牺牲者，教会方面的支援团体已经精疲力尽了。由于镇压，国内的支援几乎断绝了。

在一般民众中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由于无足轻重的事被捕下狱。他们喝着酒，谈起不平不满来，就无意中涉及政治问题。这是韩国人很早以来就使用的清净心神的权宜办法。据说，最近由于把“朴正熙总统”叫做“朴正熙”而被逮走的例子很多。

近来，地方的牧师因失言而被捕的例子急剧增加。有的牧师受十五年求刑，被判五年徒刑，正在服刑，他是作批判性说教犯了这个罪的。当局审讯他时，不由分说，一上来就给他施行了电刑，并给他扣上颠复国家阴谋罪起诉。据说，他本来身体很健壮，可是如今心脏和肾脏得了病，并因血压高在狱中受折磨。

有一个保守派的年轻牧师，在星期天的礼拜快要结束时，只说了一句“目前我国面临严重的危机， 大家为此祷告吧”就被逮捕受了电刑。 他是传播福音的善良的牧师，靠组织地方的集会维持生活，并拿自己的收入资助贫穷的传教士。

五月七日， 南荣尼龙厂工人要求提高工资举行了罢工。那时资方答应改善待遇，所以工人们停止了罢工。但资方自食其言，没有履行诺言。于是，工人们于五月十七

日再次举行了罢工。这回资方和当局狼狈为奸，收买男工袭击了女工。结果，在这次的罢工中被捕的有十四名女工。告诉我这一事件的那个朋友，最后谈自己的见解，说：

“年轻的人们虽都听到这种可怕的消息， 但他们还是抱有某种悲壮的正义感的。我曾参加过某市举行的青年集会。在四百名左右的与会者中间可能有不少的中央情报部成员。但我第一次体验那么热情充沛的气氛。他们唱的赞美歌，震撼了天地。曾坐过牢的演讲者登台还没有开口，全场就爆发了热烈的掌声。 讲话刚一结束， 又响起了掌声，掌声一浪高一浪， 经久不息， 好象要求再来一个似的。看到这种场面，我自己觉得获得了新的力量。”

在四月的复活节前夕，韩国神学院学生发表《苦难宣言》，有五名学生被捕，以违反反共法为理由被起诉。 这个学院这次又发生了事件。五月十一日上午，他们再次提出了废除维新宪法，释放民主人士，朴政权下台等要求。这里介绍他们的主张：

“无视走向民主的世界趋势， 热中于固守自己一人独裁堡垒的现政权，再不要欺骗自己、国民和全世界了，应该摘掉假面具，悔过自新。如果不这样做，今后的事态将作为韩国历史上的污点，受到严厉的审判。我们要求你们早日打碎政治神话的虚构，恢复自己真正的面貌，在这个土地上实现民主和自由。”

当一个学生在学校礼拜堂突然宣读这个声明时，校长赶来夺走了声明。当第二个学生继续宣读它时，又叫教授

抢去了。到第三个学生才把它读完，这时，学生们都欢呼起来了。教授们请求学生说，要对这件事保守秘密，不要把事情闹大。但是，不知是谁已向当局报告，有三个学生被捕了。据风闻，教授们背叛学生，向当局告了密。

根据文教部的指示，与《苦难宣言》有关的五个学生也受了退学处分。据说，对这件事虽然在校内保守了秘密，但以校长的名义已向文教部提出了报告。给我谈这件事的一个年轻人说：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说，这次也是教授报告的。有一个学生受审时，凑巧那个教授用电话同中央情报部取得联系。教授和牧师当中有进行斗争的，可也有这样告密的啊！今后怎么办才好呢？张俊河、朴炯圭牧师等人的儿子也都遭到了暴行。难道已经到了第二代人战斗的时候了吗？"

金大中的秘书无时不在被带到中央情报部或警察署去。从国会撵出来的前议员金玉仙，在四月二十七日的第二审中，在不确认被告，也不问一句话的情况下，受到了驳回上诉的判决。这样她被扣上违反选举法的罪名，按第一审被判了一年徒刑，缓刑二年。

他们所以这样进行闪电式的审判，是有它的原因的。由于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郑一亨被撵出了国会，所以，在汉城市钟路和中区的选区可能会进行补选。他们深怕六月或七月在这个汉城中心地区进行补选时，如果曾因为谴责朴政权而被撵出国会的金玉仙出马，就会大受人们

的欢迎。朴正熙为了继续掌权，不能不这样细心地考虑问题。

韩国基督 教教会 协议会 就韩国的保安问题 和人权问题，曾给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听说，对此，卡特总统命副国务卿帮办豪尔布洛克约在一周前写来了复信。复信里说的不外是一些虚套子词令。 他说："对韩国的保安负责的条件下，考虑撤走美军问题""对韩国的人权问题表示很大的关心""两国关系将会进一步加深"等等。 也许是因为过去不曾有过这种事，朴政权倒突然对基督教方面表示好意，要和他们进行对话。有一个与教会有关系的人说，这反而使人厌恶生惧，他说：

"传说，他们同美国做了某种交易。 说什么要在六月释放政治犯，十月举行国民投票，到那个时候，多数国民支持朴正熙就更好，如得不到支持就让位，等等。如果这是真的话，朴正熙就会针对这一情况将疯狂展开工作。"

这可以说是又一个道地的幻想性流言。但是，这种流言，可能使朴正熙给活着的人们的思想领域提出"新的伦理"。近来，他可能认为"新村运动"这句话已经褪色，不能吸引人了，于是提倡忠孝，开展了"抱新心"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动员全体国民举行了"抱新心"大会。朴正熙的年轻女儿出面发表训话，说："抱新心运动的特点是： 根据今天的现实，恢复我们民族的基本精神——忠孝思想，为我们社会确立美好的精神价值和坚定的道德观打好基础。"

难道这个国家的国民，能有心理上的宽裕去虚心接受这个年轻女人的训话吗？很明显，这种"大会式"的伦理运

动，同基督教的伦理发生了冲突，那是给人带来痛苦的孤立的伦理。我总觉得，在全罗北道全州发生的事件，证明朴正熙和他的女儿提倡的伦理运动决不会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在全州附近金堤郡有一个牧师，名叫姜熙南，他已年近六十。他甚至反对已电子计算机化了的居民登记。他认为从一九七二年以后，朴正熙不再是总统了，他不过是自命的总统。如有朋友说“朴总统”，他就提醒他说不要叫总统了。因为他公开地讲这种话，人们把他看做是“疯子”，中央情报部也就不触犯他了。可是，他在五月五日的儿童之日，闹起了大事件。

那天，民主统一党全罗北道地方党支部在全州召开了改组大会。 姜熙南牧师应邀参加会议致贺辞。 在他之前致辞的人，都照例给朴正熙加了总统称号。姜牧师说，他曾对这个党寄与了一些期待，可是今天不禁大失所望。他诘问道：“究竟怎么能把他叫做总统呢？”他列举了他不能把朴正熙叫做总统的理由，他说，朴正熙多次搞了不道德的结婚，他乱搞女人之后，把她们撵掉或杀害了；青瓦台竟堕落成了卖淫窟。他说，由这种不道德的人统治的这个国家，该有多么不幸，朴正熙就是为掩盖自己的罪过，实行独裁的。

当然，姜牧师被捕了。全州警察署长和中央情报部支部长也为之被革职了。还有一些地方长官也负起放任他继续讲话的责任，受了处分。

后来，全罗北道老会（教区总会）采取的态度，更是令人吃惊。五月十三日，老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参加会议

的代表有一百五十名。由于警察的强行阻止，姜牧师所属的那个教会的代表未能参加。会议全场一致通过了决议，说：姜牧师的行动完全符合长老派的信仰；从这个教会关于社会责任的宣言精神来看，他起了预言家的作用。并指出，所有的牧师必须学习他的态度，豁出信仰和生命去证明他是对的。

这个老会组织了特别对策委员会，并决定，闭会后举行示威，到中央情报部支部去要求同姜牧师会面。但是机动警察反锁了教堂的门，不让他们出去。牧师们提出抗议说，警察有什么权利，不经牧师的允许随便锁上教堂的门。后来，警察要给他们提供公共汽车，但他们拒绝这一建议，乘坐出租汽车去了。虽然他们在中央情报部没能和姜牧师会面，但确实大闹了一番。

中央情报部至今一直为尽可能不扩大问题而作出了努力，但看来，他们这回可能是不得已了。教会方面决心开祷告会等继续展开斗争。地方的人们听到这个消息，说："朴正熙选错了对手。"尽管有强大的刀枪，但基督教还是不好惹的劲敌。

这样，无名的地方牧师们被捕并受痛苦。听说，有的牧师说他甘愿殉教。看来，人只要抱有崇高的理念和深厚的爱，就会变成如此高尚的人。为什么朴政权要开展抱新心运动，把这一国家赶进如此地步呢？难道真的没有办法解决这一可恶的对立吗？虽然五月的空气如此清爽芬芳。

（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五日讯）

附　　录

日本政治理论杂志《世界》（一九七七年第五期），以《三·一法庭的语录》为题刊载了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事件被监禁的南朝鲜民主人士在法庭上作的最后申述。

下面介绍他们的部分申述。

“三·一法庭”的语录

——十一名被告的最后申述——

执政者在杀害有良心的年轻人

尹潽善

首先，我要求审判长给我们解决眼前的问题，希望给被告席和旁听席摆上较好的椅子。 在座的人包括内外记者在内，好象是都在受审讯。即使是被告，也不应该受到非国民的、非人的待遇啊。况且现在还没有下有罪的判决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只有好心待人，人家也会好心待你。我们知道了法院是一个日本殖民统治残余最浓厚的地方。这个国家应该成为一个人人都平等的国家，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受国民以下的待遇。审判长你也该走下来到这里坐一坐。除了我们这些所谓被告而外，都在使用麦克风。被告们都因为坐牢身体衰弱了，为什么不能使用麦克风呢？难道旁听者们只该听你们的话，不该听我们的呼声吗？是和财政有关的吗（笑）。那么由我们掏腰包安一两个麦克风来用吧（笑）。 连这些事也要由政治来干预吗？

我从发表三•一民主救国宣言的时候起，就豁出了生

命。现在也没有变心。老实说，我根本不理睬检察官的起诉和求刑。因为那些东西不过是一张连最低水平的法庭文件也不如的废纸。那里找不到一点点的真实。据说这个国家有言论自由，这是弥天大谎。连三岁的小孩也都知道，而且全世界都知道这是谎话。大韩民国宪法如有错的地方，本国国民为什么不能提出呢？审判长你来回答。这简直太违背常理了。难道只有美国人或日本人才有权提它吗？我到了这个法庭，感受到这个国家的一切矛盾全部集中在这里。我是被求刑十年徒刑的人，但是我并不怕它，也不想为此作反省，只是坚定决心，要早日扭转这种丢脸的现状。我最近接到一张美国的维护人权团体勉励我斗争的奖状。对我，这个国家判处徒刑，而那个国家却授予奖状。毫无疑问，美国和韩国两者中间分明有一方是作错了的。死刑，一百年徒刑，都算不了什么。我为国家着想，在这无法无天的世上说正当的话，希望执政者接受它，哪怕是一句也好，但这却被说成是策划颠复国家的话了。人是拿自己的想法去衡量别人的。检察官平时就抱有那种想法吗？我们可从未想过那种事。看样子，你企图把你平素的想法强加在我们身上。最近，政府大肆宣扬，要清除不法行为，但是制造不法行为的罪魁祸首，不就是政府吗？就象在选举中干出种种不法行为，却给在野党扣上违背选举法的帽子一样。执政者的不法行为，不是犯罪行为吗？政府叫嚷什么不法行为呀什么的，到底要威胁谁呢？司法部门也真叫人可怕。你们也知道最近在法庭发生的有关一个大学生的事件。把学生关进暗室里三四十天，告诉他这

里是平壤，这里是元山。受到这样的训练以后，那个学生说，象到过北方一样熟悉北方了。如果不好好接受那种训练，就给他服药，打药针。这样，他就按照命令行动了。但他不是在这个法庭上要审判长看看他的身子的吗！执政者竟这样地杀害有良心的年轻人。难道大韩民国的警察、情报部和法庭是要把国民弄成共产党人的地方吗？政府企图给国民灌输共产主义恐怖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把爱国的学生或志士弄成共产党，闹得好象这个国家里有很多很多的共产主义者似的。要是有人批判了政府，就说他是共产党。大韩民国是个共产党制造厂吗？我已经老了，说不定明天就会死去。可是，这个国家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呢？现在我们在这个法庭上体验着这个国家的营私舞弊。不管我们被判死刑或一百年徒刑，没有一个人相信这个审判是对的。你们的心也可能很难过。我们应该共同开展摆脱这种状态的斗争。

在“韩国”的现实中，所謂事实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郑 一 亨

检察方面指出， 农村通过新村运动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但宣言歪曲了这种事实。几个月前我和长官们一起应某一个“模范村”的邀请到那里去了。他们拿出解说略图给

我们说明了搞新村运动的结果目前农民的生活正在怎样提高。这是充满美梦的一份报告。后来我个别地问了一下，那个村庄有没有把子女送进大学或高等学校念书的，他们说一个也没有。我说，那末这不是跟刚才做的报告内容不符吗？他们回答说，凡是报告不都是那样吗。在韩国的现实中，所谓事实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有许多爱国者在这个法庭上受过审判。三•一运动的三十三位领导人也在这里受过审判。我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末期，因为反对革新教团体（日本式基督教——译者注），被判过徒刑。但那个审判下的判决只不过是两三年的徒刑。可是如今，在解放了的祖国，前总统、总统候选人、神父、牧师，为什么要在我们民族的手下遭受如此残酷的刑罚呢？在法庭周围好象有敌人打进来似的，布置了警戒网。要是不丢掉这种憎恨，执政者就不能恢复正常的状态。

真的要继续推行这种暴政吗？

李兑荣

我们虽然获得了解放，但处在这样的现实之中，对此，只有感到羞耻。当局现在也主张什么我国应走向民主的道路，但是把民主主义者拉到这个法庭上进行审判。这是令人恸哭的事情。执政者迫使这个民族滚落到这样的境

地。

作为国家主人的国民批评自己政府的错误，有什么不对呢？不正是因为没有这样的批评，国家的情况才日渐恶化吗？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妇女也发表了有关妇女权利的宣言。结果她们也上断头台英勇就义了，那时她们大声疾呼："难道只有上断头台的权利，没有说话和生存的权利的就是妇女吗?"从那以后过了一百八十年的今天，这个国家为什么要重演过时的脚本，重蹈复辙呢。

检察官说，因为我们的主张违背了国民的意志，所以是反对国家的。金大中先生说，要进行公正的国民投票来确认国民的意志。但我认为那是不必要的。我在这三百天当中，会见了各阶层的人和各行各业的人。他们都说："这是怎么回事。""这算犯了什么罪。""那是举世皆知的啊。""这个国家就是恣意妄行。""真叫人不过意，您该多么受苦呀。"现在政府为了维持政权，拼命地压迫这样的国民。

这个国家的政府，迫使国民保持沉默。说这样做的理由是南北处于对峙状态。那么，直到消除南北对峙状态，实现统一的那天，要我们满足于这样的生活吗？难道让我们对残酷蹂躏人权的现实感到满足，对给贫穷的人无条件地扣上共产主义者的帽子的现实也感到满足吗？从地理学上看，只要东方和西方的对立持续，这个国家的民族悲剧也许是无可消除的。那么说，只要这种不幸存在，就要永远推行暴政吗？

掌权者们说，如果说这个国家里有资源，那只是人，但他们却不想过问人的将来。象狼狗那样的锐敏的狗，如

果只给它吃的东西，放任不管，那么它就丧失它本来的优秀的素质。我看到这一事实深感惊讶。何况人是有灵魂的存在，只有最大限度地发动一切器官和机能，人才能具有无限的能力。假若人遭受压制不能说话，闭着眼，垂头丧气，蹑手蹑脚地走路，那么，一切器官和机能就会衰退，判断力也会迟钝，到头来成为很少关心事物，对一切采取旁观态度的人。失去欲望，断念一切的情绪占上风，这些就会变为他的属性。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

去年十二月十日，罗马法王在《给全世界领导人的和平信》中指出："在使全体市民集体不能开口说话的地方，就不会有对维持秩序有好处的事，只能有可耻的压制形式横行。"如今，这个国家的国民在压迫下，感情迟呆了，良心也匿迹了。要使这种反常现象恢复正常状态，这要比政府所说的保安重要好几千倍哩！

我不是不理解检察官的立场。可是如果按照你的求刑下判决，结果会怎样呢？ 我的丈夫是国会议员， 我是律师。就是被判为缓期执行，我们俩也要退出现职。也可以说是名誉退伍吧。可是你要给我们判七年徒刑。我的丈夫已经六十九岁，我是六十二岁， 如果两个人都坐牢， 那么，这对我们俩来说是无异于服终身刑了。我们被关进监狱的瞬间就是我们与世永别的时刻。问题在于检察官的这种残忍性。我的丈夫在日本统治下也常常被捕入狱。我是帮助了他的秘密活动的。可是，日本帝国主义检察官只起诉了丈夫，没有触动我和我的孩子们。可是，今天在获得独立的这个国家里，同胞检察官把求刑十年、七年徒刑的事

当做是家常便饭。你以为那十年期间是和学生的就学期间一样的吗？ 问题在于不把人看 做 是人。简直叫人不寒而栗。

我们对于审判官还寄予一点期待。我可以理解你为难的立场。如果下了公正的判断，你就会遭很大的殃；如果辜负我们的期待，你就会免不了历史的审判。可是，你不应该把无辜的人判为有罪的人。难道就不能精明地主持正义？要这样做，就要有很大的勇气。

我是从军事政变当时起就反对这个“政权”的

咸 锡 宪

首先谈一谈我对这个审判的感想。一句话，水平之低劣简直无可比拟。看来该把审判的水平提高一步。审判如何，且不去管它，为把这个国家交给那类掌权者，不禁对它的将来深感忧虑。我和在场的审判官和检察官没有个人关系能够忠告你们，但如果你们是我的朋友，我就很想劝你们提出辞呈。你们居然摊开这等低劣的审判把戏，还不感到羞惭吗？直到现在你们还没有辞退，但现在也好，应该负起对以往的责任辞去现职才对。为什么犹豫不决呢？是担心家属吗？是考虑退职金吗？你们如果为活命而抛弃了良心，国家可就会灭亡的。 检察官说， 有国家才有良

心。不对，有良心才有国家。这个国家最有良心的人正在受最没有良心的人的审判。现在剩下的只是些只要给了钱就象饴糖一样可以由你随便捏弄的家伙。这个政府不能录用不能拿钱收买的耿直的人。我是从一九六一年军事政变当时起就反对这个政权的。因为我认为军人们发动政变掌握权力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发动政变的时候， 报纸报道说，发生了应有的事变。当然最近的报纸成了叫自己豢养的小狗咬伤了脚跟的样子。但是当时民众是反对这个政权的。由于得不到民众的支持，这个政权就越来越采取强硬的政策，抛出了什么维新宪法、紧急措施之类的东西。

这个政权，撒谎撒得太厉害。发动军事政变时说，完成了任务就要重返军队，但没有一个人那样做。又说，要消除营私舞弊，但现在营私舞弊竟天文数字般增加了。这个政权根本没有理智。这是因为这个政权的头头就是“大日本帝国”军队出身。他在日本军队里度过了年轻的时代，如今也发扬所谓日本军队的体罚传统。他们还非常憎恨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就象过去日本军队的农民出身下士官做的一样。由于他们的那种残忍性，过去有多么多的年轻人在军队里失去了生命啊！连他们的名字都没给留下来。没有理智的刚烈的意志，是必然要促使人们走向灭亡的。

因为没有理智， 这个政权也就没有哲学。 既没有理论，也没有思想，怎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呢。他没有人品，没有学问，没有思想。如果说有什么东西，那只是武器。在发动军事政变的头头中依然做中心人物的不只是一个人吗？他既没有度量， 也没有谦德。 这样的掌权者竟占位

十五年之久，这确实是一个奇迹。

在这个政权里的尽是些满脑子功名主义的家伙。他们唯以讨好主子为是，只顾狗苟蝇营，哪里还顾得上考虑别人的批评。自从这个政权炮制出来以后，国民在它的皮鞭下没有一天过平安的日子。他们委靡不振，一直走后退的道路。被这个政权录用的人，无例外地都是恶棍。善良的人是回避这个政权的。他们不知道历史，也不关心民族的过去和将来，只顾暂时的弥缝策。只为怎样才能填饱自己的肚子，怎样才能继续维持舞弊势力而动脑筋。

在这样的环境里，反省自己的过错是不可能的。执政十五年来，没有一次承认自己的过错，作过反省。所以，现实越来越恶化了。他们向日本军人学了不少的东西，但就是没有学到日本军人犯错误时，负疚剖腹自杀的那种精神。除了这个以外，他们学的都是日本军人那一套。

目前，韩国基督教和掌权者进行斗争。不知为什么，它成了在亚洲最有力量的基督教。我虽不能算是笃信者，但还是一个基督教徒，所以说这种话，未免有点顾虑。说起来，三•一独立运动和基督教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指参加这个运动的人数和组织情况说的。那种精神和气势，离开基督教是不可设想的。现在是把那样的基督教徒说成是共产主义者的时代。一九七四年发生的民青学联事件是基督教学生团体以团体的名义堂堂参加的重大事件。可是政府大肆叫嚷什么它是策划建立红色工农政权的共产主义革命。到底他们为所谓“革命”从“共产党”那里接受了多少资金呢？为什么不能公开那笔款项呢？和我有书信来往

的一个青年，被抓到中央情报部去受尽严刑拷打后被撵出了工作岗位。据说其理由是他和咸锡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打交道。

一九六三年以来，学生们继续举行示威。朴政权说，这是学生们由于不努力学习而胡闹的。他们不懂历史。这个民族在压迫下长期保持了沉默，但一旦站起来，那是可怕的。为了避免这种事态的发生而要求搞政治的人作反省的事，在这个国家却成了叛国大罪。

难道“维新宪法”也属于法律范畴吗？

徐 南 同

我不是法律专家，因此对它懂的不多，但我很想谈一谈法律上的见解。 当我琢磨这个审判能下什么样的 判 决时，我的脑海里浮现了三种可能。

第一，可能按照检察官的起诉，对我判扇动民众起义之罪。可是，到底谁希望产生民众起义那样的事态和随之而来的政治危机呢？ 如果下那样的判决， 它将是历史上“错误的判决”。

第二，可能判我歪曲了事实。张源宗教授作了实在叫人不愉快的证言。他说，我们在经济问题上歪曲了事实。他主张，六十亿至七十亿美元的外国资本一旦流进我国，它就原封不动地成为国内资本。这不是证言，而是魔术师的

鬼话，是暴露自己的无知和不负责任的鬼话。他虽然承认了工人和农民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但硬说他们从没有受过剥削。如果用这样的逻辑说什么三·一民主救国宣言歪曲了事实，那么这也将是历史上错误的判决。

要是不下这种判决，第三，就该说我们诽谤了紧急措施第九号，扇动了维新宪法的废除。我们并没有主张废除维新宪法。只是主张了修改维新宪法。也没有诽谤过紧急措施。尽管如此，如果硬给我扣上上述的罪名，我就认为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从良心上，在法律面前也毫不感到羞愧。这是因为我想起了旧约圣书箴言中的如下的词句："为了闭口无言的人，为了所有孤儿的呼吁，你应该开口说话。要开口作出正确的审判，实现穷人和受苦人的呼吁。"我相信上帝提拔我代表被排斥的、 被压迫的人说话。 我本应该在被撵出大学以前批评紧急措施和维新宪法的，但我没能开口说话。这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勇气。如果这次的判决，意料之外地把我的态度说成是有勇气的态度，那么将感到光荣，欣然接受刑罚。

我在第一审时不是也曾提出，把紧急措施当做法律是否妥当的问题的吗?我看,它不能属于法律范畴。这是强者对弱者的暴力。如今一般认为，人权这个词里面也包含着抵抗权。然而，在紧急措施下，不承认任何抵抗权，一切都绝对化了。检察官所代表的法律可能是成文法。审判官应该站在与此不同的立场上，考虑自然法和抵抗权等。所以我认为法庭是神圣的，可是如果根本找不到这一光荣的法律精神，那不就是非常可怕的事吗？对我们的审判将以

这个最后申述告终。即将宣告判决的这个审判，可以说是对三个审判官的审判。刚才我援引的箴言中的一句，正是针对审判官说的一席话。

中央情报部是镇压人权的工具

咸世雄

我在神学中研究了关于象征的问题。我要在这里打一个比方。有一天夜晚，一只蝙蝠飞进了鸡窝。两三天后，这只蝙蝠引进了老鼠和跳蚤之类的寄生虫。这样一来，一到夜晚，鸡就不能入睡。鸡认为在蝙蝠的支配下无法活下去。于是，鸡恳求蝙蝠，要它无论如何迁到别处去。但是蝙蝠说，这是歪曲事实的，是流言蜚语，是违反紧急措施的。结果，鸡被起诉，受了刑讯。（在这里，他的话一时被中断了，因为认为蝙蝠是影射朴正熙的）

在人权被蹂躏的社会里受审判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中央情报部是镇压人权的工具，但他们却不知道实际上他们的人权遭到蹂躏。现在，他们非人地被那些认为政权一垮台就保不住自己生命的少数患被害狂症者所利用。我们通过第一审和第二审深深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受审判是多么无聊。 我要对诗人金芝河的问题谈一句。 一九六四年发生了所谓人民革命党事件。当时，公安部检察官主张人民革命党是不存在的， 决定不起诉了。 当上级对此施加

压力时，检察官们就提出了辞呈。这样就闹成检察官抗命事件， 在国会上也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了。 对这个事实（在所谓第二次人民革命党事件当时），由奥格牧师、希脑特神父和我们天主教祭司团进行调查，发表了调查结果。金芝河不过是根据这份报告在报纸上写了人民革命党事件是捏造的。当时的检察官们宣布，不能昧着良心，把无罪的人弄成有罪的人。现在，我非常怀念那样的检察官。

一九七三年汉城大学崔钟吉教授在中央情报部受刑讯时丧了命。他的死因还没有交代清楚。李承晚统治时期也有过这样的事件，掌权者被打倒后才查明了真相。崔教授事件也和这一样，总有一天要查明他的死因，惩罚祸首。

我怨自己托生为“韩国”的女人

李 愚 贞

在第一审时，检察官给我们扣上了扇动民众、扇动内乱的罪。那时我们申明，这是不符合事实的，而且既没有证据，也没有条件那样做。但是在这次的第二审中，检察官也说了同样的话。金芝河的问题也一样，他本人主张他是道地的自由主义者，但是检察官依然硬说他是共产主义者。还有，他们把教员们关进地下室里肆行了四十天的严刑拷打，强迫他们承认他们是共产主义者，甚至逼他们，说什么在审讯室承认，到法庭加以否认不就行了吗。在这

样的政府之下怎能放心地过日子呢?

在政府管辖之下，打着所谓获取外汇的幌子搞妓女观光和卖淫观光。这是要以出卖自己女儿肉体为代价谋求祖国的繁荣的行径，我们对这种思考方式表示最大的愤慨。杂志《时代》第十二期刊载了关于亡命国外的金相根参赞的消息。据说，为了收买美国国会议员，花了数万美元。还强迫留美的女学生招待他们，并和他们同寝。甚至威胁说，如不答应，就把她们撵回本国去。在这个国家里，谁是可以信靠的呢? 谁也不能放心地把女儿送到外国去留学。我实在怨自己托生为大韩民国的女人。

我做了二十年的教员,而如今被撵出来了。那时,我体验到的大学情况实在是令人寒心的。大学里笼罩着教员和学生互相猜忌的可怕的气氛。他们都惶惶不安，深怕对方向当局告密。学生的创造精神惨遭摧残，成了唯命是从的傀儡。不能以创造精神对待新的现实的傀儡一般的人，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未来呢?

我生平在宗教界活动。掌权者可以把我撵出学校，但不能触犯我的这一精神生活。现在这个宗教界遭到掌权者的蹂躏。他们对宗教界进行分裂和监视，竟有七名中央情报部成员守在教堂前检查参加礼拜的年轻人。当社会腐败的时候，应该由宗教拿出力量消除腐败现象。但是现在宗教竟处于这样的状态。掌权者你们究竟打算把这个社会拖到哪里去呢!

掌权者逼人把太阳叫做月亮

申 铉 奉

哀乎，哀哉！（审判长问他为什么哭）因为民主和人权都死在这个法庭上了，该致哀恸哭表示吊唁嘛。

首先我要控诉与我个人有关的蹂躏人权问题。当局不提出任何证据，也不接受我提出的证人出庭的申请，就企图给我判处重刑。因为所有的人在这暴压下被迫保持了沉默，所以，我们宗教徒迫不得已说了话。在独裁情报政治下，人的尊严、基本权利、自由、良心都这样遭到蹂躏，我们宗教徒怎能听之任之呢？

朴政权不仅不从南越局势中吸取教训，反而从坏的方面利用了它。只要国民一开口，当局就说他们是分裂舆论的分子、破坏团结的分子、破坏保安的分子，并镇压他们。

起诉书里写道：利用宗教仪式策划了政治阴谋。这暴露了对宗教的无知，这是对宗教的挑战。宗教是打击傲慢的人，削弱有权的人，解放穷人和受压迫的人的。这就是我们的主张。在现行的法律和良心的法律互相对立时，我们是拥护良心的法律、上帝的法律的。我们决不能承认维新宪法，它是和一般的道理和人的良心背道而驰的。它不是法律，而是暴力。它是为一人的，是由一人摆布的一人

法律。我们宗教徒反对个人迷信和偶象化。这是凭人的良心也是不能接受的。从法律和良心的角度来看,维新宪法、紧急措施之类是不能成为民主国家的法律的……。我还忘了一件事……。那个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大全里写道:国民对那些一味强迫人们服从的反动政权的反抗,不是内乱。天主教承认对独裁暴力的抵抗权。现政权进行着暴君式的压迫。对此,怎能不开口说话呢?

起诉书指出, 我在教堂里作的讲话歪曲了事实。 其实,起诉书本身歪曲了事实。在第一审时,我要求当局说明拿什么样的标准来说我歪曲了事实。这个标准直到现在还没有弄清楚。所有的人都认为我讲的内容是事实,为什么偏偏检察官一个人不承认它呢!掌权者逼人把太阳叫做月亮。也就是说,迫使人们颠倒黑白。我在这里也反对和拒绝这样做。这简直是迫使人们弄虚作假的可怕的世道。无论检察官的求刑或审判官的判决书,恐怕都是原原本本中央情报部给写的。我国的司法部难道是行政部和南山乒乓球场(指刑讯场、中央情报部)的侍女不成?

起诉书甚至断章取义地胡乱援引了我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的原州祷告会上作的讲话内容。 这是企图借三·一节事件把我关进监狱里的、贼喊捉贼的政治报复。起诉书里提到的内容,当时我根本没有谈过。那时,中央情报部进行了录音和记录,满可以拿它作证据的,可是为什么拿不出呢?第一审判决是片面地根据检察官方面的主张下的,这种审判决不能说是公正的,所以,这完全是无效的。第二审也一样。直到作最后申述的这个时刻,也不

提出证据，也没有证人出庭。这种毫无根据的审判也能生效吗？

这个审判不是判罪的，而是把讨厌的人抓来搞审判的。人们说我们是政治犯，但应该叫宗教犯才对。有限头的独裁情报政治竟敢审判永恒的神的真理，简直是荒唐无稽的勾当。这种审判总有一天要受到神和历史的审判。我们在神和历史面前声明我们是没有罪的。若是法律居在良心和正义之上，那么我们是没有罪的。我们决不在这个法庭上乞求宣判无罪。那是因为神的正义已经宣布了我们是没有罪的。

起诉书是凭空捏造的。与金芝河有关的部分不符合事实。我不是为推卸责任，而是认为分清是非是神父的义务，所以不能不说了。金芝河不是共产主义者，这是明若观火的。但起诉书里说他是信天主教的共产主义者。这就等于说他信奉神，但又是唯物主义者；他承认神的存在，同时又不承认神的存在。这等于说水达到沸点就会冻结的一种不合逻辑的鬼话。金芝河是遵照耶稣的教导要实现对邻人的爱的天主教徒和诗人。掌权者竟敢捏造三·一节事件那样引起国内外注目的事件的情况下，捏造金芝河事件之类，更是不在话下了。我坐牢以后，对金芝河的良心宣言的真实性深受了感动。我看到金芝河的良心宣言和他寄给正义体现祭司团的信，又激动又难过，不禁流下了眼泪。

对金芝河的问题也许可以说，比起憎恨人本身来，更憎恨他犯的罪。金芝河准备写一篇以绑架金大中事件为题材的诗这一风闻一传开，他们就先逮捕金芝河，然后搜查

了他的家和他丈人家，可是没能搜出诗来。但是他们发现了狱中手记，就要出拿家鸡顶野鸡的伎俩，把他关进监狱里折磨他。这就是所谓金芝河违反反共法的事件。在对金芝河进行审判之前，中央情报部印发了把他捏造成共产主义者的题为《金芝河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七十万至一百万本。他们疯狂地企图在两三个月内结束审判，处理一切问题。正在这个时候，金芝河发表了良心宣言。陷于窘境的掌权者，起诉期限一过，就根据早在民青学联事件时判处的无期徒刑，继续把他押在监狱里。这真是可怕的政治报复。

起诉我们的理由里包括破坏立宪政治秩序、离间政府与国民这一条。到底是谁要搞那种挑拨离间的勾当呢？那不是执政者们先搞的吗？ 就是他们自己离间了政府和国民，也离间了国民和宗教，还企图离间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金芝河和天主教。在原州，中央情报部多次对池学淳主教和我说："只要不干预金芝河的问题，其他的一切要求都可以答应。"这不是中央情报部分裂国民的勾当又是什么呢？

执政者们难道不能培养象金芝河那样的人吗？外国把他推荐为授予诺贝尔奖金的人，而政府却搞反对它的运动，甚至拒绝授予罗塔斯奖金。非用这种狭隘的态度去对待他不可吗？当局制造三•一节事件，连过去不成什么问题的事都拿出来，对我们进行报复。

我们神父聚在一起时常说："许多人坐牢，只有我们在外边，实在难为情。"于是遵照神的真理、教会的教导、池

学淳主教的良心宣言，我们也不怕坐牢，理直气壮地行动起来了。

实行独裁情报政治的掌权者可以监禁我们的肉体，但绝不能监禁我们的良心和信仰。在掌权者的暴力下坐牢的所有良心犯获释以前，我是不希望获释的。

应该考虑后代的历史学家将对这个审判进行正确的审判，不要留下污点。当后日有子孙问起你们到底因为搞了什么样的审判， 如此遭到羞辱的时候， 难道你们要回答说，象谚语里说的，兔子进龙宫时把肝放在家里那样，把良心留在家里，只有空空的躯壳去搞了审判吗？切望你们不要落到这种地步。

这就是这个国家执政者们干的勾当

文 正 铉

我拒绝这个审判。然而，我知道在这维新体制下重新组织审判人员，象摘天上的星星一样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要说几句直到现在没说的一些话。

教会教导我们说："祭司对所有人负责，特别是要对穷人、无力的人负责。耶稣亲自做出了同那样的人结合在一起的榜样。"还教导我们说："给那样的人带来喜讯是耶稣建树作为救世主的业绩的表现。"一九七四年七月六日（池学淳主教被捕的日子）以后，我才懂得了照这句话实践是多

么困难。我对中央情报部或警察的审讯抱着一种自信。我没有妻子和儿女，是单身一个，可以豁出自身对付罪恶。然而，我的肉体却直打哆嗦。一听到洗洗脸吧这样一句话就害怕起来，想又要开始水刑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对现政府进行了挑战。这是对不道德的、不符伦理的行径的不可遏止的挑战。检察官说，我们利用神父或牧师等有影响力的地位，制造了民青学联事件和人民革命党事件，并说我们象代表现在的国家和现宪法似地狂妄行动。政府进行了秘密审判。不论是谁，都对此怀抱疑虑。旁听这一审判的被告家属给我们传达了奇怪的情况。于是我们要求进行公开审判，但政府对此置之不理，采取强硬的态度，说什么民青学联事件是共产主义者制造的事件，池学淳主教也和这个事件有关系。我对此提出了抗议，结果，多次被拉去。因为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所以举行了祷告会，并高呼哪怕警察包围教堂，也不应该做独裁者的工具。我认为，由于这种呼声和抗议，对民青学联事件牵连者停止处刑了。但后来，掌权者怎样对待出狱的学生的呢？这里不妨举一个目前被监禁在汉城拘留所的延世大学崔君的例子。情报部以观光旅行的名义把他带到全罗道去了。他们白天让他喝酒，夜里把女人放进他留宿的旅社房间里。这就是这个国家执政者们干的勾当。我们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掌权者只当做耳旁风。

朴正熙和他的一伙是长不了的

尹攀熊

这个法庭对基督教太无知，他们掌握的知识，甚至比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日本特务警察还要差。牧师是按照神的旨意服务的使者， 正象朴正熙任命并使唤审判官一样。这个法庭只承认基丁维新宪法的法律，排斥其他的一切东西。但是要求证人发誓凭良心作证。良心不是指的如实地作证的精神吗？但是这个法庭如有人要凭良心作证，就施加压力。在这个法庭上，把凭良心作证当成是歪曲事实。

按照神的旨意服务，就是指为恢复人权服务。这是因为上帝赋与的人权遭到暴力的蹂躏的缘故。人没有人权，就无异于禽兽和疯子。因此，人必须摆脱这种处境，这就是解放神学。说教基本上是批判性的。我叫他朴正熙氏，结果犯了总统冒瀆罪， 被逮去好几次。 我从朴正熙氏和他的一伙用刀枪篡夺政权的那天起，就对他们采取了批判的态度。给那些监禁有良心的人士、把牧师说成是国际共产党的人加上“氏”字，是我所能用的最大的尊称。从这一立场出发，我在说教时批判了现实，并说，为这个国家着想，朴正熙氏和他的一伙儿必须下台。

我被捕以前，两岁的孙女被绑架了。那时为了找这个

孩子，我坐了公共汽车，这时有一个男汉说:“我很熟悉先生，那个孩子失踪是和政治问题有关的。”说完就溜走了。即使我五年后出狱，也要弄清这个问题。

我参加礼拜四祷告会。但受说教的委托的时候，总是走出家门前就遭到六七名便衣警察的制止。就是好不容易从后门偷偷溜出来到了会场，也被强拉回家去。我家旁边的胡同的菜铺里经常有中央情报部人员不停地监视我家。难道要我们做不批判这种现实的“不会吠叫的狗”吗？我的教会是教徒只有一百名左右的小教会。三年前还是个和睦的教会。我一出席礼拜四祷告会，当局就带走教会干部或进行胁迫。正如起诉书指出，现在会员只剩了四十名左右。现实尽管如此，检察官说什么这个国家的政府不但保障信仰的自由，而且在帮助教会。

难道检察官这个职业不是调查犯罪而是制造犯罪的吗？检察官说没有时间，要我们尽快结束最后申述。但他本人不顾二百多人在这里等候他，竟迟到了四十分钟。检察官是没有常识的人吗？对审判官也要说几句。朴正熙氏和他的一伙儿是长不了的。天一发亮，小偷也住手停止偷盗的。罪恶是坏人制造的。因为向美国派了朴东宣那样的人，所以韩国人在那里羞得连头也抬不起来了。你们要借口批判了这个歹徒，扣上罪吗？

“维新体制”是为朴正熙一人永久执政的

金 大 中

我对爱国的同胞从物质及精神上的支援、世界民主友人的支援，表示由衷的感谢，衷心感谢世界教会热烈举行祷告会表示支援。我虽然被拘禁，但能够作这种程度的发言，完全是靠国民的支援和世界舆论支持的，这使我实在不胜感激。律师团主张我们是无罪的，但鉴于目前这个国家的情况，这对审判官方面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究竟有谁敢违背现政府总统的意图呢。我是根据对所谓我违犯选举法事件的审理过程中的体验，泛指这个国家的法庭说的。所以我对审判官的判决不感兴趣。引起我的兴趣的倒是审判过程。我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审判官方面作出了相当的努力。不过审判官方面拒绝了被告提出的证人，而且虽然被告要求检察官方面拿出证据，摆事实，但审判官方面对此一次也没有向检察官方面要求作答复。对此我是感到不满的。我总觉得有外部势力在阻挠这个审判公正进行。但在这第二审允许律师进行辩论，也允许被告作最后申述。我虽然对审判官方面有不满，但认为他们也考虑了被告的立场，对这一努力表示谢意。

对律师表示由衷的感谢。他们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期待，辩论也作得很出色。我认识到比起审判本身来，

法律界倒有这种正义精神健在感到无比的高兴。诸位旁听者，你们一直参加了审判，连一次也没有缺席，你们不单单是旁听者，而且是始终参加共同斗争的人。不知怎样感谢你们才好。

对国内外记者也表示感谢。想到我国记者即使采访了也不能进行报道，实在感到痛心。这正象是士兵扛着不中用的枪开赴前线一样。与其说埋怨你们不为我们写文章，倒不如说对你们不能写出去的处境感到心痛。我对这个法庭的秘书、庭吏、 监狱长和看守表示感谢， 他们在这星期六，一直到深夜为我们很辛苦。检察官方面虽然和我们有意见分歧，但始终耐心地听了我们的发言，对此感到有些过意不去，在检察官失去独立性，附属于掌权者的这个国家，恐怕是无可奈何的。

根据我的经验和良心，我认为我来到了该来的地方。我现在患病受折磨。近来也依然夜里为了服药，起来三四次。然而心情非常舒畅，充满着解放的喜悦。如果我没有参加三•一民主救国宣言，如果在没有被拘禁的情况下站在这里的话，我每当看到没被拘禁的各位先生虽然责任不在于你们但显露很抱歉的神色的时候，我的心里该多么难过啊！因此我对我身在狱中感到不胜感激。我认为不管审判的结果如何，我们已经赢得了胜利。国民经受考验成长起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这个法庭上的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检察官方面说我们扇动了内乱。但是，我们要他们拿出证据来，摆事实的时候，检察官方面却不敢那样做。

宣言指出言论遭到扼杀。但检察官方面为什么不能说

言论遭到扼杀或遭到部分的限制呢？他们只是反复说是众所周知的事。他们不是不说的，而是不敢说的。我们的胜利就在这里。检察官方面对我们说，不提出相应的方案的就不是建设性的。那么我在这里谈谈我对国家政治的看法和对这一困难局面和这个政府的看法。

一句话，今天的维新体制不是为统一的，也不是为“保安”或“反共”的，而是为朴正熙一人永久执政的。维新宪法只是为它而存在的，而且以它为目的的内容组成的。这是象太阳从东方升起一样明显的。在这个体制下是不可能保障民主、人权和自由的。民主和维新体制象水和火一样是不相容的。就是出口额达到一百亿美元或一千亿美元，也不能改变“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即使有一部分得到发展，其他部门遭到牺牲的那种不平衡越来越加剧。在独裁之下，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是不可能的。在维新体制下，根本不会有社会上的良心自由、宗教自由和学校自由，那些正直的、勤劳的、有良心的人获得成功的那种社会正义是不能存在的。那是因为在以一个人为中心，并为他尽忠的体制下，根本不能施行为万人的政治，保安也是不可能的。我们民族通过悠久历史，多次遭到了外来侵略，但我们民族没有遭到灭亡，一直保持了单一民族的生活、语言和文化。这是没有潜力的国民是做不到的。拿东学的例子来说，从庆州乡下的一个没落贵族的头脑中产生了“人乃天也”这一尊重人的民主大原理。东学革命的领导人全琫准只不过是私塾的先生。但是在这一革命中采取了解放奴隶、寡妇改嫁、土地改革等切实可行的民主

措施。这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这难道不是在世界史面前可以引以自豪的事吗？这一精神由独立协会运动、三·一运动、光州学生抗日运动、四·一九学生革命继承下来了。我相信只有发挥这一精神， 才能完成这个民族的两 大 任务——恢复民主和实现和平统一。这只有根据民主原则才是可能的，只有民主才是同国民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

这个政府在五·一六政变后举行了三次总统竞选和四次国会议员选举。但每次都发动官权举行了舞弊选举。尽管如此，结果是每次都有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选民对在野党候选人投了赞成票。而且，选民对于两大政党以外的政党几乎没有投票。这就表明有可能实现稳定的民主。向来是独裁者干涉了民主，而没有一次是表明国民没有能力实现民主的。统一是一定能得到实现的。

我想对现政府提出几点要求：

要废除万病的病根——为一人长期执政而制造的维新体制。至少要恢复这个政权三次修改宪法连选总统以前的旧宪法，组成新的国会和政府。这并不意味着把政权移交给在野党。由执政党的优秀的人物继承也未尝不可。但是一人长期执政是极其有害的。如果反对我们所说的万病的病根这个意见，并认为正象检察官方面所说的那样国民全面支持这个体制，那末举行国民投票也可以。当然，国民投票不应该是象过去那样的假投票，而应该是在完全保障政治自由的气氛中自由表示赞成或反对意见的那种投票。而且在投票和开票时，应当进行公正的监督。这样做了之后，如果我们失败，那末我们将不再说二话。

当前必须立即废除紧急措施，尽早恢复国民起码的自由，消除这种不必要的对立和精力的浪费。必须释放用各种名目逮捕的民主政治犯。必须使被撵出的教授、学生、记者回到原来的位置。必须解散蹂躏人权的大本营中央情报部。据说，美军电台曾广播了前情报部部长向驻韩美第八军请求政治避难的消息。政权的中心人物竟落到了这样的地步。可见，中央情报部对这个政府也已经不是有益的存在。

连北方的广播电台也宣传海湾勘查公司的贿赂事件和朴东宣事件等。连共产党都知道的事，为什么不告诉本国国民呢。必须公开在海外干出的肮脏的勾当，追究责任。究竟要到什么时候才停止欺骗国民、堵塞他们的耳朵、蒙住他们的眼睛的勾当呢？这也许能保障朴政权的安全，但决不能保障国家的安全。

我们对现政府决不抱有憎恨或复仇心。如果政府为了解决许多问题愿意和我们进行协商，那我们就跟政府开诚布公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如：为国家需要什么；为安定民心，应该做什么；为保障真正的安全，应该走哪条路，等等。而且愿意聆听政府的意见。即使掌握了权力也不该进行镇压，即使换了掌权者也不该进行报复。我们现在不是进行互相残杀的战争，而是进行争夺政权的政治竞争。我们希望随时进行对话和协商。这些都是我们所有人的共同的想法。

我对判决毫无关心。很对不起，单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不把检察官放在眼里的。我不憎恨任何人。为了恢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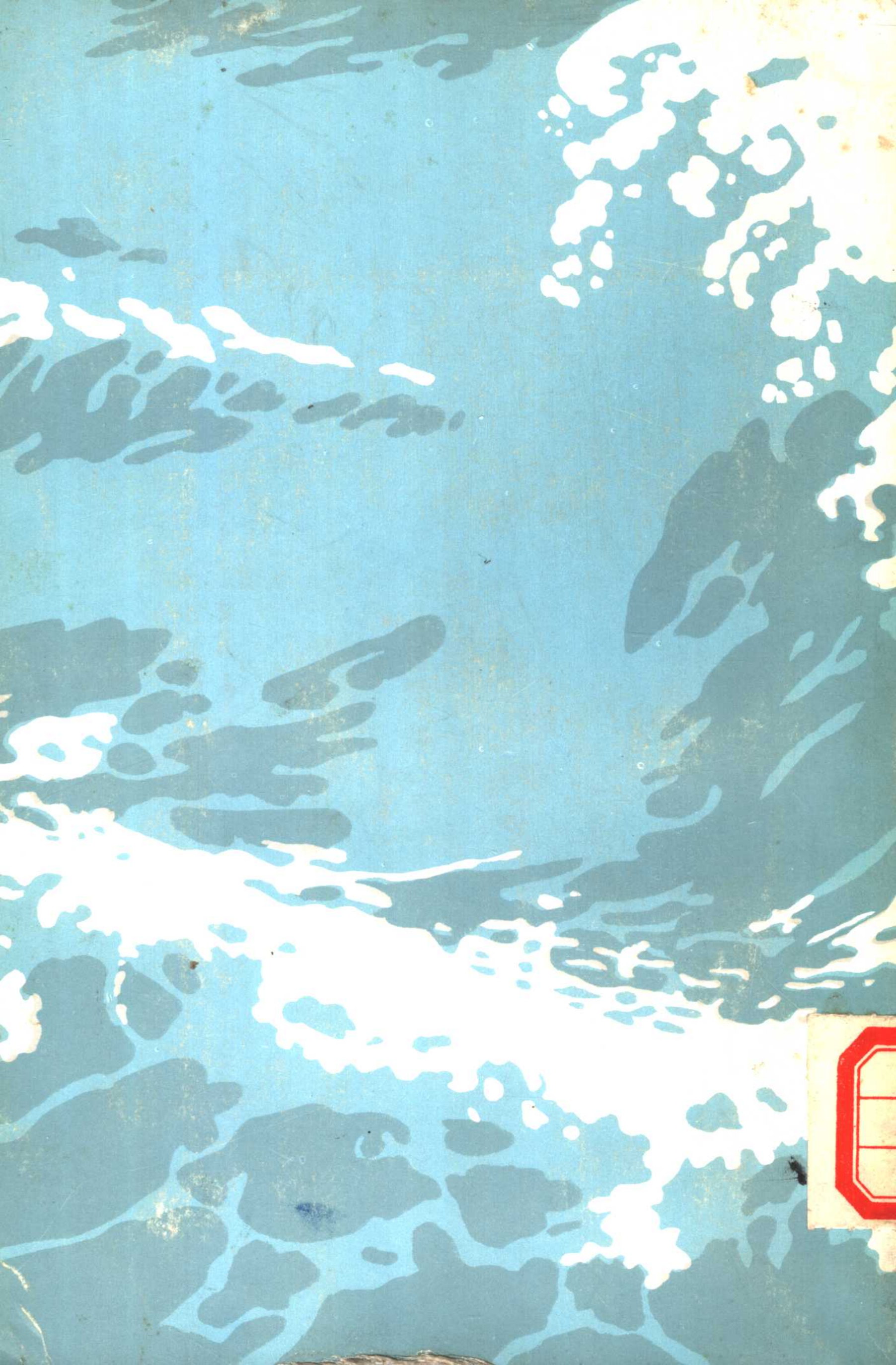
民主，为了解放受压迫的人，为了教会，为了使朴正熙以下现任执政者根据民主、良心、正义改变现体制，我每天做祷告。直到现在，我们批判了政府，但包括我在内的我们国民应该和政府一起共同负责。如果我们更精明些，认清了做主人的权利和责任，如果我们按照自己的认识提出主张并加以实践，那末怎能会存在独裁呢。

我每次做祷告的时候，祈愿不要再出现另一个军事政变或四•一九革命那样的流血事件，祈愿国民能够认清自己作为政权的主人的权利和义务， 并由国民建立民 主 制度。同时祈愿仍在沉睡的许多教会甚至协助独裁的教会要依靠神的力量睁开眼睛站到国民的前头。

最后，我宣誓遵照我的良心和我信奉的神的教导，为受压迫受蔑视的国民献出我的一生。政治上的自由，经济上的平等和社会正义，这就是我的基本信念。在这里有我的两个儿子在旁听，我不愿做给他们丢脸的父亲。不愿做为我们子孙所谴责的那样的祖先。为了不做那样的人而献出我的一生。

我很清楚，现政府不仅拘禁了我，而且企图夺取我的生命。现在也不能认为他们已经打消了这种企图。他们随时都可以杀害我。然而，不管他们对我干出什么样的事，决不能改变我对国民的忠诚、对后代的责任感，也不能改变我在上帝和良心面前下的决心。我已是不能改变这一决心的人了。一九七一年，我做了不能令人满意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也有相当于百分之四十六的五百四十万选民支持我背起民主的十字架。我不能背叛

这五百四十万人。我宁愿死，决不能背叛。我只有献出生命的决心，决没有回避它的自由。

我不是为和家属一起过安乐的生活，而是为国民延长我的生命而做了祷告。上帝接受了我的祈愿，救了我，我怎能背叛它呢。为尽到对国民的责任和对上帝的责任，为恢复国家的民主和民主的和平统一，我必须献出毕生的努力。我应该这样生活下去，直到我的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这种角度说，我虽然关心审判的结果和政府又对我干出什么样的事的问题，但这不能动摇我的决心。我很清楚地知道这个国家的法庭不能决定释放我们的问题，也不能判我们有罪。不管结果如何，我只履行我对国民和上帝的诺言和义务。在座的诸位，在法庭外边的各位国民，我抱着和每个人一一握手的心情，衷心地呼吁，我们要超越各自的立场，为建设建立在正义之上的社会而斗争，这个社会必须保障能维护国民的人权的政治自由，建立保障平等的经济条件的新的经济秩序，使正直、勤劳、有良心的人获得成功，保障良心、学问、信仰的自由。我以这个呼吁结束我的最后申述。